

学书系 总主编 刘继南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Language Culture

主编 闵惠泉
邓炘炘

国际关系与语言文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蔡 翔
责任编辑：余 木
装帧设计：大象设计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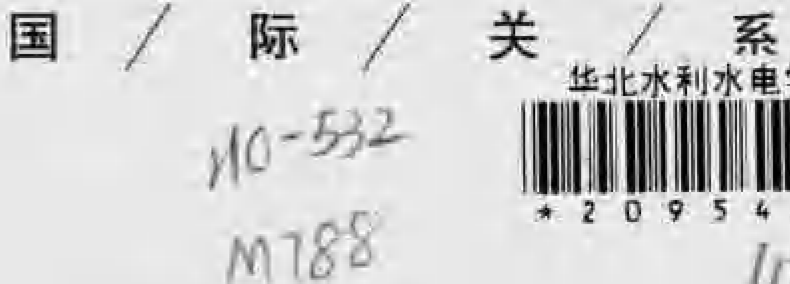


乌尔都语诗人在友谊的海洋里畅游，荷兰语专家成了许多单位的"抢手货"，意大利语言工作者曾创下"洛阳纸贵"的奇迹，讲马来语的中国人在国外很受欢迎，老挝语教育硕果累累，斯瓦希里语专家虽寥若晨星却照样耀眼，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僧伽罗语广播等在对象国听众中好评如潮……鲜花和掌声伴随多少艰辛与汗水，成功的背后是不倦的追求与奋斗。

非通用语，你是和平的纽带，友谊的桥梁！



ISBN 7-81004-949-6/K · 588
定价：16.00元




International
Language Culture



国际关系与语言文化

主　编 闵惠泉 邓炘炘
副主编 陈元猛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与语言文化/闵惠泉，邓炘炘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4

（国际关系学书系/刘继南总主编）

ISBN 7－81004－949－6

Ⅰ．国… Ⅱ．①闵… ②邓… Ⅲ．外语，非通用－文集

Ⅳ．H0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8183号

国际关系与语言文化

主　　编：闵惠泉　邓炘炘

责任编辑：余　木

出版发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738557　6573853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http：//www.cbbip.com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8.125

版　　次：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04－949－6/K·588　　　定价：16.00元

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语言谱系

——写在"非通用语与国际文化交流研讨会文集"出版之际

闵惠泉

2001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组织召开了一次"非通用语与国际文化交流研讨会"，据业内专家讲，从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专门探讨非通用语教学和研究的话题，这在国内尚属首次。笔者有幸作为与会者和主持人之一，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部分从事非通用语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在"获得了某种话语空间与权利"后表现出的异常热情与激动和由此产生的影响，至今印象深刻。

时隔一年有半，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将提交大会的几十篇论文结集出版，算是为这次令人难忘的学术研讨会最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是借此对所有从事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以及宣传等方面的工作者表达由衷的敬意。相信本次研讨会所带来的震动与引发的思考还会持续下去。

语言是人类生存与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标识。语言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与国际交往中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有关资料记载，人类的语言至少有几万种之多，然而在历史的演进中不少语言早已死亡、消失或处于濒危之中。在最近翻译出版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世界文化报告》中援引了《剑桥语言百科全书》提供的有关数据：目前世界现存的语言尚有6700种，有39个国家讲50种以上的语言。在这几千种语言中，81.7%分布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美洲占到14.1%；而欧洲

只占3.4%。其中使用者在1亿人以上的作为母语的语言就有汉语、英语、西班牙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俄语、日语、德语和法语共10种。[①] 但是，什么时候在语言的谱系中被分成了通用语与非通用语？根据什么划分语种的大小？这恐怕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特别是随着西方不断地殖民与文化扩张所带来的后果，这种状况在近现代西方强劲的经济与科技浪潮推动下更是愈演愈烈。

区分通用语与非通用语的标准是什么？根据通常的看法，一是考虑使用该语言的人数与国家的多少；二是看它是否为联合国的一种工作用语。如果以使用该语言的人数区分，究竟使用者有多少就算通用语了呢？上述10种语言的使用者均超过了1亿人，其中汉语的使用者多达十几亿，但被现代国际社会公认为是通用语的毕竟有限。《世界文化报告》提供的一则数据，大概是一种很好的诠释。来自全球的15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提供的数据显示，世界上某一共同语言被13个以上的国家所使用的只有6种。它们是英语（被35个国家作为共同语言）；阿拉伯语（被27个国家作为共同语言）；西班牙语（被22个国家作为共同语言）；俄语（被18个国家作为共同语言）以及法语和德语（分别被13个国家作为共同语言）。[②] 那么这些是不是都是通用语了？显然也不是，尽管在这6种语言中有5种被确定为联合国工作用语，但是人们并没有把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真正作为一种通用语看待。因此有人极而言之，在目前世界上真正的通用语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英语，因为它是现代社会使用国家最多、应用范围最广、最普及的语言。虽然其他的语言使用人数也不少，但与英语相比较，它们的“国际化的使用程度”仍比较有限，在语言的

① 参见《世界文化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② 参见《世界文化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谱系中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被边缘化了，这的确是人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然而，通用语与非通用语的界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语言发展的历史上，拉丁语就曾一度成为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化和科学研究的通用语，风光了近十个世纪。现今的英语如果倒退500年，不过是几千种语言中的一种，它难道不是非通用语？倘若再前进500年，究竟哪种语言是通用语恐怕也在未定之中。

语言的生命在于语言的使用与传播之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间的各种交流日益频繁，日趋快捷。为了便于人类彼此有效地、快速地交流与沟通，在客观上的确需要有某种语言作为共同的媒介平台（这有些类似阿拉伯数字早已成为现代社会运算的平台一样）。因此在人们尚未能接受某一人造语言（如世界语），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化语言的前提下，某一种或某几种民族性的语言成为语言谱系中的主干，是人们无法回避并可以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语言的生存与发展是无足轻重的，并不意味着其他语言不能有自己的话语空间与权利。在现实中人们姑且可将语言分化成通用语与非通用语，但是在这两者之间，乃至在所有的不同的语言之间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有着自己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语言魅力。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著名的解释学大师加达默尔在中国学者将他的经典之作《真理与方法》译成中文后，却表示出不同的语言之间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甚至不可翻译性的见解。

可以说正像地球上存在着生物的多样性，人种的多样性一样，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个多种文化的地球上，应当有多种声音。这不仅指声音所表达的内容，而且包括声音所具有的形式。语言是人们进入不同的国家与文化的通行证，在一个存在着文化多样性，存在着文化樊篱、文化误解乃至文化冲突的世界里，这种通行证显然不能只有一种。

因此，高度重视非通用语的教育和使用，彻底消除对某些非通用语言特别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使用语言的偏见与歧视，使非通用语有一个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无疑是人类语言谱系这棵大树根深叶茂、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必要条件。

或许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家斯蒂芬·玛格林的话是对的："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①]

① 引自《世界文化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浅谈非通用语的地位和出路

冯玉培

一、非通用语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大批亚非国家纷纷摆脱外国殖民统治而宣告独立。为加强与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遵照周恩来总理在与亚非各国人民的交往中，为了尊重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感情，一定要重视他们的语言的指示，我国外语院校先后开设了非通用语专业。今天，全国从事非通用语教学的高等院校共有11所，开设的语种多达40余个(仅北京外国语大学就有26个非通用语专业)。外语非通用语专业已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非通用语专业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外语专业人才，在我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研究和平问题还是发展问题，都离不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与研究。因而，也就不能不重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和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有鉴于此，国家历来十分重视非通用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为调动非通用语教师的积极性，加强非通用语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从1997年7月开始，

教育部拨专款为他们发放特殊岗位津贴；1999年，教育部下达的《关于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像保护国宝大熊猫一样来保护我国的非通用语种学科"；为了巩固和发展外语非通用语专业，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2000年上半年，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建立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并纳入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改革工程"。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我国外语非通用语学科的重要地位，并将有力地促进非通用语教育的发展。

今天，我国的非通用语人才已成为外语人才队伍中一支重要而又特殊的力量。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出现了一股"小语种热"，成为大运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1年8月13日，《北京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大运会外语43种，除了英、法、俄等大语种外，豪萨、马扎尔、希伯来等小语种翻译同样准备齐全。"据悉，到大运会组委会志愿者协调处报名参加服务的共有664人，涵盖43个非通用语种。大运会还专门成立了小语种专家志愿服务团，半数以上的服务团成员掌握两种以上外语。组建专家志愿服务团是为了确保为各国代表团提供快捷、准确、周到的语言服务，承担志愿者服务热线、彩虹志愿者网站监控等方面的语言服务指导工作，同时应对组委会各部门紧急而重要的语言服务需求。仅此一例，非通用语的重要作用可略见一斑。

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迎来了发展民族经济、繁荣民族文化的新时期，也使得运用本国语言进行对内对外交流成为可能和现实。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使用本国语言，以非洲大陆的三大语言之一——斯瓦希里语为例，坦噶尼喀（现坦桑尼亚大陆部分）独立后，政府即宣布斯瓦希里语为国语。1964年1月，年轻的桑给巴尔共和国（现为坦桑尼亚岛屿部分）在她诞生的第九天，革命政府便庄严宣告，斯瓦希里语为桑给巴尔的官方语言，同时废除被推翻的封建政权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法令。已故桑

给巴尔总统卡鲁姆指出："桑给巴尔是非洲国家，所以必须使用非洲的语言。"1969 年，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作出决议，决定斯瓦希里语为国语，并计划用 5 年时间在肯尼亚全国普及斯瓦希里语。1971 年乌干达前总统伊迪·阿明上台后，曾向国民宣布："根据全体乌干达人民的意愿，斯瓦希里语将成为乌干达的国语。众所周知，斯瓦希里语是全体东、中非人民的语言，是寻求非洲完全统一的语言。"卢旺达独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因而，积极普及和推广斯瓦希里语，并从 1976 年起，各地中学和卢旺达大学开设了斯瓦希里语专业。经过东、中非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共同不懈的努力，今天，斯瓦希里语与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一起正式成为"非洲联盟"（原非洲统一组织）的工作语言。这是斯瓦希里语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远远超出了语言作为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范畴。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上的独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植根于民族沃土之上的语言正显示出越来越强盛的生命力。世界大国无一不重视对非通用语的学习和研究，据统计，美国拥有 105 种非通用语专业的人才，我国充其量也只达其一半，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进一步加强对非通用语的学习和研究迫在眉睫、任重道远。

二、非通用语面临的困难

现象一——外文出版局和人民画报社曾经分别拥有十多个非通用语种，其数量之多仅次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变化的影响，外文出版局和人民画报社两个承担对外宣传任务的事业单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

击，被迫从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撤销非通用语种，到20世纪末，几乎所有的非通用语种都被撤销。作为我国重要的对外宣传机构，这两个单位先后撤销非通用语种对我国的非通用语教育影响很大，此举在非通用语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令一些非通用语种国家的有关人士费解。

现象二——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对对外经济援助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由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调整为增加无偿援助的额度，取消无息贷款，以优惠贴息贷款的方式，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合资合作。调整后的经援方针不再上“无资源、无市场、无效益”的“三无项目”，更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客观上，随着经援方式的转型，也使某些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量逐渐下降。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中国在坦桑尼亚援建的大小项目多达几十个，涉及工业、农业、铁路、医疗、军事等许多领域，仅北京外国语大学75届的30名非通用语专业毕业生中，就有40多人次先后在坦桑尼亚各项目上担任翻译工作。目前，中坦之间经济合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合作项目有所减少，相应地，使用斯瓦希里语的单位也有所减少。

现象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均在“精兵简政”、注重经济效益，一些外事部门在实际工作及外事活动中，能用通用语替代的不再使用非通用语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现象四——目前，一些非通用语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面临严峻的形势。主要问题是：（1）一些非通用语师资队伍青黄不接。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系在未来的3－5年间，占全系师资30%的55岁以上的教师将全部退离教学岗位，这将意味着12个专业的教学工作将主要由3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承担。从1961年建系以来，先后有30余人调离或辞职。在目前的青年教师队伍中仍然存在着专业思想不稳定和流失的隐患。（2）某些非通用语教师经

济收入低、教学条件差、教学手段和方法落后等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这些非通用语教育的发展。

现象五——某些非通用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近两年来，某些非通用语毕业生使用本专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部分语种的毕业生使用本专业的比例不足50%。

三、非通用语的出路

随着社会的进步，改革的深入，人才市场对外语非通用语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单一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日益凸现。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困难，亟需调整办学思路，确立新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为我国的非通用语寻找新的出路。

就目前条件而言，非通用语+英语的复语型人才和非通用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更符合实际，更趋合理。当前，全国各外语院校都在围绕这一培养模式进行非通用语的教育、教学改革。

北京外国语大学于1999年为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辅修英语专业，学时由当时的576个增加到现在的864个，学生各科成绩合格，发非通用语本科毕业文凭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大专文凭。为加强英语教学，确保培养质量，学校还在2001年上半年组建了大学英语部，专门负责非通用语学生的英语教学。此外，学校还开设了辅修外交学和辅修国际经贸专业，为培养复合型人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北京大学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进校后，在一、二年级学习非通用语的同时学习英语，其目标是达到大学英语4级以上的水平。进入高年级后，可根据本专业的实际情况，由本专业老师用

英语开设专业课，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北京广播学院在2000年的招生简章中，明确提出了非通用语—英语双语培养方案。学生进校后，低年级以英语学习为主，非通用语为辅（两语课时比例为10∶10）；高年级则以非通用语为主，英语改为辅修，不设课时。培养目标是，非通用语达到本科水平，英语达到专业4级水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施非通用语+英语的5年制培养模式。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各科成绩合格，可获得非通用语专业的本科毕业文凭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颁发的英语大专文凭。据了解，毕业生很受社会欢迎。

各院校的非通用语教育、教学改革可谓五花八门，各具特色。究竟何种教学模式更科学，尚需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也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无论采用何种培养模式，其目的在于找到一条适合于非通用语自身发展的新路子。惟有改革，才是出路。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以期有助于非通用语教育。

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

近年来，由于高校毕业生的分配就业制度已由过去的国家统一分配的计划体制向不包分配、自主择业制度过渡，加之学费标准逐年提高，高校的招生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挖掘潜力，扩大办学规模。非通用语专业亦存在着盲目扩招之嫌。此外，同一地区的几所院校开设同一语种（包括需求量极为有限的语种）的现象较为普遍。例如，200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斯瓦希里语专业的17名毕业生，只有3人使用本专业，其余14人均改行。而当年该专业又招收了20名学生；同年，北京广播学院也招收了24名该专业的学生。目前，全国外语院校的非通用语专业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下列困难：师资紧缺、经费不足、图书资料匮乏、教学

设备陈旧和学生就业困难。希望国家教育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战略的眼光，制定我国非通用语教育的发展规划，使非通用语的人才培养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复语型人才的培养要加大力度

培养非通用语＋英语的复语型人才已在非通用语界达成共识。然而，在复语教学的安排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各院校的做法也各不相同。笔者通过分析我校及兄弟院校非通用语教学改革的实践，结合社会对非通用语人才的总体要求，以为实施非通用语＋英语的5年制培养模式更切合实际，并建议学生入学后，两种语言同步学习。提出这一观点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 要在4年内掌握两门外语，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其难度是非常大的。如不适当延长学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非通用语不精、英语基础不牢，顾此失彼。

(2) 非通用语从零学起，不经过较为扎实、系统的语言基本功训练，没有足够的课时保证，难免不影响教学质量，降低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规格。以牺牲非通用语的培养质量为代价来提高英语水平，必将影响非通用语教育的健康发展。

(3) 早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曾实施过“2＋3”的5年制培养方案，即学生入学后，前两年学习英语，后三年学习非通用语，同时保留一定的英语课时。这一培养模式基本上是成功的。暴露出来的主要矛盾是部分学生“重大轻小”，不能正确处理好学习非通用语与英语之间的关系，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英语上，对学习非通用语热情不高，敷衍了事。按照今天的实际情况，进入大四，绝大多数学生会花费部分精力到社会上去求职，所以，学习非通用语的实际时间不足三年。而学生入学后，同步学习两门外语可避免上述矛盾。此外，语言学习有其自身规律，学习的基本方法和技能有其共性，只要学习目的

明确，能较好地处理复语学习的关系，科学、合理地安排学习时间，同时学习两门外语可以收到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事半功倍的效果。

非通用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有的放矢

周恩来总理曾指示外语专业的学生要打好三个基本功：政治基本功、外语基本功和知识基本功。实践证明，宽广的知识面是外语人才必备的素质，也是社会对非通用语人才的要求。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用人单位普遍希望非通用语的毕业生具有扎实过硬的外语基本功，同时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复合型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00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出台了《外语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计划用5年的时间改造高年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非通用语各专业5年内教材改造不少于3种。改造后的教学内容将突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情文化等专业知识，进而达到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实现知识、素质和能力的综合培养。此外，学校于2000年10月出台了辅修、双学位政策。开设的双学位专业有：外交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金融学。为了确保非通用语的教育质量，政策规定，本专业课程平均成绩4分以上才有资格申请攻读双学位，学生只有获得了本科学历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才有资格获得辅修、双学位（第二专业）证书。北京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可以辅修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成绩合格者可获得双学士学位证书。印地语2000届毕业生有33%的学生获得了双学士学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做法值得借鉴。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非通用语的出路问题。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辅修相关学科，要考虑自己的志趣和实际能力，做到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切勿盲目攀比。教

育管理部门要正确引导，既要鼓励他们辅修相关学科的专业，又不可降低非通用语教学的要求。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搞好非通用语教育，教师是关键。当前，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非通用语师资队伍的建设已刻不容缓。我们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制定非通用语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规划。

（2）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针对目前非通用语师资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重点加强对青年教师思想、业务素质的全面培养，做好师资队伍的新老交替、平稳过渡工作。

（3）各级领导要重视非通用语教育，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力度，把提高教师待遇的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教师的职业真正成为社会上人人羡慕的职业之时，方是中国教育事业的振兴之日！

我国的非通用语教育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洗礼，今天，处于十分关键的发展时期。虽然前进的道路艰难而又曲折，只要我们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可以相信，非通用语教育的明天会更美好。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

试论小语言广播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

董振邦

当今信息时代，国际多种媒体竞争尤为激烈，广播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愈加明显，凡有一定实力的国家及特定群体无不在大力发展对外广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于加强我国对外宣传的紧迫性，人们已较前有了更为明确的共识。但是对于小语言或称“非通用语”广播在对外宣传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多年来存有争议的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人仍认为“小语言广播听众少，影响不大，不如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于办好大语言广播”，甚至提出“小语言下马”的主张。本文仅结合笔者集毕生精力所从事的普什图语言广播的从无到有的成长过程及其在国外的影响，就小语言广播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进行浅显的分析与论述。

我们所称的“小语言”是从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情况来定位的。但是仅就某一国家或地区而言，其实它们恰恰是那里的“大语言”，操这些语言的人群恰是我国小语言对外广播在对象国家和地区受众的主体，其中许多人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普什图语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部地区普什图民族使用的语言，普族人口共约 3000 万。尽管在那些地区操达里语（即阿富汗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的人也为数不少，甚至有的地方在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英语也很普遍，但这些都只是“非通用语”。在边远的农牧地区，普语不仅是通用语，而且是那里的人民所惟一使

用的语言。展示开来，我国对外广播所使用的语言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印地语、泰米尔语、僧伽罗语等等，在其所在国家部分地区内都是通用语言；而泰国语、印尼语、越南语、柬埔寨语、尼泊尔语等又都是所在国的主要民族语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外听众来信大量增加。据统计，2000年国际台各语言部共收到来自世界153个国家或地区的听众来信68万多封，这是连续第4年超过65万封。来信超过10000封的除英语和日语外，还有泰米尔语、乌尔都语、僧伽罗语、尼泊尔语、孟加拉语、印地语、越南语。超过5000封，接近10000封的分别是德语、西班牙语、普什图语和阿拉伯语。这些来信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听众成员结构主要是使用“非通用语”的人群。

民族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文化能否受到世界的重视，又常常与这个民族的国际地位联系在一起。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广大民众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外来侵略与压迫，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蹂躏和欺凌，迄今还有许多人处于被歧视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看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国家电台使用他们的语言对外广播是对他们国家的尊重，是对该国国际地位的肯定。他们认为，中国使用他们的民族语言进行对外广播是他们的光荣，并引以为自豪。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广播工作者自知我们的翻译与编播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都仍存在不少差距，而听众却纷纷来信对我们的广播倍加赞赏，甚至给予过高评价的原因所在。

不仅是对象地区的一般听众出于民族自尊心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他们的民族语言广播表现出高昂的热情，即使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广播表示欢迎。我们的普什图语广播就是周恩来总理于1957年对阿富汗进行正式访问时应当

时的阿政府领导人的要求开办起来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台普什图语广播突出加强宣传针对性，根据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特点以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每日在两次各为半小时的广播节目中，除新闻外先后播出了数十个专栏节目。其中，“中国人民抗日历史故事”，“中国经济建设”，“中国文化”，“中国穆斯林”，“教汉语”，“丝绸之路”，“听众信箱”，“中国风俗”，“妇女世界”，“青年天地”，“中国的改革开放”等专栏，在听众中产生了重大反响。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台驻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记者站的建立，新闻时效性也在逐步加强，因此我台普什图语广播受到听众的热情欢迎。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最早出现的时期，迄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仍保存着玄奘取经途中在当地停留并向当时的佛门信徒讲解经文的原址。因此阿、巴两国人民始终对中国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记得有一位阿富汗听众曾经深情地对我说，阿人民喜爱收听中国电台广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希望了解深邃奥秘的中国古老文化和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巴基斯坦听众加瓦德在来信中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节目非常好，我们从你们的广播中能学习很多知识，了解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许多大事。”前喀布尔大学医学院一位名叫阿吉扎托依的女学生在来信中写道：“从你们的广播中了解到，中国是一个伟大而又美丽的国家，我非常热爱她，向往她，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到中国参观访问。”1999年，在国际台普什图语广播开播26周年之际，巴基斯坦“听众之友”俱乐部的主席阿卜杜·拉赫曼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赋诗祝贺。诗中写道：“CRI——最好的电台，亲切的话语随电波传来；CRI——传播真理的声音，世界一切大事瞬间可闻；CRI——被压迫民族的

代言人，始终为世界和平而努力；CRI——为了穆斯林兄弟姐妹，真诚服务不谋私利；CRI——同情阿富汗人民，将他们的不幸遭遇告诉世界人民，我最爱普什图语广播，这种精神食粮不可多得；CRI的电波传遍世界，这座友谊之桥将绵延万代千秋。"

我们的听众十分清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一种语言的对外广播都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声音。1979年，前苏联军队武装入侵阿富汗之后，国际台的普什图语广播及时地将中国政府反对侵略，支持阿人民卫国战争的正义立场报道出去，使阿人民受到极大鼓舞。一位署名西尔扎伊的阿抵抗战士在来信中写道："我是在罗加尔省的一个战地上给你们写这封信的，此时此刻，近处不断传来枪炮声，我从你们的广播中得知，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我们并向全世界表明了你们反对侵略的正义立场。我们将永远铭记中国给予阿富汗人民的无私的援助。"

苏联撤军以后，阿内战又起，各派武装力量互相指责，国外某些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纷纷介入，从政治上、经济上，甚至直接从军事上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而中国政府却始终保持中立。中国的这一不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和平外交政策受到阿人民的高度赞赏。一位署名萨尔瓦里的阿富汗听众在来信中说："我们衷心感谢中国政府。虽然中国是我们的邻国，但却从不干涉我国内政，并主张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我们呼吁那些干涉阿内部事务，支持一派打另外一派的国家也能采取像中国政府一样的公正立场，让阿富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1999年，阿富汗驻华使馆代办哈塔克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我台普什图语部工作人员座谈时，对我台普语广播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些年阿富汗问题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目前，有VOA、BBC、德国之声、莫斯科广播电台等8个外国电台开办了普什图语广播，但是只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普语广播能够公正、客观地报道阿富汗问题，从来不干涉阿国内政。这是

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最好体现。"

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部工作过的阿富汗专家阿萨德说："中国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外交政策在阿人民中最受欢迎，最得人心。目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有少数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以支持所谓'新疆穆斯林独立'为名，进行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反华活动，这些人十分孤立，他们的反华活动必将遭到阿、巴两国人民的反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听众来信的数量方面，普什图语节目与其他语言节目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一是由于多年以来阿富汗境内战乱不息，邮寄经常中断，阿国内的听众寄信必须经过巴基斯坦周转，因此邮资昂贵，尤其是对于本已十分困难的阿富汗听众，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邮寄一封信件可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阿富汗的文化教育状况滞后，90%以上的人口都是文盲，因此听众中有条件给中国电台写信的人数极为有限，目前每年10000封左右的听众来信所代表的实际听众人数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

笔者在1990年以前的几年间，曾经多次赴遍布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的阿富汗难民营进行采访。那里的几百万穆斯林难民每天晚上除去祷告之外，收听国外广播几乎是他们惟一可做的事。因为在那里没有电，无法收看电视。他们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广播是他们借以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途径，而从广播中惟一能听得懂的也只有使用他们的母语播出的节目。这种情况，目前在世界上绝不是个别的，无论是在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都还依然存在，并且将延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此可见，我们的小语言广播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任重道远。

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巴基斯坦的普什图语听众俱乐部已经有大约50个左右，由于战乱原因，在阿境内还没有这

种听众的自发性组织。据了解，听众俱乐部的许多成员并不是只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而是同时也收听 VOA、BBC 以及其他外国电台，他们最关心的当然是有关本国和本地区的重大新闻，并从收听到的新闻中通过比较鉴别，弄清事实真相。

听众从多年积累的经验中所得到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自身的对外广播节目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因此来自中国电台的新闻真实、客观，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绝不会像某些西方电台那样，出于自身利益，经常对许多重大事件作出混淆是非的歪曲性报道。笔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任国际台驻巴记者期间，当时的阿富汗抵抗组织就曾多次主动要求 CRI 记者进行专访，将他们所要发布的重要新闻作为中国电台的独家新闻传向世界，比如，1989 年阿抵抗力量决定就前苏联从阿撤军问题接受苏方建议，并即将举行正式谈判的新闻就是 CRI 记者从巴基斯坦发回，然后通过 38 种外语播送出的。在中国电台播出这一世界性要闻时，西方舆论界还在猜测纷纭，有的甚至公开表示怀疑，但最终证实我们的报道是真实可靠的。

鉴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也相应地对其国际广播语言节目的构成进行了调整，停办了部分小语言广播节目，但同时又新增加了一些语言节目，或是增加了广播的时间，其对外广播的总体规模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加强。1990 年，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于“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是否应该停办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政治和舆论已经在这一地区取得胜利，上述两座电台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及时停播，以便在当时美国政府为巨大财政赤字所困扰的情况下，节省一笔为数不小的开支。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对前苏联及东欧地区富有针对性的广播绝不应停办。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美国对

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广播不仅没有停播，相反有重点地得到了加强。1994 年，美国议会通过了一项“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继续保留，同时还将建立一座新的，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的议案。2000 年，美国又决定削减对东欧地区的部分语言广播节目，新增加 13 种外语节目，这些新开办的语言节目主要是针对中国、东南亚、西亚、非洲、俄罗斯及中亚诸国。中国是美国对外广播确定的“重点对象地区”。1996 年开办的“自由亚洲电台”，将中国作为“战略重点”。该台西藏语广播节目不仅延长了播出时间，达到每天 3 小时，而且发射功率也明显加强。与此同时，还于 1997 年新增加了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广播。在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美国之音”也同样加强了反华的政治内容。此外还利用所谓“西藏独立”、民主、人权等问题散布反华内容；更有甚者，“美国之音”的普什图语和土耳其语广播还制造所谓“中国支持伊朗和巴基斯坦制造核武器”等谣言，离间中国与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的关系。不言而喻，“美国之音”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广播节目中也有不少反华内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天下并不太平，各种政治力量的组合和利益的分配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向世界推行其“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利用各种国际场合，通过各种途径，为维护自己的主权与独立不断地展开对外宣传。同时人们也不难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使用广播电视等手段进行宣传方面，不仅显示出绝对的技术优势，而且也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2002 年，“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紧接着，2003 年 3 月又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全面战争。在这两次“现代化的战争”中，美国都无一例外地同时开辟了两个战场，

即“军事战场”和“政治战场”。一方面利用其绝对空中优势进行猛烈轰炸和炮击；一方面通过广播电视千方百计地对敌军和当地居民展开“心理战”和“新闻战”。值得强调的是，在广播电视节目中，美方尤其突出的是使用当地语言进行宣传。而在开战之前和战争过程中，播出时间最多，最有保障的宣传手段仍属广播。因为在断电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电视与广播相比常常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之前，不仅大大延长了普什图语的广播时间，而且在它所支持的“北方联盟”攻克喀布尔后，迅速恢复“喀布尔电台”和电视台的普什图语广播节目。美国于2003年3月20日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布什总统于巴格达当地时间4月10日6时向伊人民发表广播电视讲话。据报道，“讲话”是由美英两国新建的名为“通向自由”的阿拉伯电视网播放的。美军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在伊拉克上空盘旋，将节目信号送给伊拉克原国家电视台，供观众收看，但是据新华社报道，“由于没有电视机以及停电等原因，大多数伊拉克人没有能通过电视收看到美国总统布什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广播——尤其是使用当地语言的广播实际上成了白宫对伊宣传的惟一有效途径，可以说，VOA、CNN和BBC这几家外宣老手在对伊战争中为“瓦解伊拉克军心”，以及战后为“安抚伊拉克民心”所发挥的作用足以令世人瞩目，而且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的新闻媒体和每一个新闻工作者认真思考的。

据有关资料显示，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加强对外广播作出了战略性的调整，目前已经形成一整套可以覆盖世界各地的以短波和中波为主，由对象国当地中波电台和调频台转播，以卫星电视广播和因特网为辅的电子传媒网络。其对外广播的语言种类繁多，“美国之音”55种，“自由欧洲电台”20种，“自由亚洲电台”9种，共计使用58种不同的语言日夜不停地向世界各地进行广播，宣传美国的政策，传播西方价值观，干涉别国内部事

务，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反华内容。而相比之下，我们的对外广播不仅在技术设备和发射能力方面仍处于弱势，仅从所使用的38种外语来看，也存在很大差距。从美国对外广播的众多语种来看，在小语言广播方面，我们仍迫切需要在现有的条件下，予以加强和改进。

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电台日夜不停地进行的大量反华宣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国家主要对外宣传机构之一，负有重大的责任。国际台的小语言广播大部分是周边国家的民族语言。做好对这些国家的宣传工作，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新闻媒体正确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我们的小语言广播所肩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我们对外宣传的基本任务，是全面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为我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广播对于各个国家都是不受时空限制而且简便迅捷的宣传工具。要做好对外广播的宣传报道，首先必须要有针对性。相信对于这一点，任何人也不会持有异议。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国际广播来说，“宣传的针对性”首先是要使听众能听得懂，否则节目内容再好，也没有什么用，无任何“针对性”可言。如今广播、电视、网络、报刊，各种传媒技术都在迅速发展，但是这些都是“硬件”，而“语言”是主要的软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小语言永远是对外广播宣传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国的小语言广播大多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二十年里，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开办起来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小语言广播的翻译干部都是自己国家培养的人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小语言广播几乎全部是高薪聘请对象国本国前去的知识分子开办的。我们的小语言翻译人才从无到有，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方才达到了今天这样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办广播的水平，并得到了国外广大听众的认同。这是在党和政府的直

接关怀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取得的结果，实在是来之不易的。小语言广播是我们国家对外宣传的一支必不可少的力量，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对她倍加珍惜，倍加爱护，使之在新世纪的对外宣传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非通用语，不能没有你

于　峰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将地球上的语言分为通用语和非通用语。顾名思义，通用语即大家都用，非通用语就是用的人比较少。所谓都用，就是在人类社会的交往中人们都用它，起码在国际间的会议上被规定或不约而同地使用它。可见通用语的主导地位，所以，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偏爱学习通用语，掀起阵阵学习通用语的高潮。

其实，通用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社会地位的提高，它的语言也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地青睐。汉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学校把学习汉语定为必修课。最近，就连美国的犹他州也把学习汉语定为学生们的必修课。汉语被联合国定为国际会议上可使用的语言。我坚信在未来的世界上，汉语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

世界真是太大了，目前，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好统计，但是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多少个民族的分支是难以回答的。要想搞清楚它，必须要下一番苦功夫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答案。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语，很多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每个民族之中还有各自的地方语。这样，世界上就出现了几百种，甚至上千种交流感情的语言工具。这样看来，非通用语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

一、非通用语的功能

自然，在国际社会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多半使用英语这个通用语或其他什么通用语。通用语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或就是在普通情况下，使用非通用语交往、沟通会收到用通用语交往达不到的效果。

就拿笔者所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发展史来说吧。

60 年前，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境内犯下的罪行，广交朋友，瓦解敌人，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首先创办了日语广播。日语节目的播出收到了奇效。通过多途径的工作，不少日本兵纷纷倒戈，与我们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成为了反侵略的一分子。有的至今还与我们在一起做着中日友好工作。试想，当时如不是用日语这个非通用语广播、宣传，对不懂其他语言的广大日本人来说，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吗？

英语——这个通用语的广播、文字宣传，沟通了与各国上层人士及讲英语国家人民之间的往来与感情，作用是巨大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加强了、增多了。随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又有不少种语言陆续开播了。它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60 年代初，毛主席根据当时社会背景，发出了“要把地球管起来”的伟大号召。当时，全国专业外语院校，陆续开办了非通用语专业，并将一批批非通用语优秀毕业生输送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政府的其他重要部门。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仅北京广播学院一家就有 20 多个非通用语专业。非通用语人才的队伍空前壮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开始用一种语言广播，发展到现在每天用 38 种外语和 5 种地方语广播，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电

台。

用非通用语广播宣传，与世界文化交流，收到的奇效、异果，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只从国际广播电台每年收到的听众来信的数量上看，这一点就可以一目了然。据统计，在国际台每年收到的六七十万封信件中，竟有9/10来自讲非通用语的国家或地区。据最新消息，2002年度国际台收到的117万封听众来信中，有16万封是来自讲英语的国家或地区，而其余的100多万封都是来自讲其它语言的国家或地区。可见，用非通用语进行广播宣传、文化交流是多么重要。这是因为目前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多数人们还不精通通用语，或根本不懂通用语。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确凿不移的结论：世界人民需要非通用语。同时，中国也需要用非通用语作工具，以便更好地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

二、在尼泊尔的所见所闻

本人是学习尼泊尔语这个非通用语的。尼泊尔语在非通用语中常常被认为是最一般的非通用语。由于对长期使用尼泊尔语与尼泊尔各阶层的人士交往、交流收到的成果深有体会，所以对其有深厚的感情。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尼泊尔语开播了。开播的第一个月里，就收到了50多封听众来信。一封封来信的内容十分感人。几乎所有来信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亲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以前呼号）的先生们、女士们，得知并收听到贵台用尼泊尔语广播的节目真是又高兴又激动，我和我的家人都流下了喜悦的眼泪。我们奔走相告，与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谈起你们用世界上很不起眼的尼泊尔语进行广播，我们感到万分的自豪和荣幸，这是你们对我们民族的尊重和重视。

以后，在尼泊尔学习、工作的5年多时间里，更是深刻地体会到尼泊尔人民的这种真实感情。

尼泊尔是一个美丽的山国，交通不很发达。在首都加德满都能接触到的外国人，多数都讲英语，由于语言不通，彼此间只好敬而远之。当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张口闭口能讲一口流利的尼泊尔语时，他们先是不信，然后，惊奇、好奇，最后与我交友，并把我当成他们之中的一员。因为我讲的是他们的语言，所以在尼泊尔工作，作为尼泊尔语翻译要比英语翻译办事速度快、效率高。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总追在身后热情地叫“妈妈”（“妈妈”在尼泊尔语中是“舅舅”的意思），觉得我们是妈妈的娘家人。所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和在尼泊尔援建的中国工程组、承包公司等都首选安排尼泊尔语翻译。

我们国家的老一辈领导人是十分重视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和使用的。他们了解非通用语人才的苦与乐，所以，十分尊重他们。例如，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和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都非常关心我们这些非通用语翻译。在接见完外宾以后，只要有机会，总是关心地询问我们几句。

国际台尼泊尔语言部所有老同志都先后多次为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并为他们和其他各类代表团出访的讲话稿译稿。现今，也有不少同志给江泽民等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了国家三代领导人对非通用语是多么重视与爱护。

国家不分远近，民族不分大小，大家一律平等。虽然语言被分为通用语和非通用语，但是，它们同样重要。如果到讲非通用语的国家去访问，有条件的话，能用其本国语言进行交流，这是最佳选择，也是我们忠实执行我国外交政策的很好体现。

另外，讲非通用语国家的政府官员，不都是能熟练地听、讲英语这个通用语的。就是他们本人还可以，他们的夫人们却不一

定讲得好。如果在一些盛大的外交场合中只讲英语，那么，有些夫人们可就惨了。她们只能一步不离地跟在自己先生的身后，从始至终免开尊口。但是，一旦用当地语言交往、交流，那些到场的夫人们，立刻像换了个人似的，顿时活跃起来。她们的话多了，笑得开心了。夫人影响到丈夫。这时，全会场或宴会厅的气氛会大大地热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沟通思想、交流感情，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达到广交朋友的目的。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的事业会顺利地进展。

80年代初，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有一年春节，我们在国外邀请当地有关朋友与我们一起欢度春节。在联欢会上，我们为朋友们放映了中国电影《喜盈门》。故事情节的曲折，更加上尼泊尔语同声翻译，使影厅内的热烈气氛一次又一次地达到高潮。事后，不少朋友激动地对翻译说，电影故事的情节使我们欢笑不止，一个外国人能用我们的语言为我们服务使我们激动不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当时，我对此话不太理解，甚至觉得有点小题大作。然而，十年后，当看到大街上有的外国人用一口流利的汉语与我们交谈，舞台上像被称为“中国通——大山”一样的各种肤色人用标准的普通话表演节目时，真的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与荣耀，中国的国际地位真的提高了！现在想起来，一个历史上长期受人欺负的弱小国家尼泊尔，能在自己的家门口听到来自大国的人流利地讲他们的语言所产生的快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从以上几个事例不难看出，非通用语在一些特殊场合下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它真是起到了通用语所起不到的作用。

三、通用语和非通用语像健全人的两条腿

自然界有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显得如此

绚丽多彩。生活中有了酸、甜、苦、辣、咸，才使我们的日子如此丰富迷人。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民族，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不同，他们都各自讲着自己的语言。当不同的语言可以表达同一种感情时，我们的世界将变得无限美好。

想把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民族和人民都统一到一种或几种通用语下进行往来和交流，目前是办不到的或根本不可能。用所有的非通用语进行交流和交往更难。

那么，通用语和非通用语的关系是什么呢？

有人说："它们就像一辆车子上的左右轮子并驾齐驱，又像飞机上的两个翅膀比翼双飞。"尽管这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它们倒更像一个健全人的两条腿。车缺轮不跑，机缺翼不飞。而一条腿的残疾人可以凭借着拐杖或其他什么工具蹦蹦跳跳地或蹒跚地向前走。不管他付出多少代价，用多少时间，照样可以到达目的地。至于说其中的辛苦，完成的质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国际间大型活动的交往工具是通用语。尽管它像独腿一条，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也是最佳选择。为了达到最理想的结果，在出席大型国际活动的代表团中，往往请出了能讲有关非通用语的翻译做第二条腿。非通用协助通用，共同完成大业。

在日常国际交往中，有的时候通用语也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例如，对象国的百姓，尤其是它的官员们的通用语水平低下时，能讲非通用语的外国人可就成了英雄了。

我上面所说的意思是：不管通用语还是非通用语都同样重要。它们就像一个健全人的双腿，虽然缺一可以生存，但是生活得不潇洒。

所以说，搞通用语的不可自傲，讲非通用语的不必自卑，更不必自惭形秽，二者的前途都无限美好。通用语和非通用语相辅相成，应通力合作，为祖国母亲走好每时每刻。

四、某些非通用语的现状

从理论上讲，大家都会说通用语和非通用语同样重要，不可厚此薄彼。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些部门和有些人，把通用语当成老大，而对某些非通用语则重视不够，还时不时地要把一些非通用语砍掉。老大可以经常得到优惠、照顾，而老二辛辛苦苦干一生，有的不说收入比人少，在退休时连个教授职称都拿不到。所谓的“名额有限”这把锁链把不少人给卡住了，这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心。所以，一时间，某些非通用语人才流失现象严重。这就造成了一段时间内某些非通用语后备人才的匮乏。

以国际台为例。有的非通用语部组曾因为人手不够，不得不将半个小时的综合性节目改成只有15分钟的新闻单播。有的语言部组也正在告急。如再不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不久的将来情况可能更严重。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之词。据了解，50、60、70年代半个小时节目的语言部组人员编制是12人。而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有的语言部组只有四五个人上班。有时，只有三四个人维持着日常工作。可想而知，他们的工作是何等辛苦！

70年代初先后开播的一些语言部组的第一代非通用语人才，现都已五六十岁。近两年来，已有不少人陆续退休。有退休的，就应该有接班的。然而，有些非通用语由于接班人找不到或不够，这些已经退休的老同志只好又回到工作岗位上坚持着日常工作。

另外，还没到退休年龄的一些语言部组，也早已出现了老龄化。据统计，有的语言部组的平均年龄已是57岁。从国际台看全国，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

分析起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这与“文化大革命”不无关系。

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空前地好，社会空前地稳定。那些搞非通用语的有识之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奋发图强，为国家默默地做着贡献。然而，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人这山望着那山高，丢掉了最初的理想、最初的选择，一头扎进商海里去了。

第三，学通用语的人才济济，不但工作面宽，而且毕业后一旦受聘于一些公司，他的工资实在不菲。而一些学非通用语的人才虽少，但他们就业面较窄，就业后有的工资收入不高。就是在同一单位，由于种种原因，通用语和非通用语，甚至非通用语和非通用语之间的收入差别也不小。再加上个别领导的不重视，一些学习非通用语的年轻人来到工作岗位后往往只热乎了三五年，有的甚至一两年后就纷纷跳槽。

可喜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已发现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重新重视这个问题，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了爱护与培养非通用语人才的工作力度。

例如，国际台每月给搞非通用语的工作人员多发 50 元的小语种补贴费。从数字上看，甚少；但是，从精神上看，它给了人以关怀之情和无限的温暖。为此，不少搞非通用语的同志激动地说：钱少情谊重！这份情谊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只要我们得到了承认，就足够了。

用健康人的目光审视一切，用健康人的思维统筹全局，用健康人的双腿走好未来，这是学通用语和学非通用语人的共同心声。

五、分秒必争，培养非通用语人才

培养好的、完全合格的接班人必须有两个工作要做。

第一，选择优秀合格的老师任教。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一个非通用语教师的作用非同一般。他们必须德才兼备，二者缺一不可。

德，任教教师自身必须要有社会主义的德，热爱自己非通用语言的德，为党的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终生献身的德，这就是敬业精神。只有这样的教师，他们才能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天的第一节课上，以自己的亲身感受热情地、发自内心地帮助学生们树立专业思想。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今后长达几年的教学工作中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地巩固学生们用非通用语为祖国奋斗的决心。反之，一个连自己都不热爱自己所从事的非通用语教学的人，怎么能培养出优秀的合格接班人呢？

才，任教教师要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知识。对所教授语言的语音要准确、纯正、清晰，语法要精通，使教和学都有一个高起点。

大家都知道，培养一个非通用语人才是十分不易的。由于是小语言，了解它的人甚少，精通它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大学里从开始教学就要高薪聘请外籍教师或专家，用大量外汇购买各种资料……凡此种种，培养一个非通用语人才，要比培养一个通用语人才付出的费用高得多。再者，学习通用语的同学在中学里就有了一定的基础，更有几辈人教授通用语的经验与教训，有完整、成熟的课本，教学水平起点高。学生们只要刻苦攻读，就可以取得较快的进步。

而非通用语的教学是从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由于资料少，有的没有一套完整的教材，全凭任课老师课下用多于通用语老师许多倍的努力去编写教材，一字一句地传授起步。

难怪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东欧各国，对于从事非通用语的人给予了各种优惠和照顾。

所以说，有了教师的德才兼备，学生们就会早成才、成大

才。由此可见，选派好非通用语的教师是培养、造就非通用语人才的第一要素。

然而，选派非通用语教师也是不容易的。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国家的一些非通用语人才，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60年代中培养起来的。如今，这些人已陆续退休，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这些非通用语的第一代元老。他们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语言基础。鉴于他们身后的接班人已断档或将要断档，在他们即将退休或已退休之际，应选用他们之中健康的优秀人才，利用其余热，再发挥他们的作用。像抢修工程一样，加大力度培养非通用语的新一代接班人是当务之急。

然而，教师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除教师本人加强自身的修养、不断地完善自己外，有关部门、有关领导都要在思想上关心他们，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保持一个好的或较好的教师队伍。

第二，选好学习非通用语的苗子。学校要选那些立志为党的文化交流、宣传事业献终生的人，拒收那种一时兴起、朝三暮四或易受外界影响的学生入学。也不要为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所左右，拒绝那些把学习非通用语专业当成跳板的人进校。否则，他们一有动作，就会影响一大片，涣散队伍，甚至使整个非通用语的队伍难于稳定。

在这一点上，北京广播学院是有识之院校。它一直在为国家培养非通用语人才苦苦奋斗着，尽管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一些部门输送了不少非通用语优秀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词汇的大量出现，通用语对非通用语产生了更多的影响并向非通用语渗透。北京广播学院看准了这一特点，毅然采取了双语教学，为培养优秀的非通用语人才树起了一面旗帜。北京广播学院是培养非通用语人才的楷模。

六、最后几句话

就在本人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中国的几大媒体传来了两条与非通用语有关的消息。

消息一：二战时期，美国的一支由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在一次决定胜负的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印第安人，讲的是本民族土语。日本侵略者无法破译他们用印第安语编用的密码，最后惨遭失败。时至今日，美国政府还念念不忘他们的历史功绩。尽管他们之中的多数人现已不在世上，但是，政府还是给他们补发了迟到50多年的嘉奖令。这是对他们本人的肯定，也是对非通用语作用的肯定。

消息二：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但是，有些非通用语的翻译至今还没有落实。希望会“某某、某某……”等非通用语言的同志能赶快与大会组委会联系！呀！真是到了用时才知道没有非通用语人才是不行的（后来又有报道，共有40多种语言的人才应征，而非通用语人才的队伍中不少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和老太太们了）。

从以上两条短新闻中，让我们看到了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非通用语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在此，我再一次重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非通用语真的起到了通用语所起不到的作用。

中国已经入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将更加活跃、频繁。

中国已申奥成功。2008年世界上将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运动员云集北京。

让我们以健康人的健壮身躯迎接客人们的到来！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非通用语，不能没有你。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从工作实践看非通用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

刘特平

从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荷兰语专业毕业后的30多年里，我的绝大部分工作经历是与荷兰语打交道。从个人工作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掌握好荷兰语这门国际非通用语，对于扩大我国与荷语国家间的政治、文化、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荷兰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

荷兰语在国际上是一种非通用语言。要认识它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首先要从荷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讲起。荷兰位于西欧，面积41 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 600多万。荷兰语是荷兰的官方语言。荷兰居民在日常交流中都用荷兰语。荷兰政府的一切文件、议会辩论都必须用荷兰语。报刊、广播、电视也都用荷兰语。

从面积和人口上说，荷兰是一个小国。但从经济贸易、科学技术上说，却是一个极其发达的国家。人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万美元，居世界前列。每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 000多亿美元，居世界前10名（200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第一次赶上荷兰）。荷兰工农业极其发达。农业产品（包括园艺、畜牧品、花卉业、蔬菜、水果等）出口值每年都排在世界的前列（3－4名），是世

界闻名的鲜花王国，鲜花销量占全世界总销量的65%。工业中的电子（飞利浦公司）、化工（DSM公司）、石油化工（壳牌公司）、医药（阿克苏公司）、飞机制造（福克公司）、汽车制造业、船舶制造业（IHC公司）、食品工业等在国际同行业中都享有盛誉。壳牌石油公司、飞利浦公司、阿克苏公司、尤尼莱佛公司（现称联合利华公司）、ING银行、ABN－AMRO银行和万客隆（连锁超市）等都是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陆海空交通运输四通八达。鹿特丹港年吞吐量（2.7亿－3.0亿吨）连续几十年雄踞世界第一。荷兰是一个低地国家，全国总面积约一半低于海平面（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低于海平面约5米），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荷兰人民具有与海洋长期斗争的优良传统，并使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举世闻名的北海拦海大坝和莱茵河三角洲工程被称为当今世界水利工程的典范。

16－17世纪期间，荷兰曾经是世界海上强国，其殖民主义的足迹曾遍及我国台湾、印尼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外向性在荷兰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荷兰人自豪地说："上帝创造了宇宙，荷兰人创造了荷兰。"我曾经与荷兰贸促会一位朋友探讨这一说法。他认为，不能仅仅从与海洋长期斗争才创造荷兰去认识这句话的含义。他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国际交往就没有发达的荷兰。我认为他的解释是蛮有道理的。荷兰人不仅用双手开拓荷兰的土地，荷兰人历来重视加强与外界的交往才是荷兰发达的根本。试想，没有国际交往、没有资本输出，弹丸之地的荷兰能成为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吗？由于荷兰经济的外向性，而经济交往是离不开人的交往的。因此，荷兰政府一贯重视教育，尤其是语言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除了强化母语教育外，还特别重视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教育。国民教育水平很高，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随着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荷兰目前

也特别重视汉语的教育，莱登大学设立有汉学院，政府允许民间开办中文学校，拨款帮华人办学。电视台也设立了华语广播节目。荷兰政府认为，荷兰经济的外向性决定了荷兰人必须更多地学习和了解外国文化。

由于荷兰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已有9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组织也特别重视荷兰语的传播和教育。日本有的大学开办了荷兰语课，出版了《荷和字典》，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到荷兰留学。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国每年也向荷兰派遣大量的留学生。

欧盟经济是世界三大经济（美、日、欧）力量之一。荷兰是欧共体的创始国之一。荷兰语也是欧共体官方语言之一。至今欧共体的一切重要文件中，除英、法、德、意、西5大语种外，也都有荷兰文版本。欧盟举行会议，同声翻译中也有荷兰语。

荷兰语除了在荷兰本土广泛使用外，在比利时、苏里南（南美洲）、南非等国的运用也相当普遍。操佛兰芒语的人口约占比利时总人口的60%，佛兰芒语实际上就是荷兰语，发音和拼写与荷兰语几乎完全一样。佛兰芒语和法语是比利时的官方用语，比利时宪法规定，比利时居民必须接受这两种语言的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一切官方文件必须采用两种语言，交通标志也必须采用两种文字。荷兰语也是苏里南的官方用语，苏里南的小、中、大学教学全部采用荷兰语。南非的语言也很有意思，官方用语是英语，但古荷兰语在日常生活中也被广泛运用，古荷兰语是现代荷兰语的前身。荷兰语的改革始于19世纪中叶。根据有关资料反映，全世界约有3000万人说荷兰语。

二、我国与荷语国家的国际交流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如上所述，以荷兰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3个：荷兰、比利时、苏里南。下面我将着重以荷兰为例来阐述我国与荷语国家的国际交流。

荷兰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殖民强国。17世纪初期，荷兰人在我国东南沿海的贸易便已开始。据史料记载，荷兰是最早输入中国茶叶的欧洲国家。荷兰语字典中THEE（即茶叶）一词明确注明来自汉语，其发音显然不是中国长江以北的汉语发音。说茶叶是THEE的地区只有福建闽南地区和广东潮汕地区。今天的汕头市早在200多年前还只是一个小渔村，而泉州市早在明朝初期便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一个对外通商口岸。由此可见THEE的发音取自闽南方言是确定无疑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荷兰便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与我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此后，两国外交关系虽经历了一些波折（主要因荷兰向中国台湾出售潜艇引起），但90年代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领导人互访十分频繁：1995年6月，荷兰首相柯克率企业家代表团访华，同年荷兰外贸大臣范多克、发展合作大臣普尤克相继访华；1995年10月，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访问了荷兰；1998年2月，李鹏在任国务院总理期间访问荷兰，随后荷兰经济大臣易伯玛访华；1999年4月，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斯访华，副首相兼经济大臣尤里茨玛率大型企业家团随访；2000年4月，李岚清副总理访问荷兰；同年7月，朱镕基总理访问荷兰，同年11月，荷兰外贸大臣易伯玛访华。

在经济贸易往来方面，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发展十分迅速。20世纪50年代两国双边贸易额平均每年不超过1亿美元，70年代

年平均贸易额约3亿美元，80年代达20多亿美元，90年代初期达40多亿美元，2000年已迅速发展到79多亿美元。在欧洲国家中，荷兰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超过法国和意大利，仅次于德国和英国。在全世界，荷兰也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在我国与荷兰的贸易中，最近20年我方累计贸易顺差达250多亿美元，其中仅2000年的顺差便达到54亿多美元。中荷贸易的迅速发展为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对荷兰出口的商品主要为：轻工产品、粮油食品、畜产品、服装、纺织品、抽纱、工艺品、五金制品、矿产品、化工产品、医药、机械设备及工具等；我自荷兰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粮油、纸制品、有色金属、通讯设备、船舶、航空设备、化工原料、机电产品等。

改革开放以后，荷兰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重点国家之一。截至2000年底，中国与荷兰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450项，总金额约23亿美元。其中2000年双方签订技术引进合同122项，合同金额6亿多美元。我国从荷兰引进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例如，化肥生产线、军用扫描仪、医用核磁共振、石油化工、电子通讯、船舶制造、机械运输、温室暖房等，从引进设备和技术的先进性上说，其质量是上乘的。与日本的同类产品相比，荷兰的技术和设备更具有先进性，我国用户对之十分满意。如，从荷兰引进的7套化肥生产线和几十艘大型挖泥船，20多年来一直都在正常运转。

荷兰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也是我国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0年底，荷兰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已达821个，协议投资金额77.39亿美元。2000年1－12月共批准荷在华投资合同99项，协议投资金额36.69亿美元。荷兰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我沿海地区，投资行业集中在电子、通

讯、家电和化工等领域。其中飞利浦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达30亿美元。

中荷两国合作领域是广阔的，1995年12月，荷兰发展合作大臣普尤克和外经贸部部长吴仪会谈时，宣布了对华提供长期发展援助的决定。1996年3月，中荷两国政府签署了中荷关于发展合作的备忘录，确定中荷在扶贫、环保、林业、培训和教育领域进行长期合作。目前正在执行的项目有4个，累计金额5 830.4万荷兰盾。两国已签订了《投资保护协议》、《科学技术合作协议》、《贸易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文化交流协议》等重要文件。

这些协议的签订，为两国间的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国政府定期举办“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会谈，商讨两国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的发展。中荷两国还定期举办农业工作组会议，洽谈农业领域的合作。官方及民间团组互访频繁，每年互访各类团组都在数百个以上。

中荷两国政府不仅建立了高层的频繁互访，地方政府间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北京市与阿姆斯特丹市、上海市与鹿特丹市、南京市与艾因侯温市、浙江省与乌特勒支省等都已建立城市、省际合作关系。广东省、山东省、湖南省等也与荷兰有关部门进行着密切合作。两国经贸关系、政治关系的发展也为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两国互派学者日益增多。荷兰政府也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在荷兰的传播。早在80年代，荷兰电视台便开始开办《你好》节目，该节目每天晚上都播出，主要教荷兰人学习汉语，深受荷兰人欢迎。我们曾在荷兰一些城市旅游，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后，总是很热情地用汉语“你好”和我们打招呼。

比利时在历史上曾经是“尼德兰联邦王国”的一部分，1830年独立。面积30 513平方公里，人口约1 200万。1971年10月

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比利时也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与我国有着悠久的国际交往。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比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关系也像中荷关系一样得到了迅速发展。2000 年，中比双边贸易达 37 亿美元。比在华投资项目也逐年增多，其投资主要集中在医药卫生、化工、机械制造、环境保护等领域。

苏里南曾经是荷兰的殖民地，1975 年宣布独立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苏里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近几年来，国内许多有远见的企业家已开始重视对苏里南市场的开发，除了贸易之外，还在房地产、公路建设、农业合作、森林开采和木材加工等领域进行投资，并已获得了成效。

三、从实践中谈谈我国对荷兰语人才的培养

1965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设立了荷兰语班，聘请两名荷籍教师任教，招收学生 22 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些学生毕业时大部分改行。我是当时没有改行者中的一个。

由于国内大学没有再开荷兰语班，许多国内单位出于工作的需要，曾陆续向荷兰和比利时派遣了少量留学生专修荷兰语。这些学生毕业归国后在外交、军事、文化和科研部门里工作，为促进中荷、中比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至 1999 年，我国赴荷兰和比利时的留学生（公派和自费）大约达 2 000 多人。留学生主要学理工科，这些人毕业后大部分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公司工作。2000 年至现在，留荷学子迅猛增加，据荷方统计，近三年每年赴荷留学的中国学生均超过 1000 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荷兰和比利时都是经济发

达国家，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仍存在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就目前的状况来说，我认为，我国专门从事荷兰语工作和研究的人才实在是太少了。我国至今未开办荷兰语广播，而俄罗斯、日本、印度尼西亚早已有之。我国至今也没有出版过一本像样的《荷华字典》。许多机关和单位与荷兰和比利时有密切交往，但是由于缺乏精通荷兰语人才，工作开展困难重重。80年代我国曾向荷兰派遣常驻记者，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不懂当地语言，听不懂广播，看不懂报纸，许多重要社交场合都难以参加。荷兰和比利时每年有大批旅游者访华，但由于我方缺乏荷兰语翻译，只好用英语代替，部分不懂英语的旅游者回国后反映，要是中国的导游会讲荷兰语就更好了。

我也曾碰到国内许多学者、研究人员或单位来找我，要我帮助翻译荷兰文的文件或资料，他们常常为看不懂文件或资料大伤脑筋，甚至失去了很多招商、招标、投资和贸易等机会。荷兰学者是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他们也十分重视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往往发表在荷兰的报刊上。改革开放初期，我曾拜读过荷兰《国际观察家》月刊和《埃塞维尔》周刊上的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例如，对有关后资本主义时期、东欧经济改革、马克思主义异化论和飞利浦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等问题的研究文章，我认为其中有许多观点值得我国科研机构和政府决策机构参考，于是便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成文，呈送有关机构和部门，他们认为确实有参考价值，并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等刊物上。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中国与荷语国家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文化等

领域的合作存在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双方在文化交流和人员交流方面将越来越频繁。作为迅速变革和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是很有必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从事荷兰语工作的人实在太少了。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荷兰语人才，不仅是中国经济建设现实的需要，而且也是促进中国与荷语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的战略需要。

（2002 年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外语系已招收了一个荷兰语班，这是广院有史以来的第二个荷兰语班，也是目前在中国的第一家。——编者注）

（作者单位：外经贸部）

非通用语文工作者如何为国际交流作出贡献

刘澍庭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国发生了许多影响人类各国各民族生存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不仅遍及欧亚两大陆，而且直接间接地影响到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广大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互相对立，冷战持续了几十年之久；苏联、东欧发生的巨变使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企图独霸世界而不能得逞，世界正在艰难地走向多极化。从这幅粗线条的政治图景可以看出，20世纪所发生的影响整个人类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过去几个世纪都要多，这些事件的影响远比过去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要大，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变化比过去几个世纪的变化都要深刻。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在20世纪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科学技术这一最活跃的生产力又使得世界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世纪是一个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世纪，是一个人类文明取得重大进步的世纪。在这种激烈变化和迅猛发展进程中，翻译工作者肩负着重大责任，通用语言工作者是这样，非通用语言工作者也是这样。

现在，人们在告别旧世纪跨入新世纪之际，不免要回顾过去，当然人们更希望新世纪能给人类带来更光明的前景。人们在回顾和前瞻之际发现，现在人们大量使用的一个词是“全球化”。

大家发现，全世界可以说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个“地球村”与过去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的任何村庄都不大相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广播、电视、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已经使全球亿万人结为毗邻。在“地球村”里，“邻里”之间的交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少的，交流已成为家常便饭。这种交流使得人们开阔了眼界，也使人们大大提高了休戚相关的意识。现在，哪怕是地球某个偏僻角落发生的事件，也会很快传遍全球，引起大家的关注。中东地区的爆炸，南亚的洪水，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伐木声，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有时，一些事件会遭到同声谴责。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对霸权主义行径的声讨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而在6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同胞的大规模屠杀，其惨烈程度可谓空前，但未引起现在这样的关注和谴责，说明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进步又促进了相互间的交流。人们间的相互交流也可以使“邻里”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在相互交流间实现的。在交流将全球结为一个“地球村”、交流成为必要而且日益频繁的时代，掌握外语就掌握了交流的重要手段，掌握诸如英、法等大国语言是掌握了重要交流手段，掌握非通用语同样也是掌握了重要交流手段，大国语言可以在国际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掌握小国语言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作出重要贡献。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和历史发展的经验，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地球村”里，各家各户都是这个村的组成部分，都为这个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都为它的多姿多彩增添了各自的色彩。因此，掌握小国语言的翻译工作者通过介绍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和经验教训，可以使国际交流更丰富多彩，更具体详尽，可以为国家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其贡献有时也可能是不可替代的。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那场运动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波及面之广都是空前的。到了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绝大多数人在经历了几年的“紧跟”之后，越来越感到有些不对头，盲目服从，打派仗，全国武斗，极左思潮泛滥，结果是全国一片混乱，生产萎缩，经济停滞，物资匮乏，生活困难。这时，绝大多数人不仅希望回过头来看一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希望弄清这场运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更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运动，打开国门，恢复建设，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这里的绝大多数不仅包括广大群众，也包括党和国家的上层领导人。就在这时，曾在20世纪30年代访问延安、写出名著《西行漫记》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于1970年访问中国，先后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谈了话，在全国各地参观了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回国后，斯诺先后发表7篇访华文章，介绍了他的所见所闻和他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看法，尤其详细介绍了他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谈话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主席在谈话中特别谈到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为改善两国关系拉开了序幕，也为尼克松访华进行了思想准备。这些文章可以很好地回答绝大多数人心中的那些疑虑，满足大家的渴望。这些文章发表后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这7篇文章中有6篇是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只有一篇发表在美国的《生活》杂志上。当时我在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工作，立即从意大利文译出了这6篇文章，刊登在《参考消息》报上，在国内引起了巨大轰动，《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大大增加，全国各省市都要求加印。后经统计，各地实际加印了260万份，使这份报纸的发行量由400多万份猛增到600多万份。当时由于纸张紧缺，加印数才未能再增加，用洛阳纸贵来形容，可谓名副其实。几篇文章的发表使一份报纸的发行量出现如此大的增幅，这在世界报刊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此后不久，斯诺访华文章由人

民出版社以《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为名出版，发行量达几千万册，成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广大干部和群众阅读的一份重要资料，其影响和作用十分巨大。

如前所述，非通用语工作者可以为国际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但如何作贡献更值得认真研究。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到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工作，先后任翻译、编辑、驻罗马分社记者。在工作中我体会到，国际交流就像一首大合唱，一部交响乐，小国语言是其中的一个声部，缺少了这个声部，这首交响乐就会显得单薄，不够丰满。如何当好这一声部，很值得认真研究。我的一个重要体会是，要以我为主，努力探索，努力挖掘，将凡是有利于我的材料挖掘出来，以丰富这部交流大合唱。

首先，应当认清形势，服务大局。在“地球村”里，各家各户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主要的矛盾和斗争起着决定性作用，左右着总的局势。只有认清局势，抓住最主要的东西，才能挑选出最有价值的材料，译出之后才能有利于大局，服务于大局，才能成为大合唱中一个有价值的声部。

在我刚参加工作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中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两大阵营的对立，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重大变化，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并且被公开暴露。在这种形势下，我国一面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面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样的大局之中，从事意大利语翻译时应该做些什么？也就是说，如何从大局出发，选择有价值的材料，是问题的关键。当时的领导和老同志指出，应当时刻注意以我为主，为中央服务的方针，挑选那些对了解大局、认识大局、对我有利有用的材料译出。于是，我开始在意大利的报刊通讯社的公开材料中进行挑选，译出了诸如意大利与美国的矛盾和有关意大利共产党的许多材料。在20世纪中期之后，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是一个重要角色，其领导人陶里亚蒂、贝林格等在共运中的立场与众不同，也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理论。从大局出发，就要认真关注意共的动向，将这些动向和理论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供中央和有关部门研究。在那些年里，我大量翻译了意共的纲领、政策及理论等材料，比如，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项重大事件的立场和表态，意共领导人的重要言论，意共内部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影响，意共先后提出的十月革命的经验过时论、历史性妥协、第三条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等有关材料，这些材料对了解意共、对反修斗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必须及时注意局势的变化，注意挖掘能预示局势变化的新动向、新趋势、新思潮，以使读者能预见新形势，跟踪新形势，把握新形势。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意共接连发表一系列文章，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纪律措施提出批评，反对所谓共产党的“党内专制”，所有这些预示着，意共将发现重大变化，必须译出来供读者参考。果然，在不久之后的1981年，意共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在此后的一系列活动中，极力与共产党这三个字脱离干系，党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类似的具体实例还很多，这些实例都说明，了解局势的变化，紧跟形势，才能抓住主要矛盾，挑选出有分量的材料译介，才能服务大局。

第二，必须注意对华反应，利于自鉴。所谓对华反应，就是各国各界对我国重大决策、重要行动、我国各方面情况的评价和议论，包括正面的评论和反面的批评。这也是以我为主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国的各项活动和国内各方面的情况都会引起各有关方面的积极评议和反应，有的是表示自己的态度，有的发表评论，有的是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表扬，也有批评。这些反应不仅能使我们看到各方对我们的态度，也能使我们看到自己的

优点、缺点和不足。这像一面镜子，能使我们自鉴，发扬优点，改正缺点，修正错误，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世界上的国家很多，各国的出发点不同，对我国各方面的政策和活动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仅靠通用语工作者搜集的反应会不够全面，非通用语工作者搜集的反应可以作为补充。有时，非通用语工作者搜集的反应很可能是独特的、很有意思的，是通用语工作者搜集的反应所不能替代的。

第三，必须注意搜集对我国各条战线的工作有直接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材料，以利“四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发生重大变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各项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个硬道理展开，翻译工作更应如此。在发展经济方面，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验教训和具体做法，这些经验教训和具体做法对我们无疑都有参考借鉴作用，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减少失误，也可以使我们从别人的经历中预见未来，迎头赶上。当然，翻译工作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不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的，可以说，本来就应该如此。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大量翻译介绍了意大利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很多材料，比如，北方地区如何发展特色经济，国家如何开发较落后的南方，如何发展中小企业等。这些在当时都是比较新鲜的话题，对经济界和决策者们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值得借鉴的东西不仅只局限于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也包括别人的具体做法。这样一来，可以借鉴的材料就十分丰富多彩了，可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动态和新发明、新创造。我在参编部任翻译和在罗马分社任记者期间，尤其注意这些方面的材料，及时发现，及时翻译、报道，为我国各界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一位科学工作者对我说：

"你不是科研工作者，科研的科目又十分广泛，你不可能了解各个科研领域的具体进展情况。但是，你手头掌握的报刊多，只要你发现别人有新发明、新创造就可以报道，这些报道会给我们以启迪，作用之大你是无法想像的。"这位科研工作者还说："有时，一个科研人员为了一个问题冥思苦想，久而不得其解，这时如果外国同行有一个新的思路，他会受到很大启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会迎刃而解。你们的工作不可轻视。你们不要有顾虑，可以大胆报道。"在参编部任翻译期间，我大量报道了意大利在科研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既包括基础科研，也包括应用研究和每个领域的发明创造，刊登在《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报上，很受欢迎。在罗马分社任记者期间，我采写了大量科技消息，有时一个月就达 20 多条，这些消息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有的被《新华文摘》转载，更受到科技工作者的好评。有些医学工作者对我说，你发的很多医学消息很有价值，一些生物医学消息属于基础理论范畴，虽然目前没有实用价值，但具有理论意义，对未来医学发展很有意义。国内的一些单位和企业发现我发的一些科技消息后，直接打电话或发传真到罗马，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材料，有的提出愿与意大利方面直接联系，以便进行合作。可见这些材料确有价值。

第四，必须注意挖掘那些能使读者开阔眼界的材料，以提高人们的现代意识。时代在不断变化，人类也在不断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贡献。敏锐地发现这些贡献，介绍到我国，是每个翻译工作者的重要任务，通用语的工作者是这样，非通用语言工作者也是如此。有时，非通用语言工作者也许起到的只是补遗的作用，但有时这种补遗可能是很精彩很有价值的。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即开始大量介绍意大利有关环境污染及保护环境的材料。当时，我国广大群众虽然早已在环境污染方面深受其害，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环境意识，

对保护环境也没有概念，最多只知道有关日本水俣病的一些零星材料，只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惟利是图、不顾别人死活的个别事例，认为这与其说是污染为害事件不如说是一个政治事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个别事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在当时介绍的意大利的水污染、噪声污染、文物保护等方面的情况更是闻所未闻。在罗马分社工作期间，我又大量报道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垃圾处理、保护古迹、保护自然景观等等情况，受到了好评。认养文物古迹、认养珍贵树木、认养绿地等观念是我第一个在报道中提出的。现在，像认养绿地等做法也开始在我国实行。所有这些都可以开阔读者的眼界，使读者了解到此前闻所未闻的情况，了解尚未爆发，但潜伏于身边的风险，了解人类生存面临的重大课题中的一些问题，提高人们的全球意识和现代意识，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这是一项十分繁重而又光荣的任务。

第五，必须结合所学语言母国的特殊情况，挖掘该国文明发展中的特长，将这些具有特色的东西介绍进来，供我国借鉴、学习，融化成为自己的东西，丰富本国文化。这一点对于非通用语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

意大利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写出过重要的光辉篇章。古罗马在历史上曾称霸一时，地跨欧亚非三个大陆，整个地中海成为它的国内湖泊，古罗马在国家组织建设、法律、军事、文学、科技、建筑、艺术等众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人类文明史上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在意大利发生，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文学家、诗人，有的人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他们的作品数不胜数，他们的经验极其宝贵。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故乡，

文艺复兴深深扎根于意大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影响一直持续不断，使得意大利成为一个艺术气息浓厚的国家，其文学、艺术、音乐、电影以及与艺术相关的部门一直比较发达，比如工业设计、时装等等。在意大利，各种各样的理论和主义也十分流行，比如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就有新古典主义、未来主义、新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现代派等等。这些理论和流派无不首先发生在意大利，然后流向其他欧美国家和世界各地。在这些理论指导下，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成为世界经典作品或影响深远的作品。介绍所有这些东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作之余的业余时间，我放弃休息，利用周末休息日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参加翻译了一些古典文学名著（如《十日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古典和现代诗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新现实主义电影文学剧本、反黑手党电视剧剧本，以及意大利史、音乐史等。这些作品的译介在中意文化交流中有一定意义。这些作品都是从原文直接翻译过来，不仅对通用语言转译作了补充，也更正了通用语言转译中的一些错讹，可谓原汁原味，这种作用是通用语言所无法起到的。

在国际交流中，掌握通用语言当然有其优势，但非通用语言工作者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做得更专、更深。非通用语言工作者不必因“小”而自卑，而应利用自己的优势，深入挖掘，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我国，懂意大利语的人已经不少，大家在介绍意大利、促进中意交流方面都很努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外交、外贸战线，很多意语人才长期在国外工作，结交了很多“官方的”意大利朋友，了解了很多有关意大利的重要情况，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大大促进了两国间在各个方面的了解和相互交流，很多人还利用业务时间翻译了很多意大利的著作。在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和文化部等部门工作的同志结合自己的专业，对意大利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大量有深度的论

文和书籍，也翻译出很多哲学、政治、文学著作，老一代学者和一些中青年翻译人员译出了诸如但丁的《神曲》等世界文学名著，一些出版社出版了由意大利文直接译出的文学名著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成绩突出。在各大学教授意大利语的教师们一方面培养人才，一方面也在进行研究和翻译，除出版很多种意大利语教材和音像外，也撰写文章书籍，翻译意大利的著作，他们撰写的《意大利文学史》等著作都有相当高的水准。在新闻战线工作的同志们更是多方位、多角度地研究、介绍意大利的情况，出现了很多作品，国际电台的同志们在向意大利介绍中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斐然。懂意大利语的同志们还组织了中国意大利文学学会、意大利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留学意大利的同学组织了欧美同学会留意分会，这些团体经常组织研讨会等活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大大促进了对意大利的研究工作。非通用语言工作者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很有必要，这比分散活动更有好处，有益于更系统、更全面地研究、介绍意大利。总之，懂意大利语的同志在国内还不能说太多，但做出的成绩却不小。只要努力，方式得当，非通用语言也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新华社参编部）

面对国际竞争市场，培养国际非通用语急需人才

杨秀文

如今国际间的竞争是高、精、尖科技的竞争，而高、精、尖科技的竞争来源于一流人才的竞争，但归根结底还是教育的竞争。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正在成为真正的资本和首要财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首屈一指的地位。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间的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外语教学虽然不像高、精、尖科技那样直接和知识经济相关，但外语教学本身是传播知识、信息以及媒介的关键工具，是构成国际市场流通，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桥梁。非通用外语（小语种）当然也包括其中，并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非通用语名称的由来与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

非通用语名称的由来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考虑到外交的需要和当时的外交部没有专门培养翻译的基地，先后两次指示外交部与教育部协商，将1955年交给教育

部管理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重新划归外交部领导。[①]

1962年，外交部在上报周总理审批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外语专业开设的报告中，将英、俄、法、西、阿拉伯语以外的语种称为"小国语"。总理在审批时，把报告中3处提到的"小国语"逐一改为"非通用语"。[②] 这不仅仅是一词的改动，使表达上更为准确，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周总理尊重小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也就是从那时起，"非通用语"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非通用语的快速发展

随着中国外交工作的日益扩大，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不断发展，周总理特别重视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他曾多次指示外交部和教育部多渠道挑选人才到外国语院校学习，甚至可以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派部分优秀学生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学习非通用语言。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自1960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共培养了非通用语翻译几千名。现在不少非通用语专家、学者就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过去的40年中，代表中国各界活跃在全世界各个领域，发挥了非通用语独特的作用，为国家的外交、经援、文化、外宣、教育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中国经济腾飞，社会、文化、经济、科技整合已融入"国际大家庭"，随着中国加入WTO，机遇和挑战并举，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将变得更为重要和严格。而非通用语人才一旦学成，更能展露才华，在经济、文化的大市场上，为国际间交流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杰出的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② 同上，第326页。

献。

二、北京广播学院非通用语教学的历史回顾

1958年开始至1965年，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前身外语系共开办过23种非通用语专业。教师最多时曾达100多人(其中外籍专家为60多人)，在校学生最多为600多人，占当时全院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与全国非通用语种和在校学生最多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相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院停办，外语系所有非通用语教师和外籍专家几乎全部流失。直到1990年在学院仅留的几位非通用语专业教师的倡导下，在学院及系领导的正确决策下，在国际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下，非通用语专业教学才重开旗鼓，并逐步恢复元气。到目前为止，国际传播学院已录取了十几个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几百名，仅2000年、2001年招收了两届共340多名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我们培养的非通用语专业毕业生走上了急需的工作岗位，使很多用人单位非通用语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得到了缓解。

三、非通用语教学之路面向何方

当今世界正在走向经济一体化，竞争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有效地提高了世界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地球变小，市场变大，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国投资空前活跃，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整体特征更加突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传媒正在对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形成巨大的挑战。经济全球一体化已不仅仅是概念，也不仅仅是舆论。经济全球一体化正在成为一种现实，一种日见清晰、

逼近我们生活的现实。在这种形势下，非通用语外语办学思路与40年前的“为国家培养、储备外语人才”的计划经济思路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如果只精通一门非通用语（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语言）而不精通通用语，特别是英语，在信息时代面前就会显得举步维艰、力不从心。主要表现为：（1）如何面对IT产业即信息技术产业的突飞猛进。IT产业包罗万象、令人瞠目，特别是INTERNET网络时代的到来，将使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成本大幅度降低，速度几乎被提到了实时交互的程度。因特网技术，将彻底改变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方式，使企业和消费者共处的商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因特网也催生了许多崭新的商业模式。这些新生的商业模式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企业获得客户信息的能力和把这些商业信息转化为赢利机会的能力。非通用语由于发展的时间较短和新技术词汇量的差异，为走捷径，一些非通用语国家常常抛开本国语言而直接用英语代替。（2）接踵而来的巨大瓶颈是：如只精通一门非通用语，毕业后寻找能适应国际市场并且适合于本人的工作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有资料显示，在中国，特别是一些外国独资、中外合资、国家企事业单位在聘用非通用语人才时，要求应聘者一定要具备大学英语四级，甚至六级的水平，还要在现场加试英语。在联合国，招聘翻译的条件就更加苛刻，非通用语工作人员不仅要将母语翻成两种外语，还要求必须拥有将两种外语互译的能力。如此看来，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在校的4年里，时间非常紧迫，他们一定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另外教师也要坚持双语合一（所学的一种非通用语和英语），在排位上不分第一、第二外语；“双语一体”的概念要贯彻始终，使学生在非通用语、英语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二者缺一不可。这样才有可能使学生迎合时代的需要，接受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成为国际市场的急需人才。

四、双语一体教学的思路和设想

双语一体的教学思路

双语一体的教学思路是：学习任何一门非通用语言的学生都必须选择英语作为其二分之一的专业，并且成绩一定要优异。从理论上讲，学生大学毕业后选择工作不应再以专业划分，如过去学习非通用语斯瓦希里语专业的学生，其毕业后只能做和斯语相关的工作。现在学生以二门外语成绩，加之中文和计算机知识水准就便于去挑选相关领域里最合适的工作。今后的就业市场不再是“一厢情愿”，取而代之的是“双向选择”。招聘单位也不会因为他们学习非通用语而将其拒之门外。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学习非通用语和英语双语一体的学生在入学前必须具备学习外语的天赋、交际外向型性格和较宽的知识面。

双语教学的几点设想

(1) 非通用语和英语的教师一定要相互了解，取长补短，不能老死不相往来。教材（除泛读和报刊外）要相对固定。在两种语言并重的前提下，不同教学时期，讲课重点要突出，切不可搞平衡。

(2) 非通用语和英语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授课，如交际法、听说优先等方法，精讲多练。在课堂教学中，不是单纯地讲课文和语法规则，而是努力创造语言条件，采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使学生能有机会大量练习，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3) 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双语教师“双讲”的办法，启发学生在学语言初期迅速摆脱外语神秘、难学的畏难情绪，从而加深学生对非通用语的认识，加快教学进度。

(4) 增强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满堂灌”不是行之有效的

教学方法。在外语课堂教学中注重学生对篇章的理解和实际分析与运用语言能力的训练。在教与学的关系上不能片面地将教师权威绝对化，把学生视为被动接收知识的对象，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对外语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缺乏外语的思维能力，其结果必然是高分低能，只会模仿和记忆，实际应用能力经不住实践的考验。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坚持“双语一体”的教学必须围绕学生实践来实现的方针。一般来说，非通用语都是那些地域不大人口不多的中、小国家的语言，我们要创造条件组织学生到其所学语言所在国驻华使馆参加一些文化交流活动，增加他们对所学语种国的国情和风俗的了解。这样对学生日后所从事的工作会相当有益。

(5) 在双语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些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对不同语种的接受能力有着惊人的天赋。他们认为在掌握外语语言技巧、语法知识以及听说实践上，各种语言都有其相同之处，精通了一门外语，第二种外语的学习难度则大大降低。因此，这些学生在很短时间内就显露出了学习语言的“天才”，成为双语兼优的苗子。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抓住时机，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在英语教学上可打乱教学班，进行分班分级教学。非通用语教学也可采用这种办法，对学习优秀的学生，适当安排“小灶”，鼓励他们尽快成才。相反，对语言接受能力差、久帮无效的学生只能采取“劣者淘汰”的办法。

五、非通用语/英语双语教学要求与培养目标

在教学大纲中我们把双语教学目标定在：培养具有扎实的一门非通用语基础和良好的英语水准，掌握比较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学生一旦学成后，能在对外传播、外事、经贸、文化教

育、科研、商务等部门从事非通用语/英语的工作。

具体地说：学生在4年内，英语要达到专业英语四级水准(证书上分合格、良好、优秀三级)，非通用语专业达到本科水平。

培养非通用语加英语双语人才是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新尝试，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摸索、改进，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非通用语加英语双语人才。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

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

刘才盛

一、世界语的产生

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但是语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缓慢发展的。人类历史中的无数事实证明，因为语言问题严重阻碍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往，阻碍社会进步的事情是很多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人们很早就幻想能有一种简单易行的、大众化的国际交际工具出现。

19世纪资本主义空前发展，需要国际间交际的事情越来越多，同时语言的障碍也日益尖锐起来。创造一种既不受国家和民族局限，又便于国际间交流的国际共同语的要求就越来越紧迫了。当然用一国的民族语来充当国际语，在语言应用的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但都不够成功，只有用中立的、对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丝毫没有霸权气味的语言，才能完成国际语的任务。

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是一位犹太人。创造中立的国际辅助语反映了犹太人渴望人类相互了解的心愿。经过长时期的准备，1887年7月，他公布了简明的16条文法规则，出版了世界语第一部书，标志着世界语的诞生。柴门霍夫在书中声明，他只做这个新语言的创始人，而把创造和丰富这种语言的权利交给世界人民。所以他创造的这种语言，在千百万人的实际应用中日益完

美，逐渐流行于全世界，这种语言就是现今被我们称作世界语的国际辅助语。

世界语是一种非民族语言，它不排斥任何民族语言，同时还具有很多优越性：因为它是中立的国际辅助语，使用它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民族感情，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另外，这种语言读写统一，每个字母代表一个音，没有不规则的变音或不发音的字母；重音永远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所以学会了发音就能读出所有的单词，为人们的记忆减少了负担。世界语是在印欧语系语言的基础上，吸收了欧洲各主要语言的长处，去掉了其中不合理的成分而采用了合理的成分创造的。由于它有广泛的民族语言基础，所以使人们感到它并不陌生。再有，它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词根、前缀、后缀，只要学习 1 000 多个词根，就能创造出好几千个新词来，而且不管是谁创造的词汇，别的人都能懂。世界语的语法规则富有科学性、逻辑性和合理性，易懂易学。正是因为世界语具有上述优点，所以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完全可以和自然的语言媲美。它的诞生是语言学历史上的一大成功。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有学习和推广世界语的组织。国际上，除了国际世界语协会之外，还有一百多个国际世界语组织。20 世纪 80 年代时统计，世界上有一千多万人学习和应用世界语。

二、世界语传入中国

1905 年，一位俄国人在上海首先开办了世界语讲习班。而在这之前，俄国商人在哈尔滨也传授过世界语。1908 年，留学日本的刘师培等人回国，也在上海开办了世界语传习所。与此同时留学法国和英国的一些中国学生也经常给国内写信，介绍和传播世界语。这样，在 20 世纪初便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世界语者。

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对世界语都是支持的。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他早在留学德国期间（1907－1911）就自学了世界语，在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他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该校将世界语先后列为选修课和正式课程。蔡元培对世界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鲁迅先生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过世界语讲座。回国后，他发表文章支持世界语，亲自翻译俄国世界语者的著作，并把外国世界语者介绍到北京大学教授这种语言。在他主编的刊物上专门为世界语者提供一个发表译作的园地，此外，他还从经济上多次资助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和上海世界语杂志。

谈到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我还想特别指出胡愈之同志（原中国民盟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莫斯科印象记》在指引中国人学习世界语方面的巨大作用。胡愈之是1913年自学世界语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胡愈之被迫流亡国外，他通过世界语者的关系，先到法国考察，后又到德国，1931年回国途中，经过莫斯科，在苏联世界语者的帮助下，他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拜谒了列宁墓，还到一些工厂、国营农场、商店、大学、小学、托儿所、剧院以及工人住宅区进行考察，参加工人和青年的一些集会，会见苏联世界语者同盟的领导人，接触苏联的工人、农民、学生、作家和教授等各方面的人士，回国后他把自己在苏联7天的感受写成《莫斯科印象记》，首先在《社会与教育》杂志上连载，每周一段，后来汇集成册出版。该书在一年的时间里就重印了5次。这本书冲破新闻封锁，第一次向中国人民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在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指引了许多青年学习世界语并走上革命道路。很多中国的世界语者，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少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都读过这本

书。

三、世界语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

世界语传入中国之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20世纪初叶到"九一八"事变，可以认为是世界语在中国的第一时期，这一时期它的任务是为世界语而奋斗。从"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第二个时期，它的任务是为中国的解放而使用世界语。从建国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世界语在中国的第三个时期，它的任务是用世界语为祖国服务，为争取世界和平服务。从1978年至今为第四个时期，它的任务是用世界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服务，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服务，为保卫世界和平服务。

我认为中国的世界语运动的主流是进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1931年12月3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世界语组织——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China Prolea Esperantista Unio)，语联一共存在了5年时间。1933年1月22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诞生了。这个协会把函授学社、世界语书店、世界语讲习班作为自己的事业，出版刊物《世界》，另外还成立了世界语图书馆和巡回教授团，向一些大学派遣世界语教师。1933年9月10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有良知的世界语者就开始把世界语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为捍卫国家的独立而奋斗。汉口世界语学会的会刊《希望》在1931年第8-9期合刊上曾刊出了世界语文章《全世界人民请注意，世界和平正在受到威胁》，该文以第一速度、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世界语者揭露了日本军队在中国

的暴行，报道了日军侵占沈阳、长春和吉林后，用机关枪任意射击中国的和平居民的罪行。

1931 年第 10 期世界语杂志《希望》刊出了闻名国际世界语界的《我们的宣言》，宣言详细陈述了日军入侵东北的经过，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大和国”。宣言共印了 8500 份，分别寄往欧美各国以及日本和朝鲜。该文很快得到广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声援。日本世界语者寄来了不少声讨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信件。编辑部同时还收到来自苏联、保加利亚、德国、奥地利、荷兰、法国、捷克、英国和新西兰等国世界语团体和个人的来信。该文曾被译成 8 种外文，在 14 种国外报刊上发表。

在宣传抗战的世界语刊物中，1939 年创刊的《中国报道》举足轻重，这本刊物是进步世界语者叶籁士同志在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及其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用世界语向国外宣传抗日的刊物。该刊为半月刊，铅印，16 开，每期印刷 9 000 份，寄往 63 个国家和地区，在 850 个城市有自己的读者。许多同情中国抗战的世界语者成了《中国报道》的代销人，该刊于 1945 年 3 月停刊。这里还应该特别说一说日本进步世界语者绿川英子为《中国报道》写稿的事情。绿川英子是《中国报道》的主要世界语撰稿人之一，她以流利的语言，犀利的文风，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诗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她的世界语长诗《市区的两个苹果》还由著名诗人、文艺批评家胡风译成中文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绿川英子还作为中国广播电台的日语播音员在对外广播中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

1936 年 4 月世界语版的《中国怒吼》创刊。这本刊物 16 开 8 版，每月出版一期，1937 年“八一三”事变以后改为每 10 天一期，1940 年 12 月停刊，历时 4 年多。对中国的世界语的传

播、对争取世界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6年9月20日，在《中国怒吼》上发表了《致全球世界语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请求各国世界语朋友多给报刊的编辑部写信，并积极向当地媒体推荐《中国怒吼》。该信还请求各国世界语广泛征集本国人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并成立"中国之友会"。"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中国怒吼》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答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的一封信。信中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停止内战的态度。1937年10月25日，《中国怒吼》在头版刊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声明中说为了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决定放弃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红色政权的立场，取消了苏维埃政权，改编了红军的名称及番号，在战时委员会的调遣下成立国民革命军。《中国怒吼》对东北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对红军及苏区人民抗日斗争都做了大量报道。这本刊物还刊登世界各国世界语组织及个人来信。它把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传到世界各地去，日本读者把这些材料译成日文后到日本人民中广为传播，中日两国世界语者之间的这种联系保持到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分社遭到封闭为止。

抗战期间，重庆是中国世界语宣传的重要基地。而随着一批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到来，革命圣地延安的世界语者也开始活跃起来。"七七"事变之后，抗日军政大学办起了我党第一个世界语班。1938年5月6日成立了我党第一个在解放区的世界语组织——延安世界语者协会。次年12月15日，为纪念柴门霍夫诞辰80周年，在杨家岭举办了世界语展览，毛泽东同志于12月9日亲自为展览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四、建国以后的世界语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世界语宣传进人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世界语在广交朋友、宣传新中国、宣传改革开放、捍卫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我要着重提一下《中国报道》杂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和中国的世界语对外广播方面所做的工作。

世界语版的《中国报道》杂志创刊于1950年5月，它的办刊宗旨是：全面报道中国，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半个世纪的事实证明这本杂志完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杂志经常向读者介绍中国的概况和自然风光，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的民风民俗，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国前进的步伐，中国的世界语运动等等。

《中国报道》杂志在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创刊以来，这本杂志以大量的篇幅向读者介绍了中国的概况、中国绮丽的自然风光、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和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国各地的民风民俗、中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特别是围绕主旋律，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人民在干些什么，让他们了解中国前进的步伐。同时也报道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世界语运动的消息。

杂志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创刊以来，《中国报道》共发表了330多篇诗歌，150多篇小说，87篇小品、杂文、报告文学，100多篇神话、寓言、民间故事。在介绍的古典诗歌和文学作品当中，有《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名篇，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等等。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

名著在这本杂志上都刊登了节选。

《中国报道》实际上已成为一份在国际世界语界享有盛誉的刊物。许多外国世界语者亲切地称它为“我们的杂志”。每年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中国报道》都要举行读者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许多读者都用最美好的语言赞美它，同时给它提出好的建议。在它经济上遇到困难时，有的读者慷慨解囊，给予帮助。比利时读者查理·吉斯林立下遗嘱，决定身后把自己的全部遗产交给《中国报道》以支持发展世界语事业。吉斯林先生生前以种花、卖花为生，生活十分俭朴。他通过长期阅读《中国报道》对中国有了很深的感情，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1989年老人因病不幸逝世。公证人按照老人的心愿，办理了遗产过户手续，实现了老人的心愿。这一动人的事例说明，在促进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方面，世界语版的《中国报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报道》编辑部每年都能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千余封。这些忠实的读者为《中国报道》倾注了一片爱心。德国读者格尔哈德·卡尔霍夫说：“我非常喜欢这本刊物，因为它极好地报道了中国。我经常向我的学生介绍刊物中的一些有趣的文章。”荷兰读者托恩德来信说：“人们可以从刊物中了解到很多方面的事情，比如有关经济、历史、地理状况等等。社会生活也没有被忽视。刊物的文字简单易懂，即使是科技方面的文章也是如此。最令人高兴的是通过贵刊可以了解现代中国的许多方面，它展示了许多尚未被人们认识的事物，并向西方世界正视现实的中国和西方有些人想象中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曾任国际世协总干事的西莫·米洛耶维奇给《中国报道》写信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报道》为世界各地的读者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及社会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数以千计的世界语读者来说，它过去是，现在和将来都是了解中国的窗口，你

们的国家有着绚丽多彩的过去。现在它正致力于现代化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贵国对许多人来说，是遥远的和陌生的，由于贵刊的存在，这个距离缩短了，人们对中国也比较了解了。”俄罗斯读者科列恩科夫说：“说心里话，有关改革的文章是非常有趣而切合实际的。现在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改革，他们需要一种模式，而中国的模式无疑是成功的。没有过多的框框，就可以使人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大概这正是中国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大量的中国商品打入国际市场的秘诀。”另一位俄罗斯读者科尔达来信说：“从前我对中国人的感觉是，他们的生活十分贫困。现在读了贵刊，我才知道，中国正在以每年10－20%的增长速度前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人均收入有很大增长，我实在是羡慕中国。我为中国人而高兴，每当谈起贫困生活和改革时，我总要把中国作为范例。”类似的信件多得数不胜数，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语的出版工作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报道》除了办好杂志外，还出版了一部分图书。外文出版社和80年代成立的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使我国的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多年来，我们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及毛主席著作的各种单行本，《鲁迅小说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聊斋志异选》、《论语》、《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中国文学作品选》（共三卷），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寒夜》，郭沫若的剧本《虎符》、《屈原》，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杨沫的《青春之歌》，叶君健的《山村》，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以及《中国诗歌选译》、《中国概貌》、《中华五千年》、《中国近代史题话》、《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家》、《中国医药史话》、《中国陶瓷史话》、《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国少数民族风情》、《中国40景》等各方面的图书数百种。

1964年12月19日中国的世界语广播正式开播。目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节目每天对欧洲、东南亚、大洋洲、东北亚和拉丁美洲4个方向用8个波段各播出一次，每次30分钟。合计每周播出时间为28小时。广播的时间在全世界14家世界语电台中名列第二，但其覆盖面却名列第一。

30多年来，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前15年，每周仅做两套节目，只能是期刊式的。一般说来一套节目除开始曲、结束曲外都由新闻、专稿和音乐三部分组成。新闻稿不追求时效，绝大部分为国内重要消息。1979年以后，节目开始增容，每周制作4套节目。从1982年开始，世界语广播实行专题节目编辑责任制。每个专题有一位编辑负责完成采访、编辑和翻译的全部工作。现在中国国际台的世界语广播办得很有特色，它的主要专题节目有：《世界语在前进》、《文学》、《在中国旅行》、《中国文化》、《中国经济纵横》、《社会生活》、《世界之窗》、《听众信箱》等。

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受到了外国听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许多听众不仅自己收听广播，而且组织听众俱乐部集体收听，有的听众还通过出海报、办展览、出售广播节目盒式磁带等方式热情宣传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国际台的世界语部每年能收到1000余封听众来信。国际世界语协会前会长、现任副会长汉弗莱·汤金教授称赞中国的世界语广播是“全世界世界语广播的楷模”。德国听众费舍尔来信说：“你们孜孜不倦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它编织了友谊的纽带，把你们伟大、光荣的国家同我的祖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意大利听众马尔科·弗兰佐尼1974年时还是个9岁的孩子，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开始收听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并经常写信告诉我们的国际台他收听的情况。20年之后他来信说：“借助于世界语广播，我得以了解你们这个美丽国家的历史、地理、艺术和生活，我还了解贵国人民所取得

的重大成就，我特别欣赏你们在中国、在全世界为推广世界语所作的不懈努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而且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应该成为世界语的旗手。这是中国人民对全人类应作的贡献。”比利时听众阿尔波特在信中说：“几乎每天晚上同一时间，我都要在收音机前收听你们的节目，它使我更加接近中国和中国的文化。应该说，你们的几个关于中国的节目堪称珍品，感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高质量的工作。”国际世界语协会前会长、现任副会长、韩国经济学家李种永教授说：“全世界很多世界语者每天都在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为此，国际世界语协会感谢你们。”他还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世界语广播是世界上听众最多、最广泛的世界语广播。”

五、世界语在科技教育领域

国家要富强，必须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学家。科技要发展，必须开展交流，必须掌握外国语。英语、法语等外国语作为一种语言交际的工具是可以学的，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要学会一种外国语的确不容易，有些人学了半辈子还是不能得心应手地应用。在20世纪初，一部分留法学者就创办了《中国语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专业世界语团体相继成立，为科技世界语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其中1984年6月15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世界语协会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近年来它出版的《世界科学技术》杂志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特别关注。《世界科学技术》不仅用世界语刊登我国科学家的科学论文，还刊登过150篇美、英、法、俄、德、意、日等国科学工作者的论文。

中国科学院科技世界语协会得到了国家科委和中科院领导的重视，40多位科学院院士和著名科学家应聘成为它的名誉顾问。

由中科院召开的国际世界语科技学会于1986、1988、1990、1994和1996年在北京举行过5次国际世界语科技大会。每次出席会议的各国科学家有200到1 000人不等。提供的学术论文一般多在100至300篇。1998年7－8月在北京举办了首届国际世界语针灸班；1991年10月，协会与有关方面合作，在比利时奥斯坦德市成功地举办了“中国周——中国工业技术与产品展览会”。全国12个省市120个厂商参加了展出。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世界语协会还接待了不少外国懂世界语的科学家来华访问。

这里我还想谈谈一个重要的国际科技世界语组织——圣马力诺国际科学院（Akademio Internacia de Sciencoj San Marino），它成立于1985年，世界语是它的正式语言。该院下设6个分部，每个分部有包括若干学部。该院每年组织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和考试。凡论文答辩成功的参加者都能得到相应的科学职称。该院在推广和运用世界语与加速世界语在科技领域的应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国世界语者曾经多次参加过这个组织的活动。

近年来，中国还出版了许多种世界语版的科技图书，尤其是科普书籍。如《谈天说地》、《智慧的火花》、《昆虫形态图解》、《人体解剖学名词》、《微生物遗传学词典》、《汉世英法中医术语词典》和《世界语科学论文集》等。出版世界语科技图书的不仅有中国世界语出版社，还有中国展望出版社、学术期刊出版社、桂林出版社、陕西科技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世界语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它的教育活动，世界语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也是通过教学这一途径的。解放后教育部门对世界语教学比较重视。1963年8月1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高等院校凡有条件的可在外语系开设世界语为第二外语，其他系可开选修课，以培养世界语干部。1982年12月16日教育部又向全国高校下达《关于重申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的

通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和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等135所大学在不同时期分别开办了世界语教学。

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北京广播学院在世界语教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广播学院分别于1961、1962、1964和1989年开办世界语班，这几个班培养出的学生目前都是各地世界语工作的骨干，现任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谭秀珠同志和秘书长于涛同志都是广播学院世界语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分别于1964－1965年和1989－1991年在该院学习过世界语。另外还有许多人现在在外文出版局和国际广播电台担任译审、副译审和其他重要的行政和业务工作。

六、中外世界语界的交往

1980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1986年，在北京举行了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参加者有2482人，被称为欧洲之外规模最大的世界语大会。1992年，在青岛举行了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1996年，在上海举行了第1届亚洲世界语大会。这3次大会报名参加的人数总计有3 500人，此外还不断有外国世界语访华团来我国旅游或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国际世界语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中国世界语者曾多次参加了这个大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每届世界语大会都有中国人参加。每年的国际世界语大会是高水平的学术交流的盛会，中国世界语者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叶君健、陈原、周尧和李士俊等同志在国际大会上分别做过学术报告。他们的报告都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1978年，中国木偶艺术团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市举行的国际木偶节上用世界语演出了我国传统剧《大闹天宫》，由于剧团精湛的表演和流利的语言，使该剧获得了木偶节3项奖励，之后又在南斯拉夫的其他5个城市演出，轰动一时，评价极高。

中外世界语者之间的交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成都、长春、苏州、宁波、洛阳、常州、唐山、湛江等20多个城市的世界语组织和外国友好城市的世界语团体建立了友好和文化交流关系。而其中有些友好城市的建立还是通过世界语者的穿针引线实现的。

可以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世界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大的特殊作用。中国的世界语者运用这种语言为我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和建设服务，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现在它对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外文出版局）

浅谈法语对越南语的影响

夏　露

越南虽只是亚洲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小国，其历史上却与中国、法国、前苏联和美国等大国都曾有过特殊的关系。汉、法、俄、英等语言对越南语也产生了深深浅浅的影响。汉字曾长期作为越南的官方文字，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自不必说。而近现代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日益广泛的对外接触交流，法语、俄语和英语也都影响了越南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使其具有了印欧语系的一些特点。如今，国际上研究汉语与越南语的关系的人很多，而很少有人涉及研究法语、俄语和英语对越南语的影响。在这里我想粗略谈谈法语对现代越南语的影响。

一、历史背景

自17世纪起，法国殖民者就开始窥视越南这块远东的宝地，19世纪中叶，法国武装侵略越南，不久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在侵略越南的过程中自然遭到了越南人民的顽强抵抗。当时越南的传统文化体系是以汉学为基础的。法国殖民者感到要征服越南就必须使之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要用法国文化来同化越南。

法国征服越南以后，在巩固和加强其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基本方针之一，就是从限制汉学人手，直到根除汉

学在越南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从语言交流着手来进行文化渗透是十分有效的方法。1861年9月23日，即法国武力侵占越南南部约一年半时，法国海军上将夏尔内尔同意把伯多禄公教学校改为翻译学校，其主要任务是教法国人学习越南语，教越南人学习法语。1862年，法国第一任交趾支那（南圻）总督鲍那德给法国殖民大臣的信中提出了取缔汉字的办法。他说："首先，当这种与进步不相容的汉字还作为惟一的交流思想的工具的时候，只有发展法国－安南学校，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这是促使转化的最有效的方法。"[1] 皮吉尼尔主教1887年5月4日写给法国殖民大臣的一封信中建议说："首先用欧洲字母写的、称之为'国语'的安南字取代汉字……并宜及早用欧洲字母拼写的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教安南人，使他们能读会写。不需几年就可强制规定正式公文禁止用汉字写，须用本国文字来写，所有的公职人员都须学用欧洲文字拼写的安南字。其时，教法语就会见效，使整整一代公职人员都学习我们的语言（即法语）。"[2] 法国殖民者就是凭借武力和政权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政府公文和学校教育中采用法语，限制汉语。

这一时期，在越南使用3种语言即越南语、汉语、法语和4种文字即汉字、喃字、国语字和法文字。国语原指越南本国的语言，以区别外来的汉语。当创造了喃字以后，国语就用来指喃字。17世纪，教会为越南语创造了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后，国语（国语字）被用来指称这种基于拉丁字母的文字。与法国殖民统治者的意愿相反的是，越南人民自觉地选择了国语作为宣传革命

---

① Colonialism and Language Policy in Viet Nam, John Defrancis, Mouton publisher, the Hague, Paris, New York, 1977, p. 79.

② 国英：《概述法国殖民制度下的越南旧汉学》，汉喃杂志，1987年第1期，第54页。

和争取独立的重要工具。1907年越南民族主义革命家潘佩珠发表《新越南》一文，主张把国语引进越南的教育系统。东京义塾运动成为第一次大规模的普及拼音文字的运动。青年时代的胡志明还曾经在学校里讲授国语。国语文字最终成了广大爱国者的重要武器。

国门被打开以后，西方思想传来，西方先进的东西传入，使越南人感到要学习，要摆脱落后的境地。一些儒士阶层也渐渐走上西学道路，开始学习法语，法语借词也开始渐渐涌入越南语，法语的语法结构也对越南语产生了影响。

二、法语对越南语的影响

法语给越南语的书写形式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

目前越南使用最普遍的文字是拉丁字母文字，但在法国入侵越南之前，越南的官方文字一直是汉字；越南人也曾经有自己创造的文字——喃字，但它也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越南的文字以前一直是方块字。16世纪末，欧洲的传教士到越南传教，一些传教士试用拉丁字母拼读当地的语言，以便于在平民中传教。法国著名传教士亚历山大·罗德曾经于1651年编过《越、葡、拉丁文词典》，被誉为现代越语的创始人。此外，法国传教士百多禄也曾经编写越文、拉丁文词典。1858年法国征服越南以后，他们认为这种拉丁化的越语文字与法语文字比较接近，是同化越南人民的一个有效手段，于是要求推广这种文字以便为普及法语和法文字铺平道路。但是在法属时期，国语字始终处于辅助地位。由于拉丁化的国语字易学易读易写，所以在越南抗法战争时期成了宣传革命、宣传抗法斗争的有力工具。1945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用越语隆重公布了“独立宣言”。

国语文字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在于：它是一种表音而不是表意文字，因此可与语音有较密切的结合；它可以以29个字母和6个声调，并按照一定拼音规则组成数以千计的音节，继而组成数以万计的词汇；它是一种音位字母文字，读法与写法基本一致，易认、易记、易读、易写。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优势，有助于在短时间内普及基本知识，所以越南的扫盲运动极其顺利，国语字也一度成为世界上文字改革的成功典型。但是，国语字也有不足之处：它以29个字母来记录36个音位，导致音位与字母数不相等；少数音位相同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书写符号；一些字母和声调的添加符号造成书写和印刷过程中的困难等等。越南语言和文字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克服国语文字中的上述缺陷。但是，文字的改革仍然需要做许多工作。另外，由于越南历史上长期使用汉字和喃字，各种典籍和文学作品都是用它们写成，这就使得越南的年轻人无法直接阅读这些作品，无法更加客观地了解祖先的文化，造成了文化断层。

法语丰富了现代越语词汇

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通婚、战争征服等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从而产生和促进了各种语言的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其中，最常见的是词语的相互借用。越语是一种有着大量外语借词的语言。据统计，现代越南语中汉语借词约占60%以上，法语借词约占10%左右。从比例上讲，现代越语中的法语借词远远不及汉语借词，但决不能低估它们的作用，因为它们丰富发展了越语词汇。现代越语中的法语借词，大部分是科技、医药、武器、乐器等方面的词语。此外，还包括一部分衣食住行生活方面的词语。法语借词从形成上讲分为两类：一类是懂法语的人吸收和借用的词汇；另一类是虽不懂法语，但在日常生活中，在工厂、军队或家庭生活中有同法国人接触的需求，通过口

口相传而来的词汇。

比较汉语借词和法语借词，我们可以看到代表近现代文明的外语借词多为法语。比如，医药方面，中医方面的词汇几乎全是汉语借词，而西医词汇则绝大部分是法语借词；音乐方面，东方乐器多为汉语借词，西洋乐器多为法语借词。至于衣食住行方面新出现的词也多为法语借词，如 pin（电池）来源于法语 pile；pê-ni-xilin（盘尼西林）来源于法语 péniciline；a-xít（酸性）来源于法语 acide。表示计量单位的词也多为法语借词，如 héc-ta（公顷）来源于法语 hectare，ki-lô（公斤）来源于法语 kilo。ca-nô（汽船，轮船）来源于法语 canot；lôgích（逻辑）来源于法语 logique；xích-lô（三轮车）来源于法语 cyclo-pouse；ra-đi-ô（收音机）来源于法语 radio；bờ-lu（工作服）来源于法语 blou。

法语借词进入越语，虽然都是拉丁字母，但并非直接写入，而是进行了越化处理。

越语之所以吸收大量的法语借词，有如下几点原因：

(1) 当时的越语缺少现代科技术语。当越语与法语接触时，越南的科学水平与西方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越南科学家努力将法语中的许多术语越化，以便在研究和讲解中使用。他们除了翻译自然科学术语外，还将许多自然科学术语引入社会生活中。

(2) 当时越南还没有像法国人那样的表达方法。越南人在学习和使用法语的过程中发现法语中有不少词组和短语的表达方法很新颖，也是越语所不具备的，于是他们吸收了这样的词组和短语来补充越语，使越语更丰富多样，也适应了越南人的交际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这样的词组直接音译自法语，有时是意译，甚至是用汉语借词意译。如：tù' điên sống-dictionnaire vivant（活字典）；giết thì giờ-tuer le temps（消磨时间）等。

(3) 使表达更生动。表达同样的意思，越语也有类似的词

组，但当他们感觉到借入法语词组表达更为生动时，便引入了法语。

如：Vứt tiền qua cửa sổ 和 phung phí tiền bạc 都是“浪费钱财”的意思，但前者译自法语 Jeter l'argent par les fenêtres，越南人认为这样表达更为生动形象，所以便吸收了这种表达。

在现代越语里还有不少来源于法语的词组，它们使用得十分普遍，但几乎很少有人明白它们的来源，尤其是年轻人和不懂法语的人。因为许多进入越语后都进行了越化处理，如：từ A đến Z（从头到尾）来源于法语 depuis A jusqu'a Z，cúp điện（切断电源）来源于法语 couper le courant électrique。

成语、惯用语是一种固定的、不可分割的结构，但越语中有不少成语却源于法语，如：lút ga thả xăng—muốn đến đâu thì đến（想去哪儿就去哪）；àla mode—hợp thời thượng（合乎潮流）。

法语借词也被用于文字游戏中，利用同音、多义现象来达到一定的作用。如：

Anh vẫn chơi ghi ta（guitare）đấy chứ？（你还在弹吉他吗？）

Chơi ghi đông（guidon）thôi（我在弹自行车罢了。）

在越语中，弹吉他是有意义的，但弹 ghi đông（自行车）无意义，这种回答意味着我仍然在弹吉他，但弹得很差。

当然，法语词组在进入越语后，其结构和语义都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结构上由于两种语言的不同，法语里的动词词组进入越语后可能转化为名词词组或介词词组，如 Avoir les yeux plus grands que le ventre—con mắt to hơn cái bụng（眼大肚子小）；介词词组可能转化为动词词组，En chiffres ronds —lấy số tròn（选整数）；而名词词组则可能转化为动词词组或形容词词组等。至于语义上的变化不是很大，主要体现在越语词组可以增加或减

少一些词，以便让越南人更容易接受外来词。

关于越语词汇中法语借词的读音及书写问题

法语与现代越语虽说都使用拉丁字母书写，但法语词汇进入越语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进行了符合越语的语音及书写方式的转变。语言的类型特征影响到了词语的转变。在语音方面，越语与法语有着本质的不同。越语是孤立语，有声调，而法语是屈折语，无声调。在音节构造方面，这两种语言在声母及韵尾上也有所不同。法语里有许多复辅音，而现代越语里无复辅音；法语中有许多开音节，而越语主要是闭音节和半开音节。这样，法语进入越语时，若遇到越语没有的或与之不同特征的读音时就必须进行越化处理。

例如，以前的越语中没有声母［p］，因此，在转入越语时，［p］须转成［b］，如 pont-boong（船板，甲板），pardessus—ba-đờ-xuy（大衣），champagne—sâm banh（香槟酒）。后来，越语中引入声母［p］来转写外来语，以后［p］音就直接用了，如：pile-pin（电池），péniciline—pê-ni-ci-lin（盘尼西林）。再如，越语的尾音中没有［b］、［d］、［g］或［s］、［r］，这样，法语词进入越语时也须转写。通常［b］转成［p］，如：double-đúp（双重的）；［d］转成［t］，acide—a-xít（酸性），mode-mốt（时髦）。而尾音［r］或被省去，或转成［k］，如：phare—pha（车灯），fermeture—phéc-mơ-tuya（拉链），vis-vít（螺丝钉），bus-buýt（电车）。还有，越语中没有复辅音，当法语中含复辅音的词汇进入越语时会变成一个或两个辅音。若转成一个辅音时，可以保留第一个辅音，也可以保留第二个辅音，哪个辅音越南人发起来容易就保留哪个辅音。例如 br、fr、cr、tr 等在组合中，通常保留第一个辅音，或者把整个复辅音变成另一个音，由于 r 音越南人难发，通常将之转化为他音，如：

brandcard—bāng-ca（担架），crème-kem（冰激凌），而 bl，cl，gl，pl……等组合则通常保留第二个辅音，因为［l］音越南人容易发，如：bloc—lốc（压缩机），cyclo-pouse—xích-lô（三轮车）。

另外，关于声调，法语进入越语后，必须按照越语的音节声调化，其基本规律如下：开音节通常读横声，valise—va-ii（皮箱），moto-mô-tô（摩托车）或玄声 cannon-ca-nông，cà-nông（加农炮），savon-xà-bông，xà-phông（肥皂），chalang—xà-lan（驳船）；闭音节通常读锐声 lít（公升），mốt（新潮，时髦）或重声 rò'-mo.oc（拖车）。

此外，关于韵方面也有增减规律，这里不详细讨论。

越语是孤立语，有许多单音节词，因此，当写成越语时，许多词被缩短，尤其是一些有 3 个以上音节的词，如：supprimer—xúp（不管，不理睬），affaire—phe（倒卖），transbordement—tăng-bo（转车）。

值得注意的是法语中的一些词或词组甚至是作定语的句子借入越语后常有被词化的趋势，如 au revoir—ô-voa（你好），甚至这个词的一个音节可以同其他的词组合起来组成新的越语词。

方言的语音特征也影响到法语借词。在越语中，南方与北方有着相差很大的方言。因此，西贡人造出的法语借词与河内人的法语借词也有些值得注意的不同点。河内人发音轻，没有卷舌音，因此许多 s 音发成 x，如 chef-ếp（主事官，上司），chaland—xà-lan（驳船）。中部人易发卷舌音，因此［z］音易发成 r 音，如：grève-reo（收工），南部人不分 v 和 d，发音也就出现了两种变体 la-ve（激光）和 la-de（激光）。北部方言与南部方言的不同还影响到了声调。例如：若复辅音最后有 k，河内人读锐声而西贡人读重声，如：phéc-m'o-tuya（拉链）和 ph.ec-mo'-tuya（拉链），tuốc-no-vít（改锥）和 tu.ôc-no'-vít（改锥）。由于口语

上的声调不同造成了书写的差异，也造成了混乱，目前越南的词典中的书写以河内音为主。

法语对越南文学创作语言的影响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法语的输入不仅影响了越南语的词汇，对越南人的思维方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人说法语对越语最重要的影响是行文方面。在法国入侵越南以前，越南的文学创作是深受中国影响的，文体形式也大致相同。而法语所带来的法语文学使越南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话剧等新文学样式，也带来了文学创作语言上的革新，这从越南的新诗和新小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写新诗的诗人吸收了法国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创作风格，行文方面也深受影响。新的艺术小说家，无论是写长篇、短篇的都接受了近现代法国小说的优点。受法国的影响还出现了新闻写作及其他文体，这使得越南文学体裁多样化起来，文学语言也随之自由和丰富起来。

1930－1945 年间是越南现代文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越语迅速发展的时期，只在短短的 15 年间为现代越语担任起越南独立后的正式语言作了准备。可以说法语伴随着诗歌、散文、小说进入了越南人的语言意识中。

此外，法语对越语语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缺乏资料，这里不详细讨论了。还有，在描写表达方法上，越语也受法语的影响，以前越语的某些表达如地址以及年月日的书写，都是由大到小的顺序，但现在基本是由小到大的顺序。

三、研究法语对越语影响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了解、掌握越语中的外来词。由于法语借词输入越语时大多采用音译的方式，这使我们在学习越语的这类词汇

时不能像学汉语借词那样可以望文生义，而且可能会误以为是越语本族词。但当我们掌握了越语中的法语借词的读音以及书写规律后，就能轻易判断它们的来源，也便于理解和掌握它们的含义和用法。

第二，有助于了解法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语言也常常被殖民者利用来作为同化其他民族的重要手段。现在，在越南仍有不少老人能流利地讲法语，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与法国以前的殖民地的法语使用情形不一样，即法语从未成为越南民族的全体（或大多数人）的语言，尽管那时在政府公文和学校教育中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原因很简单，那时大多数人是文盲，同殖民政府接触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但在这有限的条件下越南人仍然借用了一些必要的法语来丰富自己的语言。

了解法语对越语的影响的，我们会感受到法、越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越南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它不断用外来的要素在补充自己的语言，丰富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虽然法语与越南语之间的接触和影响是不对等的，越南当初是被迫接受法语的影响的，但客观上讲，这种接触和影响为越南带来了先进的法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使越南文化蒙上了一层西方文明色彩。

参考文献：

1. [越南]《法越词典》，清化出版社。
2. [越南]，《越法语言文化交流》，胡志明市出版社。
3. 王士录主编：《当代越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语学院）

重视小语种　加大外宣力度

孙尚信

斯瓦希里语是非洲一大语种，主要分布在东非沿海及中非一些国家和地区。它们主要是：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卢旺达、布隆迪、赞比亚、索马里、津巴布韦、莫桑比克、扎伊尔、马尔加什、科摩罗群岛等，其中在坦桑尼亚被定为国语，在肯尼亚被定为官方语。

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同非洲人民的友谊日益加强，1960 年和 1961 年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相继开设了斯瓦希里语专业。1961 年 9 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设了斯语节目，1964 年中国外文局增加了《人民画报》和图书的斯文版。

我于 1961 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斯语专业，1966 年毕业后一直在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从事斯语各类图书和中央文件的翻译出版工作，在此期间曾先后在坦桑工作了 10 年，其中在外文出版社驻达累斯萨拉姆办事处工作了 8 年，主要是外宣工作。

近 35 年的工作使我对斯语在我国的兴衰，对小语种在外事、外宣工作中的作用有所体会。

一、大语种和小语种的辩证关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西方国家往来日益频繁，英语大有取

代各种小语种的趋势。当然，在世界范围内，就国际交往而言，无疑英语是大语种，这也许是历史上的“日不落”造成的。尽管汉语在使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出了国门懂汉语的人就比较少了，就此意义上说汉语亦是小语种。所以，大、小语种不过是相对而言，对某些地区、某些国家来说，小语种就是百分之百的大语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英语永远替代不了小语种。1997 年 7 月 1 日以前的香港一直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近 150 年，但广大港人还是不买英语的账。除英、美、加拿大等英语国家之外，即便是欧洲人也不是全懂英语，更不要说与西方文化差异很大的亚洲人了。

坦桑尼亚大陆（坦噶尼喀）原为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取代德国的统治直至 1961 年独立，奴化教育长达近半个世纪，但是斯瓦希里语依然是 120 多个部族的共同语，坦桑独立后尼雷尔总统将斯语定为国语，至今受到人民的称赞，因为它是各部族之间感情交流、提高全民文化、团结全国人民的重要工具。在坦桑如果你懂斯语就可以走遍天下，如果你只懂英语就可能寸步难行，用我们在坦桑的中国项目组专家的话说，“英语翻译在坦桑就像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因为英文只能对上不能对下，很不方便。

斯瓦希里语在坦桑乃至东非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议会里坦桑设有国家斯语委员会（肯尼亚也有同样的机构），历届总统为该委员会的主席或名誉主席，它是斯语在该国使用和发展、研究的机构。根据有关国家的规定，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广播电台，桑给巴尔广播电台（均属国家电台），议员在大会上的发言，各级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讲话均不得使用英语，甚至广播中哪怕个别英语解释及单词也不能使用。坦桑大陆电台定期举办“国语”节目，由斯语委员会邀请一些作家、学者讨论、纠正斯语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及不规范的用法，在坦桑尼亚执政党党报《自由报》

上多少年来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刊登诗歌作品，对本民族的语言发展国家予以如此的重视，我以为不多见。1998 年 7 月在中国工艺品展的开幕式上，坦桑教育部部长卡朴亚（Kapuya）先生在致答词时说："在这种场合我要用斯语讲话，因为大使先生使用英语，出于礼貌我先用英语讲几句，后用斯语……"随之便是展品的介绍，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均要求使用斯语，甚至一家电视台还专门就斯语的学习、使用情况采访了斯语翻译。这与工艺品展没有关系，但他们却很感兴趣。

由于母语是社会各阶层乐于接受并具有很强亲和力的语言，有直接的宣传效果，外文出版社斯文部几十年内翻译出版了大量各类斯文图书。

1985 年，经文化部批准，外文出版社在坦桑设立了驻达市办事处，更直接有效地、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外宣和文化交流工作。办事处的斯语干部在斯语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在中国驻坦桑使馆的领导下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虽然办事处只有 3 人，却被认为是个很大的出版单位：既与坦桑方搞合作出版，又在各地搞书展（包括周边国家），同时还在电台制作节目，在报纸上刊登文章；既与我使馆合办中国文化周，又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广交朋友。这些朋友包括上至总统、总书记、报社总编、记者，下至平民百姓。十几年来仅在《自由报》上就发表了几十篇介绍中国的文章，有时还连载儿童故事和长篇小说。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坦桑不甚理解，一直保持沉默态度，为此 1988 年初刘庆友大使指示办事处发表一些有关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有分量的文章。自 1989 年上半年开始，坦桑高层领导人相继访华，他们认识到了中国依旧是他们的老朋友，依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1988 年，外文出版社领导赵常谦同志赴坦桑考察工作时，刘庆友大使说："办事处是中坦桑关系的一部分。"不久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率文化代表团访问坦桑，他风趣地说："这是世界上最精干的出

版社。”因为我们除了上述本职工作外，还兼为中国专家组、医疗队撰写文章。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更重要的还在于所使用语言的便利。它的感染力，它的广泛性，是英语所不及的。

为规范斯瓦希里语和防止不健康的书刊流入学校，坦桑政府规定未经教育部审定的图书不得直接在校销售。外文出版社达市办事处送审的各类图书全部被列为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达累斯萨拉姆市政厅还专门向各学校下发了推荐信。学生们踊跃购书的场面让我们十分感动，孩子们拥来拥去几乎把摆放图书的桌子挤倒，以至于后来老师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排队购买。烈日下孩子们手中仅有的零花钱几乎可以攥出汗水来不知选哪一本好，拿到书后早已等在那里的小伙伴们愉快地围在一起，一人念大家听。看到孩子们的这种情景我真是欣慰极了。

驻坦桑办事处是中坦桑两国文化交流的产物。1985 年，坦桑外交部照会我使馆正式承认并承诺对办事处给予必要的法律保护和一切可能的便利条件，1998 年再次照会，重申了上述内容。办事处本是民间机构，但由于它的知名度、在坦桑的影响以及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贡献，它享有坦桑财政部授予的一切办公设备和用品，在坦桑享受免税，这除使馆外绝无仅有。办事处引起了西方的注意，曾接受过德国电台的采访，前苏联也曾试图了解办事处成立和工作的详尽情况。为了取得更直接的宣传效果，我们常在《自由报》上发表署名为“本报特约记者”的文章，每篇约一整版，所登文章一是我们选送的，二是应报社特约的。他们对中国文化、风土人情，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十分感兴趣。1998 年 4 月 8 日，应《自由报》总编的要求，在坦桑现任总统姆卡帕（Mkapa）访华到京的当天在该报上发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长篇报道，同时总编恩古巴（Nguba）还亲自为文章写了社论，社论最后说：

"那种认为只有向西方才能学到东西的殖民主义余毒是我们该抛弃的时候了，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同中国这样一个在短期内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我们的经济合作才是我们的方向。"此后又接连发表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农业"和"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如何应对庞大的失业人口"等内容的文章。一次在报社见到总编，他说："我们很需要介绍中国的文章，我们手中虽有《北京周报》，偶尔也摘译一点，但我们认为合适的不多，在理解上有的把握不准，还是希望你们多提供斯文稿件，只要送来我们肯定采纳。"在坦桑，电视远没有普及，其主要的新闻媒介就是报纸和广播，而且人们多有听广播的习惯，常常是我头天在电台播放节目，次日便有人向我提及。一句话，就外宣效果来说谁也替代不了民族语言。

二、重视小语种就是尊重对方民族感情

我想从事小语种的一些老同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有过辉煌时期和美好的回忆。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小语种的使用十分重视。周总理对翻译的要求十分严格，并对小语种人才尽量使用和培养，因为要尊重他国民族感情。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接见代表团之前总要询问斯文翻译，是在哪里学习的，这种语言学起来难不难等。使用本民族语言是最感亲切、最方便、表达意思也是最细腻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非要人家讲英语呢？

为发展民族语言，纪念斯语语言大师夏班·罗伯特（有东非莎士比亚之称）的诞辰，坦桑尼亚斯语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斯语国际研讨会，并把开幕式的那一天定为斯语节，与会者多是作家、从事斯语的专业工作者、研究机构和使用单位以及各国驻坦桑使馆的高级官员、在达市大学学斯语的留学生和东非地区相关的人士。外文出版社驻达市办事处、国际台驻肯尼亚记者站都曾

派代表参加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对我们一些在使用和发展斯语方面颇有造诣的同志分别授予了由教育文化部部长签发的荣誉证书。本人在回国前最后参加了一次研讨会，我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次日便在《自由报》和英文《非洲人》报（the African）上发表了。我曾问过斯语委员会的官员，为什么年年都要搞一次斯语节，他说，目的就是不断地提醒大家使用和发展斯瓦希里语，鼓励和表彰有较大贡献的作家和专业工作者。它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东非人民的骄傲。在西方国家不少大学里都开办了斯语专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和使用斯瓦希里语，它已被定为“非洲统一组织”的用语，联合国也有斯语“信使”（Tarishi）期刊。大会上坐在我身边的是波兰驻坦桑大使，同时他也是斯语教授。他对我说，坦桑十分重视民族语言，在这里工作不会斯语很不方便，会斯语，只要你一开口便与对方拉近了距离，气氛就会很融洽。

民族语言关系着民族感情。这在坦桑报纸上时有文章，有时还以漫画形式讽刺那些“假洋鬼子”。一位在英国待了好几年回国后见到家乡的人轻声轻调地说：“我在伦敦待了好几年，斯瓦希里语我几乎忘光啦！”

一次到肯尼亚出差，因相机里的胶卷卡住了，到内罗毕一家照相馆求助，身边一位等着洗照片的人听我讲斯瓦希里语便对周围的人说：“听见了吧！人家外国人都讲一口流利的斯语，我们却有人以为说几句英语才高人一等——纯粹是殖民主义的余毒！”

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对方的民族语言就是尊重对方的民族和民族文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悠久历史文化为世人所瞩目。世界的文化是多彩的。我以为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应当越来越重视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友谊。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外宣工作在某些方面较之西方相差很远，我们对某些小语种

人才的培养、使用和语言的研究较之西方也落后得多。

三、重视小语种就要重视小语种的使用和提高

1961年，考入北外斯语专业的学生共17人，是该校招收的第一批斯语大学生，学制5年。但毕业后真正从事斯语工作的寥寥无几，大部分工作与斯语无关，有的到国外工作两年从此便与斯语无缘。国家培养了5年还没派上用场便丢弃了，实在是人才的浪费，一个人有效地为国家工作的时间不过30来年，有几个5年可浪费呢！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其实就是每个人的素质的提高，培养了不用，对国家是人才的浪费，对个人是极大的遗憾，试想他踌躇满志地考人大学，学成后却无用武之地，他会怎样想？据统计，我国受过斯语专业培训的约有300人，但大多数是为了应急，事后便不知去向了。这样似“狗熊掰棒子”的做法，培养一批丢一批，实在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外语是一门学问，而且是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本人素来对报纸上的宣传，说某人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多少门外语，持怀疑态度。何为“掌握”？何为“精通”？标准是什么？《北京晚报》2001年8月28日第17版登载，“这两天晚报热线不断接到电话询问这些志愿者熟练的‘小语种’是从哪学来的？东非地区的斯瓦希里语，这些平常人们很少接触到的语言这次大运会全都要碰上，他们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学习的外语，有些专家的外语已经几年没碰了，但拿起来就能用。”这我信，因为是大运会，是生活翻译。而我们所要求的是外宣战线上的高水平人才。没有使用就没有提高，没有长期的使用就没有经验的积累，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在使用上要给小语种一定的空间。

但是在我国某些小语种出人才确实很困难，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些小语种使用面窄，为了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一些学生很容易把学习小语种当作“敲门砖”，其真正的兴趣在英文等大语种上，即使毕业后身在国外（使用该语言的国家），也还是多在英文等大语种上下功夫，因为它是“四海皆宜”的铁饭碗，但又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就造成了两种语言都是“半瓶子醋”的局面，难以出人才，就是人们所说的全是“二把刀”。我就遇到过在坦桑工作的一位斯语毕业生，在与当地人讲话时却是用英语。这不能全怪他，客观现实在那摆着呢，他得为自己铺后路，此是一些小语种人才不能扎根的原因之一。

其二，一些机关单位在用人提拔方面，从事大语言的人往往容易受重视，提拔得快，而某些小语种则可能相反。如此便给一些小语种的人造成了心理的不平衡，同是一所学校的毕业生待遇却不同，这是原因之二。

再者，一些小语种的使用国家和地区大多经济不发达，有的比较贫穷落后，有的为各种传染病的多发区，加之国内某些不适当的宣传，使一些人对那里的情况有许多误解。此乃一些小语种育人难的原因之三。为此除了培养学生们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外，还应该对一些小语种专业人员在一系列政策和待遇上予以一定的倾斜，“物以稀为贵”，像美国和其他某些西方国家那样给予一定的特殊待遇。当然在录取学生方面应当比大语种条件更为严格。

中国即将入世（2001年11中国已入世——编者注），入世后的最大问题我以为是人才包括外语人才的流动，不少人都想拿高薪到外企，而第三世界国家在我国的投资很少，非洲国家更少。选学某些小语种的人可能更少。此乃一些小语种后继乏人，难有大发展的原因之四。

其实一个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就像生态平衡一样，缺少了某一种类就会失去平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

绝对是对的，但只有从事科技的人才有可能挣大钱就必然会造成文理科失衡，使社会配套不完整，大小语种也一样。

就斯瓦希里语而言，要想在中国有所发展，需要一批长期从事斯语工作、有实践经验的老同志从事研究和总结工作以留给后人。可以说从我国开始有斯语至今已有40年了，但尚没有一本像样的、较全面的语法书和辞典，仅有的一本《斯汉辞典》是1971年在外文局的资助下出版的，虽然简单但却是惟一的，至今仍被学生们视如珍宝，而且早已卖光了。90年代初外文出版社斯文部曾准备编辑一部较为完整的实用的《斯汉辞典》，并已从其他单位调来几位高水平人才，已经着手工作，但后来因为国外工作需要都相继出去了，只能作罢。而英国早有相关的书和辞书了。一位60年代学习斯语的德国女士，在坦桑莫罗戈罗市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欧洲游客斯语，我曾因与她在达市电台制作过"国语"节目而相识，她个人就编辑出版了一本较完整的《德斯辞典》。

第三世界国家，尤其不少非洲国家是我们的穷朋友、小兄弟，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地与中国站在一起。毛主席说过："我们几乎是被人家抬进联合国的。"坦桑是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美国的人权反华提案屡遭失败，这些小兄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国家十分重视对非洲的宣传。就我所知，近年来美国CNN电视台、德国调频台都已在达市开播；前苏联的《今日苏联》斯文版报纸在坦桑免费赠送，《金日成文集》在坦桑中央机关和坦桑国家印刷厂（KIUTA）总经理的书柜里均可见到，朝鲜使馆每年在金日成诞辰纪念日买版面在《自由报》上登文章（我们的文章免费），在达市还设有文化中心，美国设有图书馆免费提供图书、杂志和录像制品。我们在坦桑只有文化处，一名参赞，一名英文翻译；在肯尼亚使馆、赞比亚使馆连文

化处也没有。从另一角度说，非洲不少人对中国十分缺乏了解，有的甚至有不少误解。在坦桑时常有人问我："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中国有没有宗教?"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非洲国家可以说找不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坦桑第一任总统尼雷尔（Nyerere）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第二任总统姆维尼(Mwinyi）是位伊斯兰教徒，现任总统姆卡帕（Mkapa）是天主教徒。如果你说对方某人是无信仰者，他会立即翻脸，因为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又如有人常问在中国是否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生完后便交给了国家，不要了；"中国的户籍制是否限制了人身自由"等等。

我以为，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外宣工作，把工作做细，做到深人百姓，培养小语种人才是必须的，国家适当加大外宣的投资是值得的，为使一些外宣单位的小语种存活下来，不以是否能赢利为取舍标准，适当给予补贴也是必须的。

我十分赞赏广院对小语种人才培养的一贯重视，这说明广院领导在小语种问题上很有远见。为使小语种人才不至于中途夭折，还要在使用及政策上做适当的改革。

20世纪60年代一批老的斯语毕业生现大多已退休，再过几年像这样的研讨会恐怕就难以开得成了，所以此次研讨会很值得祝贺！

（作者单位：中国外文出版局）

中国与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交往及中国的波希米亚学

李　梅

一、中捷交往溯源

“波希米亚学”（Bohemistika）在捷克语中是指研究捷克语言、文化、历史的学科。中国的波希米亚学发展首先要从中捷文化历史交往中溯源。

捷克早期的汉学家中，最有名的要属于1716年来华的传教士卡雷尔·斯拉维切克（Karel Slavíček，1678－1735，其中文名字为严嘉乐）。他原籍捷克的摩拉维亚，在中国工作期间与友人的书信中，大量、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语言、音乐艺术、数学、天文地理以及中国当时的政治、风俗礼仪。这些书信后来编辑成册，名为《来自中国的书信》，此书曾于1935年出版了捷克语版本，最近又翻译成了中文，以《中国来信》为书名，由“大象出版社”于2001年正式出版。捷克驻华使馆为此书举行了首发式，还为本书的翻译者——北外的捷语教师颁发了“捷克共和国外交部奖章”。本书的原文为拉丁文，是由捷克当代著名汉学家高马士（J. Kolmaš）译成捷语的。据统计，17－19世纪到过中国的来自捷克地区的传教士有20人，他们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清朝初期，一些外国传教士被赶出中国，严嘉乐由于本人的学识和造诣，未被划入必须离京的传教士之列。博学多才，花费了半生心血，为中捷文化交往作出巨大贡

献的严嘉乐于1735年8月24日在北京逝世，葬于阜成门外。

汉学作为东方学的一部分是从捷克查理大学在19世纪下半叶设置东方讲习所开始的。鲁·德沃夏克（Rudolf Dvořák，1860－1920）是第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捷克东方学家。他转译过《论语》、《道德经》等中国的儒学和道家的论著，他与捷克诗人伏尔赫利茨基合作翻译的《诗经》捷文译本是斯拉夫语言中的第一个译本。

被誉为"世界汉学界权威"的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雅·布鲁塞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在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个精通汉语、来华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人，他在20世纪30年代结交了鲁迅先生。他翻译出版了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并且请鲁迅为《捷文译本》撰写序言。鲁迅先生写道："我的作品能够摆在捷克读者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译成通行很广的别的国家的语言更高兴。"布鲁塞克在毕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汉学家，他和他的学生们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今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如《孙子兵法》、《论语》、《聊斋》、《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此外译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丁玲、周立波、赵树理、艾青等人的作品。他于1955年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布鲁塞克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率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回国时带去了近3万册中文图书。这些书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东方研究所鲁迅图书馆的奠基之书籍，这所图书馆已成为中欧地区远近闻名的中国书籍图书馆。中国与捷克互换图书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199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与文化部合作举办了"捷克文化书展"。

20世纪初，中国国内也开始翻译介绍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1921年，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刊登了一篇介绍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的短文，茅盾翻译出版了捷克斯洛伐克诗人、小说家杨·

聂鲁达的短篇小说《傻洪查的故事》。被翻译介绍的著名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家有卡雷尔·恰佩克（他是第一位创作了科幻文学中机器人的形象的作家）。50年代以后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的年代，其中有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卡雷尔·希内克·马哈的抒情叙事长诗《五月》，反法西斯英雄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名篇《绞刑架下的报告》，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由著名作家萧乾撰写序言的《好兵帅克历险记》。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著名记者埃·基希以及援华医疗队的有犹太血统的捷克斯洛伐克医生弗朗基谢克·克里格尔和罗别愁大夫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20世纪80年代，由于捷克斯洛伐克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可笑的爱情》、《生活在别处》等众多的中文译本的出版，在中国读者中也曾掀起了一股昆德拉热及中东欧文学热。

除了文学，捷克斯洛伐克的不少文化名人对中国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的。例如：捷克前总统兼戏剧家瓦茨拉夫·哈韦尔（Václav Havel）和他的《花园聚会》，著名交响乐《自新大陆》的作曲家贝德日赫·德沃夏克，他的歌剧《水仙女》咏叹调《月亮颂》为我国广大美声歌唱家所钟爱，具有优美旋律的交响曲《我的祖国》出自捷克作曲家斯美塔纳之手。

捷克斯洛伐克影视作品也为我国广大观众所熟悉，其中有好莱坞著名捷克斯洛伐克籍电影导演福尔曼的电影《飞跃疯人院》、《莫扎特》、儿童动画系列片《鼹鼠的故事》。以捷克斯洛伐克为背景的当代名片有根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获得最佳奥斯卡外语片提名以及获奖的有《普通小学》、《科尔亚》、《我可爱的小村庄》和《严密监视下的列车》。另外，我国的不少优秀影片都曾在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卡洛维发

利电影节上获奖，其中包括谢晋导演的《女篮五号》、《芙蓉镇》等。捷克斯洛伐克优秀影片《更高原则》、《好兵帅克》、《妈妈应该出嫁》、《非凡的艾玛》等也在我国影视界受到好评。

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著名工业品牌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如：京城车流中随处可见的带翅膀飞箭标志的斯科达（ŠKODA）－法比亚（FABIA）、法沃里特（FAVORIT）轿车，利亚兹（LIAZ）、塔特拉（TATRA）载重汽车，不少中国纺织业厂家飞转着的捷克斯洛伐克专利发明——无锭气流纺纱机，为北京街道照明供电的山西神头电厂的全套设备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厂家。此外，比尔森（Plzenské pivo）啤酒，波希米亚（BOHEMIA）水晶玻璃、瓷器和号称为世界鞋王的巴佳（BAŤA）皮鞋等也在中国享有盛誉。

中国的年轻人也经常谈论起捷克斯洛伐克杰出的体育运动：田径、足球、冰球和网球等。著名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中有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分别夺得1万米和5000米赛跑金牌的埃米尔和达娜·扎多佩克夫妇，有奥委会成员、当今世界标枪王、欧洲最佳田径运动员、奥运会金牌三连冠保持者杨·泽莱兹尼，世界十项田径运动三连冠金牌得主托马士·德沃夏克，网球名将伦德尔、娜伏拉蒂洛娃，足球明星波波尔斯基、内德维德等。

相比而言，捷克斯洛伐克科学界的许多名人似乎还不为中国百姓所熟知，但是每一个中学生都知道著名的“豌豆遗传杂交试验”。这就是提出“基因”概念的遗传学家、捷克布尔诺修道院院长约翰·乔治·孟德尔（1822 － 1884），他的研究后来被实践证明是发现了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今天，极谱法和极谱分析法已广泛应用于冶金、地质、生化医学和食品工业等领域，而发现极谱学的是20世纪捷克最有成就的化学家雅·海洛夫斯基（Jaroslav Heyrovský，1890 － 1967），他于1959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布拉格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物理化

学和电化学研究所，这里成为世界著名极谱学研究中心，去该所进修和进行学术访问的外国科学工作者中包括我国科学院院士、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汪尔康等专家学者。

二、捷克斯洛伐克语专业的历史和现状

虽然地处欧洲心脏的捷克斯洛伐克有着辉煌的历史文化和发达的工业，但隶属于斯拉夫语系的捷克语是公认的比较难学的语言。建国初期，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小国家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几乎没有学生自愿报名学习捷克语。我国的波希米亚学科的发展始于解放后的50年代初。当时正值我国和苏联东欧关系大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不少留学生来中国的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留学。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界的知名人士。我国捷克语学科的奠基人是周志尧老师，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第一批被外交部派往东欧地区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团体的小组长。回国后他担任了北外捷克斯洛伐克语教研室主任，根据他生前的回忆，我们在此简要地回顾一下波希米亚学在我国的创建史。

1954年的暑假，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俄语系设立波兰语、捷克斯洛伐克语两个班，每个班从外交部调来一名于1950年派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学习回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留学生任教（周志尧老师任捷克斯洛伐克语教研室主任）。根据我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捷方派出一名汉学家女士来华作为专家担任教学工作。

那年，捷克斯洛伐克语班有20名学生，是从考取了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新生中挑选出来的。届时，国内正处于“俄语热”的高潮中，北大当时的俄语系主任是著名的苏联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先生。当时的很多学生皆因爱好苏联文学和翻译而考入俄

罗斯语言文学系，因此，挑选捷克斯洛伐克语班的学生工作碰到困难。捷克斯洛伐克女汉学家、布鲁塞克的女弟子、作为中国捷克斯洛伐克语专业第一任专家——史丹妮·什娇维赤科娃女士(Dana Šťovičková, 1929 – 1976)应聘到北京大学的捷克斯洛伐克语教研室做外国专家，她耐心地向大家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和现状，表达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对新中国的真诚友谊，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发达的工业，讲述了例如在中国抗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捷克斯洛伐克机枪使游击队发挥了威力。还有当时从西直门直达颐和园的大巴士是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斯科达工厂出品。很多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专家帮助我国造汽轮机、汽车等等情况。

然而，由于我国解放前没有捷克斯洛伐克语专业，解放后，也还未顾得上准备捷克斯洛伐克语的图书资料，所以在开设捷语班时既无捷汉词典，也无用汉语解释的捷语语法、捷汉会话等教材，教学条件十分艰苦。于是，中国教师编写了适合成年人使用，以汉语解释捷语语法，再由中国教师和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合编的教材讲义。课文后列出生词，有些生词先需要查阅捷英词典，然后再查英汉词典，有时还是弄不准生词的确切词义。教员结合例句讲述捷语 7 个格的用法，也讲述一些最简单的句法。这样，在突击学完语法后，就可以比较自由地为学生选择一些捷语简易读物，如捷克斯洛伐克小学语文课的课文、童话故事及经过改编出自捷克斯洛伐克名作家的浅易作品了。

捷语班的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努力，外国专家和中国老师也以创业者的精神，不分课上、课下，教学与辅导配合得很好。在两年的时间里，学生已能阅读外报社论、中等难易程度的小说，能够为当时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团、教育代表团独立担任陪同翻译了，不仅是一般的生活陪同翻译，还能担任讲演、座谈会的翻译。

那时，中国教师在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带领下，常常于周末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华使馆看捷语电影，使馆在电影放映前后招待大家吃点心和进行谈话，询问一些学校的情况和中国的民间风俗习惯等。在北外任教的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史丹妮女士、索瓦·赫斯曼、依万·鲁德珥（Ivan Lutterer）先生等后来都成了知名的汉学家，出版了捷汉词典、教材和科研作品，他们卓有成效地提高了中国学生的捷语水平。他们回国后，无论在什么年代一贯对中国怀有感情，其中，史丹妮女士翻译出版了《中国民间童话》、《新儿女英雄传》、《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等。在以后的年代里，她不顾政治形势变化，亲自到中国驻布拉格使馆赠送了他们编写的 9 卷本《捷汉大词典》。她后来不幸死于车祸。史丹妮女士曾于 1956 年在中国诗人艾青等人出访智利时结识了他，她翻译了不少艾青的名作，还写给他不少明信片，艾青在史丹妮去世后创作了《致亡友丹娜之灵》的诗作。至今史丹妮的姐姐米拉达·布拉赫娃女士还在与北外的捷语教师们保持着书信往来。

1958 年，捷语师生全体合作，以《捷俄词典》为蓝本，完成了 4 万多词条的《捷汉词典》编写工作。同年，捷语专业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批毕业生。从这批毕业生中选派了一名优秀学生作为研究生出国深造，另一名优秀学生留校任教。1959 年，北京俄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成立了波、捷、罗语系。1961 年合并为东欧语系，2002 年又改名为欧洲语系。1971 年，北外在湖北沙洋农场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在没有外国专家指导、缺乏教材工具书的情况下，建立师生学习小组，分小班进行辅导性教学和听、说、读、写、译训练。他们背负着“文革”后继往开来培养一代外语人才的责任，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 1975 年学成毕业。1983 年以后，根据社会调查研究，包括捷语在内的各个语种又开始招收本科生。从 1954 年至今，北外共培

养了约200名捷语专业人才。捷语教研室还于1983年成立了硕士点，先后培养了5名硕士生。1999年，教研室第一次招收了捷克－斯洛伐克双语种专业班级。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为两个国家，从2003年起，北外将首次招收专门学习斯洛伐克语的班级。几十年来，从捷语专业的毕业生中走出了不少我国驻外大使、参赞、新华社记者、国际电台编辑和播音员、外贸战线的国家干部、外企和合资公司的企业家、著名文学文献翻译家和研究员，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此外，1983－1989年，捷语专业为山西神头电厂办了几届捷语专修班。学生都是科技人员，因为他们要与当时在国家重点投资企业——神头电厂工作的大批捷克斯洛伐克技术人员合作，实现向北京输电的重要任务而学习捷语。对这批特殊学员，捷语专业的老师专门编写了侧重于技术方向的实用教材，采用注重实际应用的教学方法，在短期内培养出了不少业务骨干。他们在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贸易谈判和技术交流翻译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捷语专业先后聘任了14名捷语教学专家，他们在北外的教学工作中，在为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在教研室的图书积累、教材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捷克斯洛伐克语言文学专业建立以来，参与教学的中国教师共13人，其中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他们编写出版的教材种类包括：捷语精读课本、捷汉会话、捷语修辞和构词法、捷语语法、捷克斯洛伐克国情读本、捷汉翻译教程、口译教材、词汇与口语会话、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史、捷克斯洛伐克文学选读、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和地理概况课教材、捷语科技教材、捷语时文教材、基础捷语、高级精读、捷语视听说和录像课教材、斯洛伐克语教材等，中捷教师还与北外音像中心共同制作了题为《咱们握握手》的第一部非通用语种音像教材。在科研出版工作

中，北外与商务印书馆、外研社等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捷汉分类词汇手册》、《捷汉词典》等。其中1998年出版的《新捷汉词典》获得全国辞书出版一等奖。这些教科书、工具书的出版，为中外的捷语教学和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北外的捷语教学以及捷克人谈北外

作为非世界通用语的小语种，捷语课程设置，与国外同类课业相比，我们国内教学更注重客观实际需要，使学生通过精读、语法、国情和视听等主干课了解最基本的、精选的、较为全面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情知识，词汇量涉及面广，教材编写体现中国特色，课文内容方面除了选自捷克斯洛伐克经典作品的课文外，还包括诸如“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牛郎织女”、“中国的春节”、“中国的农业”、“中捷重点工业合作项目和中捷技术交流”、“中国旅游文化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饮食文化”等等内容。

当然，对于语法学习和捷语语言基本功训练等方面，我们还借鉴了国外科学的教学法研究成果，例如，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语言学“布拉格学派”的研究成果，捷克斯洛伐克教育家、万国师表杨·考门斯基的教学理论，以改进和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我们的视听电教课与国外相比也是处于比较先进的水平的。虽然很多材料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原版音像教材，但我们根据中国人学外语的特点进行了改编，使之更适于提高中国学生听说实践能力的需要。

至于捷－汉、汉－捷翻译课（包括当前流行的跨文化交际，国情对比翻译等课程），是我们国内教学的长处，教学经验来自中国教师和从事外事翻译研究的前辈们多年实践的总结，是我们学生的必修课，也是国外的教学和外教们难以胜任和替代的。此外，我们非常重视比较不同语言的特点，通过比较捷译汉和汉译

捷的不同特点，使学生掌握翻译难点，自觉在差异文化、国情翻译对比中提高翻译水平。

北外的捷语教学得到了外国专家和友人的称颂。1997年5月，教研室的奠基人周志尧老师因病去世。消息传到捷克后，曾经与他共过事的捷克汉学家、外教等都表达了哀思。其中，曾经在北外任过教的汉学家萨瓦·赫斯曼先生（Sova Heřman）在捷克杂志上撰文纪念他说："周志尧是中国波希米亚学的创始人。他在北大创建了波希米亚学教研室，任教研室主任，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卓有成效地工作了30年，他培养了几十名通晓捷语和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专门人才。如果没有他的努力，许多教科书、工具书等颇有价值的著作是难以问世的…… 我在北京大学当捷语专家期间，和他几乎天天见面。我们一起讨论问题，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组织工作等教学方面的事务。我不仅欣赏他的组织才能和他灵活地利用自己的学识，不断进行教学质量改革的能力，还尤其钦佩他那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他永远活在怀念他的人们的心里。"

1997年6月，在北外举办的捷克文化书展开幕式上，捷克驻华大使谈道："捷克图书作品在中国并不陌生，曾经出现过一系列的捷克经典书籍的译著，从表面上看，书展仅为一小部分波希米亚学者服务，而实际对我们来说，他们是中国公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因为通过他们的作用，向中国公众介绍了捷克共和国和它的文化，这对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北外的波希米亚学教研室是我们两国之间的桥梁，而这一教研室的毕业生们几十年来成为我们两个民族友好关系发展的保障，对一些年轻的波希米亚学者，我曾经有机会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接触过，他们成为我们这些关系顺利发展的希望和前景。"

北外的捷语教学一直得到捷克历届外教们的关注和大力协助。为了了解这些老外的敬业精神，让我们来读一下1995年来

华的捷克专家科斯特契卡在捷克《语言文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波希米亚学和外籍教师》的论文，他写道：

> 中国的波希米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学者们从50年代起就在北京开始学习这一专业。如今，这一学科的教学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来承担的。这里的毕业生不仅能在本国内基本掌握外语基本功，而且要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概况。捷克语在这所大学里不仅只限于一种斯拉夫语言的辅助性教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并独具特色的专业。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波希米亚学专业（即捷克学）。
>
> 波希米亚学教研室提供的专业书籍比较丰富，他们由布拉格对外关系部（捷克教育部下属单位）不断提供新书来保证教学。这里约两周可收到一次来自捷克国内的报纸杂志。
>
> ……在这里，对学生的选拔与国外有所不同。在中国这样的十几亿的人口之中，他们属于较为优秀的学生。
>
> 这一专业的教学设置为4年制。头两年是进行语言基本功的教育。一年级的基本教学为语音、语法、基本国情及词汇。每周约16课时。二年级时将完结正字法和语法的教学训练，并且扩充词汇量，增加由外籍教员担任的口语会话课，还增设一些史地等方面的系列课。三年级（每周约12课时）开始开设系统的、结合实际的专业课程，以及捷克文学的教学讨论课，还有修辞的理论与实践训练课。除此之外加强会话训练和国情概况课（如读报及有关捷克共和国的讨论课）。四年级的第一学期讲授战后的捷克文学，有会话和讨论课。最后一学期学生要撰写约30页左右的毕业论文。此外，还有为答辩作准备的辅导课，并准备进行毕业考试。（此种考试在四年中每学期末分期进行，分数为五至二分，

二分就是不及格了。注：捷克最高分为一分。）此外，学生还学英语和其他公共课。在本科毕业后还可继续考研究生进行深造。硕士研究生要写约50页的学位论文。

此专业聘请的外籍教师要研究琢磨教学法。语音教学是如何分辨在中文里没有的发音。在讲授捷克文学时，也要像教语音时那样重视教学法与选材。选那些文学史中最基本、最关键性的代表作家，并辅助以欧美的文学背景。对诗歌的教学中，比美学更侧重的是语言和朗读。在文学讨论会上，对比一些为中国学生所熟知的，而又翻译成捷文的中国古代诗歌，更易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要使学生成为未来代表团的翻译，各类机关、公司的文秘工作者等都是不易的。我们可以想像，这些要求即便是对一个捷克人来说，也是很难掌握的。而中国学生要付出超人的努力才行。可以说，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要算主动地进行文字表达。在这方面，要以最大的耐心来工作，放弃对文体修辞的苛刻要求，集中精力达到与学生真正的沟通。把学外语普遍存在的问题抛开来谈，那么，这里毕业的学生水平并不差。所有的培养对象经过外语的耳濡目染，都具备了听力、口语会话能力，能够毫不费力地读懂较难的捷克文字，并且通晓捷克的历史文化。这对于他们的培养目标来说足够了，更何况他们毕业后还可以去捷克继续深造呢（目前本专业的不少本科生也获得了国外进修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中教书对外籍教员来说，其工作本身就是令人感到兴奋的事。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人们是多么完善地在实行着大教育家考门斯基的教育原则，而且不受年龄、地域和文明程度的影响。教师有时故意提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积极发表不同看法，并想出一些类似猜谜的游戏来提

高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诚然，外籍教员也在这些活动中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比如在比较两国的俗语时，就得知晓许多关于这一遥远国度的民俗和思想观念。例如这类俗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眼不见，心不烦"，"无风不起浪"，"入乡随俗"，"三个和尚没水吃"等等。外籍教员从国内不仅带来了捷克的语言听力录音带，其中还包括捷克音乐磁带。中国人的乐感很好，还喜欢听捷克歌曲，其中捷克歌星卡雷尔·哥特于20世纪70年代录制的唱带，以及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都很受欢迎。

外教们在去这种与欧洲文化差别很大的国家前，已做了文化以及心理学特殊性的思想准备。例如，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有关于所谓"丢面子"的说法。欧洲人对此不太理解。外教在中国遇到的这类怕丢面子的事例不太多。但是有时，即使是有充分理由的批评或稍微尖锐些的言辞，中国学生的反应也比捷克学生要敏感得多。这种文化特殊性的案例还可举出不少。

外籍教员在中国任教最有利的一面是受到主人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旅行对外籍教师来说是他们任教期间最为有趣的一页。他们可以看到中华帝国，乃至人类文明史的摇篮——黄河、长江之文化，他们可以领略古城西安、开封或现代都市上海、广东的繁荣景致，还可以在童话般世界中的桂林以及人间天堂杭州寻梦，更不用说还有北京的紫禁城、天坛、颐和园了。这一切提供给人们的印象和知识是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可以预言，随着中捷两国经济的增长，肯定会对通晓两国语言的人才提出更多的需求（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目前已有中国教师在任教）。可以说，捷克语将响彻在长城内外，并祝愿它更加响亮。中国的波希米亚学肯定是有光明前途

的。捷克的外籍教师，作为置身于遥远的东方文化中的一支小分队，也会有光明前途的。

四、海外及当今世界的捷克语言文学专业掠影

捷克查理大学文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所长姆涅什绛（A·Měštān）曾经担任德国大学客座教授，1996年6月，在接受捷克《权力报》记者采访时，他发表了对西方国家大学里的捷克语言文学教学的评论，他写道：

> 我是1966年去德国的弗莱堡大学任教的，一直任教到1995年退休。我教授斯拉夫语言文学，主要是文学。在西方，所谓的斯拉夫学几乎到处首先是指俄罗斯学，即俄语和俄国文学。我自然也教授捷克文学，但内容比俄语文学简要。另外我也讲波兰文学，讲一些南斯拉夫文学，有时还讲授一些斯洛伐克文学和乌克兰文学。我在弗莱堡大学教授过几个学期的大课，在海德堡大学主持过课堂讨论课，有一个学期我还在美国的马塞诸塞州的阿穆哈尔斯特大学进行客座讲学。
>
> 对于斯拉夫学的兴趣在不断增长着，西部的学者逾8000人。我估计学捷克语的人数有六七百人。起初，我的波希米亚学学生首先来自苏台德地区的德籍家庭。有些学生选学捷克语是因为在家里常听到说捷克人是怎样的魔鬼，于是他们想证实一下这些说法有多少可信性，也有是为了与父母作对的逆反行为而选学捷克语的。后来一代代传下去，目前学习波希米亚学的有来自各个不同的家庭和年龄组的学生。

我们不能认为，每位学习波希米亚学的学生都是因为对捷克文学感兴趣。当然，有时这是起决定因素的。如有的人读了译成德语的赫拉巴尔的作品，非常喜欢，想欣赏一下原著，然而他们选择捷克语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再说，很少有人在德国学校里就能把捷克语学得可用原文来咀嚼赫拉巴尔类型的捷克作家的文学作品。这与那些在我们国内学习英语的捷克学者是一样的。当然，波希米亚学者们的兴趣主要还是当代文学，他们以美学观念来欣赏它，政治因素不起什么作用。决定的因素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他们的兴趣深入到19世纪的捷克文学，当然在民族复兴女作家鲍日娜·聂姆佐娃和浪漫主义诗人马哈之前的捷克文学就很少有人感兴趣了。我也曾有过这样的学生，他们从事鲜为人知的作家或者是考门斯基的文学作品研究 。

对于我的学生们来说，如同世界各地从事人文专业的学生一样，她们大多是些女生，她们所不理解的是，早于19世纪起直至今日的捷克文学领域，女性作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学生们得到的知识是，在俄国文学中，女性作家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崭露头角，而她们解释不通的是：在几乎所有的斯拉夫文学中，恰恰是在我们捷克文学中，妇女扮演了重要角色。我想说，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对俄语的兴趣并未跌至谷底，当代俄国文学总有可读的东西。在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地区，已经克服了对俄国文化的不感兴趣。政治形势的发展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文学，如：先锋派、诗歌主义、社会颓废派鲜明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些流派在1948年后的现实主义影响下衰落了。在西方，结构主义几十年前曾经非常时髦，因为它与诗歌主义、纯诗派息息相连。同样，俄国的形式主义与未来主义也有密切联系。所有从事斯拉夫学研究的人和研究“布拉格结构主义”的人，都

会对捷克先锋派感兴趣。众所周知，布拉格学派专家罗·雅可布逊首先是位形式主义者，后来才成为结构主义学者，他是从布拉格走向西方的。从他那里，他的信徒们才了解了诗人内兹瓦尔以及其他的先锋派作家。而对他怀有极大兴趣的不仅只是一般的读者，还有哲学家们。就这样，捷克的先锋派被渐渐地翻译、介绍，对于我们来说，他的作品成为永久性有价值的东西。我曾教授过马雅可夫斯基、波斯多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我认为，不能把作家按照党证来划分。要么是有艺术价值，要么没有，我不用那些方法把作家分类，在西方的大学里也不这样分。

韩国汉城的 Hankuk 外国语大学捷克语教研室主任，不久前参加了布拉格捷克文学研讨会。他说，他曾经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俄语和捷克语，目前在汉城教授捷克文学、捷克文化和捷克语言。他们目前共有 160 名学生，分为 4 个年级。捷克语、波兰语、匈牙利语、斯洛伐克语等为独立的教研室。学生们除了学习捷克语还可以选修英语、经济学等，可与捷克语构成复合专业。在基础阶段，学生们主修捷克语言和语法，然后从三年级开始学习捷克文学。包括捷克 19、20 世纪文学和当代文学。他讲授的 19 世纪文学家及其作品，包括捷克著名诗人马哈的名著《五月》，涅姆佐娃的《外祖母》，爱尔本的故事诗《新郎衫》，涅鲁达的小说《小城故事》等。20 世纪文学包括著名文学家恰佩克的作品、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及昆德拉的小说等。在这其中，昆德拉最受学生的欢迎。因为他使捷克文学走向世界。但是捷克外教却认为，昆德拉在捷克国内的名声并不如国外影响大。

汉城外国语大学的捷克语教研室有两名韩国教授和两名普通教师，另外聘有两名捷克专家，一名教语言基础班，一名教文学。他们的工资以及韩国教师出国进修捷克语的奖学金都由韩国

政府资助，而且韩国的波希米亚学者毕业后大都能找到工作。

综上所述，无论是历史纵向地来看我国的波希米亚学专业发展，还是横向地对比当今世界的波希米亚学，我们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都是取得了公认的辉煌成绩的。捷克学不光是一种语言，它属于一类学科，正是这类学科的组合才构成了我们五彩缤纷的多极世界，才使得我们对当今整体世界的理解更加多元化。记得曾有捷克人对我们称他们的语言为小语种不满意，他们更正说不是“malý jazyk”（小语种），而是“vzácný jazyk”，汉语的意思是珍贵稀有语种。

能够献身于这样的稀有学科，是每一位波希米亚学者的骄傲，我们的前辈们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只要这种语言存在，只要这个民族、国家存在，我国的波希米亚学就一定会后继有人。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系）

中国泰米尔语广播的影响及国际合作与交流

孙国强

一、概　况

泰米尔语属达罗毗荼语系，拥有2000余年的历史。文字采用从格兰塔文字演化而来的泰米尔字母，世界上有8000多万人使用泰米尔语，他们主要分布在南印度，其中，泰米尔纳德邦有6200多万；喀拉拉、安得拉、卡纳塔克等邦有1 000万。此外，斯里兰卡有550万人讲泰米尔语。新加坡、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等国也有数百万泰米尔族人。泰米尔语是泰米尔纳德邦的官方语，在斯里兰卡和新加坡也被列为国语之一。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以印度为主要对象地区，同时兼顾斯里兰卡等泰米尔语地区。泰米尔语广播于1963年初开始筹备，1963年8月1日正式播音。开播伊始，每天播出两次，每次30分钟，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晚22:00－22:30；22:30－23:00。

泰米尔语广播自创办之日起，即以宣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宣传我国政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主要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中印边界争端爆发后，印度尼赫鲁政府推行反华政策，觊觎我国领土西藏，并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我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针对上述情况，泰米尔语广播播送了不少揭露印度反华势力挑起边界争端的文章，还大量地报道了

西藏百万农奴获得翻身解放，以及民主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有力地配合了我国政府的外交斗争。

十年“文革”动乱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泰米尔语广播充满政治说教和强加于人的现象。节目内容枯燥乏味，形式呆板，缺乏针对性，更谈不上知识性和趣味性，因此，无法吸引听众。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听众来信很少，且多数来自斯里兰卡，人口众多的印度泰米尔语地区反馈信息甚少，偶有来信，大多是对广播中过多使用梵文的批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对外广播宣传中“左”的倾向逐渐得到纠正。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步好转，泰米尔语广播中报道中印传统友谊的内容多起来了，在对广播结构进行重大改革后，泰米尔语广播发生了巨大变化，节目面貌焕然一新。节目质量的提高吸引了大量听众，印度各地收听中国泰米尔语广播的听众协会纷纷成立，听众来信也以惊人的速度猛增。听众来信来自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阿联酋、卡塔尔、缅甸、尼泊尔、西德、丹麦、毛里求斯、坦桑尼亚等十多个国家。1988 年至 1995 年，泰米尔语部听众来信一直名列国际台第一。其中，1993 年、1995 年两年分别超过 20 万封，成为国际台来信最多的语言部，并先后荣获全国广电系统先进集体和全国新闻单位先进集体称号。

二、听众对泰米尔语广播的反应

印度听众哈克来信说：“全印国际泰米尔语广播收听协会主席桑穆格凡尔在一次大会上发言时指出：‘在日常泰米尔语广播中，节目质量最好、报道最客观的是中国电台，而不是 BBC’。”（“全印国际泰米尔语广播收听协会”与中国电台没有联系——作

者注）印度听众阿·桑达纳姆来信说："尽管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播送泰米尔语节目，然而，在热情接受听众意见、改进节目方面，在鼓励听众积极写信、参与各种比赛方面，在编播优秀节目方面，当首推中国电台。为此，我代表全体听众授予中国电台金质奖章，也只有中国电台才有资格赢得这样的金质奖章。"泰米尔纳德邦执政党——全印A·达罗毗荼进步党总部发言人，波卢尔市戈温登来信说："你们的节目牢牢地吸引着我，我为长时间错过这么好的节目而深感遗憾。贵台节目是中印友谊的桥梁，你们的节目越来越受到印度人民的喜爱，这正是贵台成功之处。"印度哥凡市听众姆·马尼文纳姆、巴布两人联名来信说："贵台节目别具特色，比其他国家电台办得好，这不是夸大，而是事实。"印度赛勒姆县听众拉森蒂伦在信中写道："在所有国家的泰米尔语广播中，中国电台名列第一。贵台节目丰富多彩，我深深地感到，贵台是本着让所有听众都受益的目的而广播的。"古吉拉特邦听众马西拉马尼来信说："中国电台泰米尔语节目很好，与其他国家的泰米尔语节目相比，贵台节目要好得多。"

尼勒麦肯、拉马沙尔、贝利亚沙米等5名印度听众联名来信说："贵台节目使人受益匪浅，《中国常识》、《来信综述》、《科学世界》、《听众之声》以及新闻、评论等节目非常好，没有哪家电台的节目能办得像你们那样好。"印度听众S·库马尔说："我收听许多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但我只跟中国电台通信，贵台节目真好。"维卢布拉姆地区听协负责人S·赛尔文说："世界上有许多泰米尔语广播，而中国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最为出色。"听众巴拉尼萨米说："我每天收听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我认为，没有任何电台能超过贵台。"新德里听众约基纳丹说："由于中国电台每天播送各国时事要闻，我每天获得周游世界的机会，一个小时节目使我心满意足，引人入胜的《百花园》、《体坛巡礼》、《中国故事》等节目使人大饱耳福，其他国家电台无法与之相比。"

听众K·坦格拉贾说："近年来我一直在收听贵台广播，在此之前，我花许多时间去看电影，自从收听贵台节目以后，我再也不看电影了，因为贵台节目是如此精彩，以致我一天也离不开它。"印度听众巴拉库马尔说："我常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开设泰米尔语节目的中国国际电台、英国BBC电台、菲律宾真理之声（VERITAS）电台3家颇有影响的电台中哪家最好？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国际电台，原因是其他两家均以新闻节目见长，而中国电台除新闻以外，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节目，使人越听越想听。"印度听众乔蒂说："我一直收听BBC、莫斯科、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菲律宾、中国等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在这些电台中以中国国际电台的节目办得最为出色。"印度听众赛尔伐拉奇说："中国电台的泰米尔语节目质量很好，我每天都收听。英国、苏联、斯里兰卡、菲律宾等许多国家的电台都播送泰米尔语节目，但都没有中国电台那么好。"科伦坡听众普拉卡什说："贵台《百花园》、《科学世界》等节目提供了许多新奇和有趣的消息，在这方面，没有哪家电台可与贵台媲美。中国电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听众，我可以自豪地说，使我了解中国和世界、教给我各方面知识的好老师，就是中国电台。"斯里兰卡听众维贾亚库马伦说："贵台泰米尔语节目十分精彩，《科学世界》、《来信综述》、《点播音乐》等节目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所收听的各国泰米尔语广播中中国电台是最好的。"印度哥凡县听协负责人苏布和赛达来莱莉说："不管怎么收听别的电台，总不像收听中国电台那么来劲，因为中国电台泰米尔语节目丰富多彩，它有许多其他电台没有的节目。"印度听众拉杰库马尔说："贵台泰米尔语节目，在世界各国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中名列第一。我收听许多国家的节目，它们都没有贵台办得出色，贵台受到听众的一致赞扬是理所当然的。"印度听众拉贾赛格伦说："在我们家里，爸爸、妈妈、哥哥和我都收听贵台泰米尔语广播，父亲喜欢

听《科学世界》，母亲喜欢听《百花园》和音乐节目，还想听听《来信综述》节目中有没有提到儿子的名字，你们的节目真好，以致我收听贵台以后，就不想再听别的电台了。”印度听众伐拉达拉森说：“《科学世界》中播送的许多消息展现了现代科学的奇迹，真了不起，我收听许多国家的泰米尔语广播，但没有任何电台能与贵台媲美。贵台用丰富多彩的节目，在听众中博得了好名声。”

全印中国国际电台泰米尔语广播听众协会蒂鲁齐地区分会主席M·戴伐拉贾在1993年12月31日给泰米尔语部的来信中写道：“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收听到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海外听众发表的新年讲话。我想指出的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电台的听众都得不到这样的殊荣。在此，谨向中国国家主席、中国人民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正如江泽民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一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迅速发展。这些成就是中国人民遵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决执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加快改革开放，为外国企业创造合适的投资环境而取得的，而中国国内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又为实施这些政策提供了可靠保障。我深信，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也采取这样的方法，定能在短期内获得很快的进步和发展。江主席充满自豪的回顾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令人深受鼓舞。令人振奋的是，江主席指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所作出的贡献，这非常正确。正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才使我们听众了解了中国、中国人民以及他们引为自豪的文明，了解了中国的巨大进步、中国对世界和平和稳定所作的贡献以及世界各地区的热点问题和政治经济状况。江泽民主席希望作为联系桥梁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怀着无比

激动的心情期待着江主席这一希望的实现。”全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泰米尔语听众协会司库S·赛尔文在来信中写道：“1993年12月31日，我高兴地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的新年讲话。江泽民主席的讲话阐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今天的竞争世界中，中国以其巨大的经济发展引起了所有国家的注意。每一个国家都应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我十分赞同江主席的这一观点。他的讲话使我回想起过去印度和中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话，世界和平就能实现。当听到江主席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成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的桥梁时，我真是高兴极了。我想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们听众正是通过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才清楚地了解了中国。谨向给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种帮助的中国政府表示我的谢意，请转达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先生最良好的新年祝愿。”

三、合作与交流

1980年1月，泰米尔语组副组长孙国强和南亚研究所张位钧两人应邀参加了在印度马杜赖城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泰米尔语研讨大会。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行程，他们没能在会上宣读论文。然而，当地媒体对中国代表赴会一事颇为重视，英文报《印度报》、泰米尔文报《每日电讯》等报纸都发表了消息，并刊登了大幅照片，泰米尔纳德邦印中友协还在首府马德拉斯召开大会，欢迎中国代表。他们的论文《泰米尔语在中国的发展》后来在印度“国际泰米尔语研究院”年鉴上全文刊登。

1991年11月24日，全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泰米尔语广播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南印度伊洛德市举行。当时的国际台第三亚洲

部主任王保石及泰米尔语部主任孙国强应邀出席，并在会上发言。他们的讲话不时被听众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在距离大会会场500米处的地方，听众们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们，一时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不得不由警察维持秩序。印度各地听众500多人参加这次大会，秘书长巴拉马西文说："这是印度史无前例的听众大会，是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听众大会，BBC、莫斯科电台、菲律宾电台也都召开了听众会议，但从未有过这样的规模。"更令人感动的是，大会间歇时，王保石、孙国强两位被热情的听众们团团围住，要求签名留念达一小时之久。下午，大会继续进行，并举行发奖仪式。王保石、孙国强两位向在"承德杯旅游知识竞赛"中获奖的听众发了奖，会场气氛极其热烈，发奖之后，听众开始自由发言。由于要求发言的听众十分踊跃，出现了抢话筒的场面，听协秘书长巴拉马西文见状，不得不要求发言者先在讲台的一侧排队，并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他的话音刚落，讲台一侧马上排起长龙，大多数发言者都高度赞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节目丰富多彩，胜过BBC和其他国家电台的泰米尔语节目。哥凡市听众N·巴布在发言中说："我昨天刚从广播里知道，这次年会有中国国际电台的代表前来参加，于是我就放下手中的工作，连夜骑自行车赶了75公里来参加年会。"这时，会场为他喝彩鼓掌。在同他合影时他还展示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面都是他收听国际台广播节目的记录。类似的动人故事还有不少。

家住赛勒县的女听众森达马莱，是知识竞赛一等奖获得者，她的母亲达纳姆及哥哥伊兰哥文也都是中国国际电台的忠实听众。为参加第六届听协年会及看望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客人，一家3口关门停业（她家开了一修理收音机、录音机的小铺）。参加完年会后，还继续跟随访印组好几天，并热情邀请中国客人到她家做客，但因日程安排太紧，无法去她家。她详细了

解了访印组的行程后，又和她母亲一起乘车百余公里赶到达鲁马布里县的一位女听众家等候访印组的到来，直到和王保石、孙国强一起合影，并接受采访之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后来她又得知访印组要在赛勒县长途汽车站换车时，她们母女俩又在汽车站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4点，买了水果和点心，送客人上了车才挥手惜别。听协秘书长新纳拉奇先生，原来在哥凡市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为了陪同访印组访问，打算请假半个月，但公司经理只准假3天，他觉得3天时间太对不起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了，于是他决定辞去工作，全程陪同。S·萨拉瓦能是贝利亚尔县听协负责人，他家做布匹生意。他停业13天，跟随访问组走了16个县市，行程3 000多公里，会见了数以千计的听众。在分别前夕，王保石采访了他，问他为什么放弃生意，自动来陪，他脱口而出说："为了印中友谊。"他说，他从小向往中国，想了解中国，但印度报纸上和电台中很少有中国的消息，只能从中国的泰米尔语广播中了解中国，于是他如痴如醉地收听中国电台的广播。萨拉瓦能还说："以前从广播中听到你们的声音，现在你们来这里访问，我更加钦佩你们了。"访问中，王保石、孙国强还发现有许多听众，由于付不起邮资，只能听我们的广播而不能写信。但他们把国际台以前寄给他们的礼物、纪念品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听众们高度赞扬中国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办得好，有许多听众不仅收听我台，同时还收听BBC、莫斯科电台和菲律宾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他们反映，这4家电台只有中国国际电台的泰米尔语广播是中国人自己办节目的，其他3家都是雇用泰米尔人办节目的。因此，他们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感到特别亲切，并由衷地高兴。他们认为中国电台泰米尔语节目是4家电台中最好的，新闻和语言是最严肃的，"中国电台的广播是惟一能及时了解中国的途径"。

1995年1月1日至5日，第八届世界泰米尔语研讨大会在

南印度文化名城坦焦尔举行。31个国家的1 40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印度副总统K·R·纳拉扬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闭幕式更为隆重，印度总理拉奥亲自到会并致辞。

本届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4 000多篇，其中300多篇被批准在会上宣读。

泰米尔语部主任孙国强应邀赴会，并以《发展中的中国泰米尔语广播》为题宣读了论文，当孙国强教授宣读完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祝贺。会议主席、印度的基恰纳穆蒂教授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孙国强教授以十分漂亮的泰米尔语论述了中印两国之间的友谊联系和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泰米尔语广播发展情况，这是一篇很好的论文，他精彩的叙述令人赞叹不已。"孙国强走下讲台回到座位时，不少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学者同他热情握手，并连称："论文是优秀的。"这是中国泰米尔语学者第一次登上世界规模的，最大、最具权威的泰米尔语学术讨论会讲台。

孙国强在参加第八届世界泰米尔语研讨大会期间，受到印度有关方面及全印中国国际电台听众协会十分热情友好的接待，1994年12月29日深夜，有22名听众在马德拉斯机场等候他的到来。1995年1月15日离开马德拉斯回国时，来自印度3个邦的14名听众冒雨前来送行。大会期间以及后来的参观访问中，都有许多听众前来他下榻的宾馆探望、座谈，体现了听众们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深厚情谊。

1995年1月，中国国际电台泰米尔语广播第十次听众代表大会在南印度帕若尼市举行，孙国强在参加完第八届世界泰米尔语学术讨论会后，顺道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宣读了张振华台长的贺信。约200多人赴会。

1997年6月，第十一次听众代表大会在印度古城坦焦尔举行。泰米尔语部主任朱娟华、副译审方雅琴两位女士应邀赴会，

全印中国国际电台泰米尔语广播听众协会主席 S·塞尔文、秘书长巴拉马西文、司库 S·M·拉维森地伦等在马德拉斯机场迎接两位女宾。约 150 人参加了本次大会，朱、方二人在大会上发了言，并受到热烈欢迎。

1999 年 5 月，第十二次听众代表大会在南印度小镇蒂米里举行。国际台临时决定孙国强前去赴会，100 余人出席了大会，孙国强带去了张振华台长的贺信，并在大会上宣读，会议结束后，凡鲁尔、蒂鲁齐等分会还专门召开欢迎会，表彰孙国强对中国泰米尔语广播的贡献，场面令人感动。

全印中国国际电台泰米尔语广播听众协会以及分会负责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印度人，他们热爱中国，渴望印中友好，为宣传中国和扩大国际台广播影响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并跟国际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80 年代以后，国际台每年举办的知识竞赛吸引了大量的泰米尔语听众参加。每次竞赛时，全印中国国际电台泰米尔语广播协会及其所属分会都在当地不同报刊发表有关消息，并刊登竞赛题目和国际台泰米尔语广播的波长和时间，以扩大国际台的影响。有的听众协会还以《获奖者可到中国免费旅游》的醒目标题刊登消息。

1986 年在国际台举办的《我与和平》征文活动时，印度听众 Y·S·巴鲁和 K·巴拉马西文获得一等奖。同年 7 月底，他们应邀免费来华访问 10 天。访华期间，参加了泰米尔语广播开办 25 周年纪念活动，并参观游览了北京、南京、上海和杭州，目睹了中国的建设成就，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回国后，他们通过报纸杂志广泛宣传，扩大了国际台的影响。

1992 年 4 月至 12 月，国际台举办《佳丽杯·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竞赛》活动，泰米尔语部共收到听众的答卷 18 000 份。印度全印中国国际电台泰米尔语广播听众协会负责人 S·塞尔文在

《佳丽杯·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竞赛》中，把国际台播出的有关节目全部录制下来，认真仔细地反复收听，因此，他不仅全部答对，就连中国人的人名、地名的拼写也正确无误。不仅如此，为扩大这次知识竞赛的影响，他还在报纸上发了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参加竞赛，他还到当地的学校播放录音，让学生们听后填写答卷，然后，收集起来寄到国际台。塞尔文收集寄来的答卷有1000多份，共花费航空邮资900多卢比（折合人民币200元），这对家境并不富裕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他在来信中说："通过知识竞赛，可扩大中国及中国电台的影响，扩大听众队伍，增进我们的友谊，这样做值得。"他荣获特等奖，1992年底，应邀来京访问一周，并出席了广播电影电视部迎新招待会。在会上，崔玉陵台长会见了他。回国前，胡耀亭副台长设宴为其饯行。另一位听协总会执行秘书长新纳拉奇先生也向当地报纸提供了有关国际台举办佳丽杯知识竞赛的消息。泰米尔纳德邦主要日报之《每日之花》1992年8月7日至11日刊登了这条消息，消息特别指出知识竞赛特等奖获得者将应邀免费到中国旅游一周，并介绍了国际电台泰米尔语广播播出的时间和波长。由于新纳拉奇在上述消息中留下了自己的联系地址，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就有700多人写信给他，向他索取知识竞赛试题。他写信告诉泰米尔部："这些人都在收听贵台泰米尔语广播，由于付不起邮资而从来不给你们写信。"

1994年3月至8月，国际台举办《西泠杯·中国西藏知识竞赛》活动，泰米尔语部共收到听众答卷74 850份。为了搞好这次活动，印度塞勒姆地区听众协会负责人S·M·拉维自费印刷问卷19 000份，花去1 700卢比（约550元人民币）。为了扩大影响，造就新听众，他和其他听协负责人赴当地各中学散发和收集卷子。

1995年4月至10月，国际台举办《天津杯·世妇会知识竞

赛》活动，在听众协会协助下，泰米尔部共收到听众答卷68 710份。

1995年6月，印度听众K·山蒂尔凡鲁在《南威杯·中国三峡工程知识竞赛》中获得特等奖，并应邀来华访问。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游览了长江三峡，目睹了宏伟的三峡工程。回国前，他发表观感说："中国之行使我懂得了'改革开放'一词的真正含义。"

2001年5月，在国际台举办的《中国百年》知识竞赛中，荣获特等奖的听众M·代法拉贾，应邀访问了京津两地，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了工厂、港口，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回国以后，许多报刊电台都宣传了他，官方的马德拉斯市电视台还播送了半小时的专访节目，代法拉贾畅谈了他的中国之行。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阿尔巴尼亚语和汉阿语言对比

肖桂芬

一、阿尔巴尼亚语概述

阿尔巴尼亚语是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的官方语言。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总面积只有 28748 平方公里，人口 330 万（据 1992 年统计），加上塞尔维亚科索沃地区、黑山的阿族人，居住在阿尔巴尼亚周边国家，如意大利、希腊、马其顿等的阿族人，以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阿尔巴尼亚人全部算起来也就有 600 多万人口使用这种语言。所以，阿尔巴尼亚语是个非通用语种，应用范围相当窄。

阿尔巴尼亚语属于印欧语系，它有着印欧语系诸语言所共有的特点：语音上有较多的塞音并有清浊音相对应；在语法方面，名词有性、数、格的变化，动词有人称、数、式、语态的变化。其发展方向也同印欧语言总的发展方向相同：曲折变化系统所起的作用逐渐缩小，而语序和虚词在决定语法关系时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增加。但是阿尔巴尼亚语仍然保留了复杂的曲折变化系统，词形变化十分丰富。在句子中各种词类有着严格的一致关系（形容词和名词要保持在性、数、格上的一致，主语和谓语要保持人称、单复数、时态上的一致关系等等）。

第一个证明了阿尔巴尼亚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学者是德国语言学家弗兰兹·博普（Franz Bopp）。他在 1855 年出版的研究著作

《论阿尔巴尼亚语的亲属关系》（Ueber das Albanesische）中对阿语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这一语言肯定地真正属于印欧语系”。现在，这一论点已经得到了语言学界的公认。

阿尔巴尼亚语不是来自现今的任何一种印欧语言，而是构成印欧语系中独立的一族——阿尔巴尼亚语族。很多中国人不大了解阿尔巴尼亚语，一些人误认为阿尔巴尼亚语属于斯拉夫语族，还有一些人以为阿尔巴尼亚语属于拉丁语族。其实不然，它同希腊语、亚美尼亚语一样，在印欧语系大家族中占据着一个自己独立的位置。它是巴尔干半岛上一种古老的语言。许多学者认为阿尔巴尼亚人是古伊里利亚人的后裔，阿尔巴尼亚语是伊里利亚语的子语。伊里利亚语是古伊里利亚人的语言，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古代伊里利亚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3 千纪年末）就形成了，在公元前 5 世纪时就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公元前 4－2 世纪曾是巴尔干重要的政治因素，地理上的版图曾经十分辽阔，分布在当时的马其顿王国西边（包括现在的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北部、意大利西部等地）。公元 2 世纪时罗马占领了伊里利亚后，伊里利亚的国家就消亡了。随着罗马人向伊里利亚的移居，带来了新的语言、风俗、文化和宗教，城市中的伊里利亚人开始罗马化。但是其余大部分的伊里利亚人保存了自己的语言。公元 395 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时，阿尔巴尼亚被划到东部（拜占廷帝国），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又延续了几个世纪。公元 6 世纪起斯拉夫人南下，以后很多伊里利亚人（居住在现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等地的古伊里利亚人）被斯拉夫化。但在伊里利亚南部地区，特别是在今天的阿尔巴尼亚边区（如科索沃、杜卡吉尼、迪布拉等地），那里的居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征和语言。后形成现在的阿尔巴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语，尽管它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影响，但在整体上保留了自己的语音体系和语法结构的基本特点。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阿尔

巴尼亚语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语言，却没有书面的文献作证明。阿尔巴尼亚语的文字历史比较短，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关于阿尔巴尼亚文字的文献资料是1462年的《洗礼祷告语》，第一本用阿尔巴尼亚文字书写的书是焦恩·布祖库的《弥撒》，出版于1555年。一些学者推论，阿尔巴尼亚的民族文字应该是早在13世纪就已经开始形成。但是没有具体的物证。一直到1908年11月14日马纳斯蒂尔代表大会才确定了现今所使用的字母表。阿尔巴尼亚民族标准语是在20世纪形成的（1972年地拉那正字法会议）。

阿尔巴尼亚语有两种方言：南部的托斯克方言和北部的盖格方言，两种方言差别不大。

随着历史的演变，阿尔巴尼亚语也发展了不同于印欧其他语言的、而是自己所特有的一些特征，如：它有带小词的形容词（i mirë, e bukur），与不带小词的形容词相对应。它创立了“我的”（im, ime）“你的”（yt, jote）一类的物主形容词，它有着其他语言都没有的动词惊奇式形式，还有一种动词非扩展形式（pa punuar）等。阿尔巴尼亚语还有一些同巴尔干诸语言共有的现象：定指小词后置、名词有两套变格（定指与非定指），利用动词 dua 构成动词的将来时（do të punoj），通过人称代词的非强调形式来重复宾语等。

二、汉阿语言对比研究的意义

根据发生学分类法，汉语属于汉藏语系，阿尔巴尼亚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和阿尔巴尼亚语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按照类型学分类法，汉语属于孤立语，典型的分析型语言，没有词形的变化，主要是靠语序和虚词来表达语法关系；阿尔巴尼亚语属于综合语，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屈折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词的形态

变化作为主要的语法手段。如词本身有内部曲折变化，有音的交替，它通过内部曲折变化构成词的语法形式，并以词形变化表示其语法类属以及在句中的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在书写上汉语独具一格，是表意文字，文字的最小单位是字，每个字都包含有形、音、义3个要素。阿尔巴尼亚语是拼音文字。不少语言学家尤其是阿尔巴尼亚语语言学家把阿尔巴尼亚语归属到综合－分析型语言。它的综合型语言成分居多，分析型语言成分较少，所以仍不失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屈折语，但是也具有了某些分析型语言的成分。总而言之，不论是在语言的亲缘关系上还是在语言的类型上，汉阿两种语言都相距甚远。

正因为汉阿两种语言相差甚远，汉阿语言对比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揭示语言发展的规律，加深对阿尔巴尼亚语的进一步了解

通过语言对比找出汉阿两种语言的异同点及其形成的原因，能够加深对阿尔巴尼亚语性质和特点的了解。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之后才能显示出来。要认识阿尔巴尼亚语的特点，就要把阿尔巴尼亚语跟汉语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不论在教学上还是在翻译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教学质量

学习阿尔巴尼亚语，学生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所学的阿尔巴尼亚语言同自己的母语进行比较。老师授课时不进行比较，学生们自己也会进行比较。所以老师要主动地进行两种语言的比较，加强教学针对性，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对学生的学习难点进行预测，正确地引导学生，避免其负面作用。教员要在汉阿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把对比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学大纲。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教学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使

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指导阿尔巴尼亚语教材的编写

对于两种语言都有的一致的现象可以不讲或少讲。对于一些差异点就要有目的地多讲些，使教材更有针对性。尤其是翻译课程的教材编写更离不开汉阿语言对比。

语言理论的研究是翻译的基础

汉阿两种语言的对比可以对这两种语言的相同现象与差异现象得到比较准确的认识，对两种语言在理论上的研究就会更加深入，认识更加准确。在翻译上就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语言特点使译文更加符合译入语言的规律，译文质量更高。所以翻译学理论是以对比语言学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这种对比使翻译研究减少了盲目性。

三、汉阿语言对比

语音方面

阿尔巴尼亚语有 36 个音素，每个音素用一个符号来表示，共 36 个符号（采用拉丁字母），其中 9 个是双字母（xh，th，dh，sh，gj，ll，nj，zh，rr），2 个带有附加符号（ç，ë）。阿尔巴尼亚语的拼读原则是拼写与读音完全一致。

汉语普通话中韵母 39 个（单韵母和复韵母），声母 23 个（声母由辅音来充当，辅音 21 个），清音声母占 17 个，浊音只有 4 个（m，n，l，r），清辅音明显占辅音中的大多数。阿尔巴尼亚语中辅音的数量大大超过元音的数量（辅音 29，元音 7）。辅音中浊辅音居多，29 个中就有 18 个是浊辅音。

汉语中没有清浊辅音的对应，只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对

应。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汉语的重要辨义因素。而阿尔巴尼亚语的语音特征是辅音的清浊对应。阿尔巴尼亚语中有10对对应的清浊辅音（p－b，t－d，c－x，ç－xh，q－gj，k－g，f－v，th－dh，s－z，sh－zh）。清音和浊音具有区别性特征，对区别词义十分重要。例如：baba（爸爸）——papa（教皇），bishë（野兽）——pishë（松树）；galë（乌鸦）——kalë（马），bashkë（共同）——Pashkë（宗教节日复活节），darkë（晚饭）——targë（车牌）等。

汉语中几乎没有辅音连缀的现象。而阿尔巴尼亚语中辅音丰富，辅音连缀（辅音丛、辅音群）的语音现象很多，甚至有三四个辅音相连的现象。比如：ngre（抬起）这个单词中有3个辅音连缀‘ngr’，gurmprehës中有4个辅音连缀‘rmpr’。而且辅音连缀既可以出现在词首，例如：tregoj中的“tr”，mbledhje中的“mbl”；也可以出现在词中，例如：adresa中的“dr”、regjistrim中的“str”，还可以出现在词尾：dhëmb中的“mb”、kurs中的“rs”等。

音节是语言中最小的语音组合单位。现代汉语中音节的结构比较简单，一个音节最多的时候可以有3个元音（一个紧接一个）。辅音大多在音节的首位（声母），只有n和ng两个辅音可以位于元音之后或音节的末尾。汉语中音素的组合是有很多限制的。声母和韵母的结合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j，q，x不与a，o，e，u以及以这些元音为开头的韵母相拼等。而现代阿尔巴尼亚语中音素的组合比较自由，没有太多的限制。音节的主要成分是元音。辅音不自己单独成为音节。一个单词中有几个元音就有几个音节。辅音在音节中的位置很自由，不受什么限制，既可以在音节之首（li），也可以在音节中间（mbi），还可以在音节末尾（im）。

汉语是孤立语。是一种声调语言。字是单音节的。重音并不

是区别特征，声调才是区别词语意义的区别性特征。而阿尔巴尼亚语则属于一种重音语言。它没有声调，它的所有两个音节以上的单词都有重音。重音是词的语音结构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辨别词义的区别性特征。

阿尔巴尼亚语的重音固定在词干的某个确定的音节上。在名词、形容词上重音更多地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例如：dí－mër，marrëvéshje，i dréjtë，等。动词的重音一般落到词干的最后一个音节上，如：përháp，gëzój，përgënjeshtrój 等。外来借词进入阿尔巴尼亚语后，其重音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例如：fërkój < fríco，fërgój < frígo，gjemój < gémo 等。在名词、形容词和代词变格以及动词变位时，重音并不移动；同样它也从不落在表示语法意义的词尾上。

语法方面

（1）词的形态变化。汉阿语法方面最大的差别就在词的形态变化上。汉语的词只有一种外在形式，在造句行文中形态不变。阿尔巴尼亚语中的词却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尤其是名词的变格系统，词形变化纷繁复杂。名词有 3 个性（阳性、阴性、中性）、两个数（单数、复数）、5 个格（一格、二格、三格、四格、五格），还有定指与不定指两套区别。形态各不相同。不同的形态代表着不同的语法功能。动词也有复杂的变位系统。通过变位来区别其人称、单复数、体、时、态的情况（不同人称的动词有着不同的词尾形式：shkoj 我去，shkon 你去，shkojmë 我们去，shkoni 你们去等；不同的“体”、“时”、“态”也有着不同的形式，以此类推）。

汉语中的词基本上不存在“性”的语法范畴（他、她等例外）。而阿尔巴尼亚语存在“性”的语法范畴，尤其是对于名词来说更是不可缺少的属性，一个名词出现时必定包含有“性”的

语法概念，或是阳性或是阴性或是中性，比如：学校（shkollë）是阴性，机关（institut）是阳性；草（bar）是阳性；树（pemë）是阴性；耳朵（vesh）是阳性；嘴巴（gojë）是阴性。同是一类事物，有的词是阴性，有的词是阳性，同是"桌子"，tavolinë 是阴性的，desk 却是阳性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但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阳性名词多以辅音结尾，阴性名词多以元音结尾）。

（2）表达上的语序问题。

◆ 主语、谓语、宾语的顺序。汉语句子中主要成分（主语、谓语、宾语）的位置一般来说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不能随意变动。主谓宾的排列顺序只能是主谓宾，决不可以是宾谓主，也不能是谓主宾或谓宾主的语序。语序位置上发生变化，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或是干脆就失去了意义。这是因为汉语是典型的分析语，词没有形态变化，词语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安排语序及使用虚词来表达，所以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十分重要。

一般来说，阿语句子中主要成分主语、谓语、宾语的排列顺序与汉语是相同的，即主语在前，谓语在主语的后边，宾语在谓语的后边。但是在阿尔巴尼亚语中，主语、谓语、宾语的排列顺序还有其自由的一面。换句话说，阿尔巴尼亚语句子中主要成分是可以任意调换位置而不改变其在句子中成分的语法功能。句子中最主要的语序是主谓宾。但是也可以是谓宾主、宾主谓、宾谓主等任何顺序。请看下列句子：

排列顺序为：	Ujku （主）狼	ha （谓）吃	delen. （宾）羊
排列顺序为：	Ha （谓）吃	ujku （主）狼	delen. （宾）羊
排列顺序为：	Delen （宾）羊	ha （谓）吃	ujku. （主）狼

排列顺序为：Ujku　　delen　　ha.
（主）狼　（宾）羊　（谓）吃

在阿语中，上边4种排列顺序，句子的意思都没有改变，还是“狼吃羊”。不论词序如何调整，每个词的语法功能并没有改变，这与汉语是截然不同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阿尔巴尼亚语是综合型语言，各种词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一个词常常可以同时表达几种语法意义，从词的不同形态就可以判断出它是什么词类，它在句中的语法功能作用，它与其他词的关系等。ujku 是主格的形式，而 delen 是宾格的形式，无论它们处在什么位置上，主格都是主格，宾格都是宾格。因此，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语序的变化，是有着修辞意义的，不同语序的强调点是不同的。

◆ 定语的位置。在汉语中，修饰名词的定语总是位于名词之前。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在前，名词在后；例如：大苹果。当用名词修饰名词时，修饰的名词要放在前边，被修饰的名词要放在后边。如：学生的书。而且汉语没有定语从句。在阿尔巴尼亚语中则相反，修饰名词的形容词要放在名词之后。名词在前，形容词在后：mollë e madhe（苹果是大的）。如果是名词修饰名词，则是被修饰的名词要放在前边，而修饰名词的词要放在后边：libri i nxënësit（书是学生的）。阿尔巴尼亚语中不仅有定语从句，而且定语从句的句子可以很长，定语从句的应用相当频繁。不过要注意，定语从句一定要紧跟在被说明的词后边。

汉语中是物主代词修饰名词，且物主代词在前，名词在后。如：他的书。在阿尔巴尼亚语中修饰名词时要用物主形容词（汉语中只有物主代词而没有物主形容词），排列顺序是名词在前，物主形容词紧跟其后：libri im（词的顺序是“书我的”）。阿语中的物主代词只单独用（libri është imi. 词的顺序是“书是我的”）。

汉语中疑问语气词要放在句尾，而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疑问语

气词总是放在句首：你去学校吗？A shkoni në shkollë ?

◆ 表达姓氏。在汉语中是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在阿尔巴尼亚语中则是人名在前，姓氏在后，且首字母要大写（如：Fatos Nano，法托斯·纳诺，这里第一个词 Fatos 是名字，第二个词 Nano 是姓氏）。如果要称呼 XX 同志、XX 先生、XX 老师时，阿语中的顺序恰好同汉语相反，要说成 shoku filan（同志 XX），Zoti filan（先生 XX），profesor filan（老师 XX）。

◆ 表达时间。在汉语中，时间的表达顺序是从大到小，要先说年再说月最后说日，如：1998 年 4 月 5 日；而在阿尔巴尼亚语中则恰好相反，要从小到大。先说日再说月最后说年，如：më 5 prill 1998（词的顺序是“5 日 4 月 1998 年”）。

◆ 表达地点。汉语中地址的书写顺序是从大到小（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语恰恰相反，是从小到大（外国语大学，北京，中国）。

◆ 表达方位。方位词的表达方法也不一样：汉语说东南，阿尔巴尼亚语要先说南后说东 juglindje（南东），西北——veriperëndim（北西），东北——verilindje（北东），西南——jugperëndim（南西）。

（3）被动语句式的用法。汉语和阿尔巴尼亚语都有与主动句相对应的被动句句式。被动句的主语都是表示受事者的名词或代词。表示被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方式。汉语和阿尔巴尼亚语有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现代汉语基本上采用句法的形式，借助词汇手段和一定的语法格式；阿尔巴尼亚语则是借助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达被动句。汉语中的被动句大致有两种：意义上的被动句（无“被”字或被动介词的句子）和带被动结构的被动句（“被”字句或带被动介词的句子），意义上的被动句用得多，被动结构的被动句用得少。阿尔巴尼亚语中的被动句只有一种：被动语态的句子。被动语态的动词可分为被动、反身和中间态 3

种。被动句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的应用比较多。

被动语态在阿尔巴尼亚语中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句式。当施事从上下文中可以直接看出来、不想指出施事、施事不知或难以说明以及受事需要强调时，阿语中都用被动语态来表达。在阿尔巴尼亚语中，及物动词都有被动式，不仅使用广泛，而且使用频率也很高。意义被动式在阿尔巴尼亚语中比较少见。因此，阿尔巴尼亚语常用结构被动式，少用意义被动式。阿尔巴尼亚语中的结构被动式常常译成汉语的主动式。例如："人人都尊敬他。"这句话在汉语中只有这么一种表达方式，而在阿尔巴尼亚语中却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被动方式 Ai është respektuar nga të gjithë. 主动方式 Të gjithë respektojnë atë）。

（4）数词和量词。汉语里的"万"字是个常用单位，人们说一万，十万，百万，千万等等。但在阿语里却没有"万"。阿尔巴尼亚语中常用的单位是 mijë（千）。用阿语表达"万"，要说 10 个千（dhjetë mijë）；5 万，要说 50 个千（pesë dhjetë mijë）。30 万要说 300 个千（tre qind mijë）。汉语里有个"亿"字，阿语则没有，阿语里有 milion（百万）和 miliard（十亿）。一亿在阿语中是 100 个百万（qind milion）；两亿要说 200 个百万（dy qind milion）。"千"（mijë）、"百万"（milion）和"十亿"（miliard）在阿语中是表达较大数字常用的 3 个关键词。万和亿是汉语中表达较大数字的两个词。

量词在汉语中是单独的一种词类，极少独立使用，而总是同数词一起使用。量词丰富是汉语的一个显著特点。为对比方便，我们把汉语中量词分为 4 大类：度量词（度量衡单位）、名量词（限定名词的）、动量词（限定动词的）和复合量词。阿尔巴尼亚语中的度量词和复合量词同汉语基本相同。在名量词中，汉阿两种语言都有借用量词（借用名词做量词，如一杯水 një gotë ujë）。不同点是在汉语中有大量的"个体量词"（条、块、顶、张、把、

件等等)，阿尔巴尼亚语中则根本没有个体量词。这是因为汉语中数词不能直接修饰名词，一定要同量词组合，然后才可以修饰限制名词。量词名词还要注意搭配，不可以随意组合。而阿尔巴尼亚语中数词可以直接修饰限制所有的“可数名词”，也就是说当需要说明“可数名词”的数量时不需要用什么量词，直接用数词就可以了。动量词是表示动作频率的，阿语中是借用其他的词。量词在阿尔巴尼亚语中数量很有限，语法中没有单独划分出这种词类，而是包括在名词中。量词的使用方法同汉语也有很大的区别。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

(5) 其他方面。汉语中人称代词第三人称有他、她、它 3 个词 (3 种形式)，阿尔巴尼亚语中只有“他 (ai)，她 (ajo)”两个词，而没有“它”这个词。在阿译汉时就要特别加以注意。

汉语中说“我 5 岁”，“今天星期五”，“他很漂亮”，都没有动词。而在阿尔巴尼亚语中这样的句子必须加上一个“是”动词。Unë jam 5 vjeç. 如果把“是”这个动词省略，在阿尔巴尼亚语中就是个语法错误。汉译阿要加上“是”动词，阿译汉时要舍去 jam 这个词。

汉语中副词只修饰动词和形容词，不能修饰名词。阿尔巴尼亚语中的副词不但可以修饰动词和形容词，还可以修饰名词或代词。但要注意起修饰作用的副词要后置。比如：“左边的路”中“左边的”既可以是形容词‘rruga e majtë’，也可以是副词‘rruga majtas’，“那边的她”ajo atje“那边的”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用副词 atje。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两个远隔千山万水的国家，都是发展中的国家，一个在亚洲，一个在欧洲。解放前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来往和接触。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知之甚少。自然，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是少得可怜。阿尔巴尼亚前

外长雷兹·马利列就说过：（建交前）中国人民的生活对于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是既陌生又神秘的。

1949年11月中阿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两国开始有了来往。60年代到70年代是中阿关系的顶峰。至今我国向阿尔巴尼亚派遣留学生累计有百余人。不仅如此，国内自1961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始建立阿尔巴尼亚语专业后（北二外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也曾有过阿尔巴尼亚语专业，后因中阿关系恶化，阿尔巴尼亚语专业撤销），至今培养的阿尔巴尼亚语专业毕业生也有百余人。应该说中国人学习阿尔巴尼亚语的人数在比例上是不少的。这些人为中阿两国的国家关系、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通过阿尔巴尼亚语的桥梁作用，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都有了很多的了解。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在汉阿语言对比方面作什么努力。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在国内要想得到发表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搞这方面工作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读者太少，一些刊物不太愿意发表这样的文章。

感谢北京广播学院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我希望我对阿尔巴尼亚语的浅薄论述能起到某种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能有人继续进行阿尔巴尼亚语的研究，使汉阿语言的对比研究更加深入，让我国的阿尔巴尼亚语教学质量更上一层楼，让非通用语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2.《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集》（1979－1984），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5年。

3. 林杏光：《汉语句型》，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

4．吴宗济：《现代汉语语音概要》，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2年。

5．王福祥：《对比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年。

6．赵永新：《语言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5年。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系）

从我校匈牙利语专业40年的历史看非通用语种的发展道路

龚坤余

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教授30多种外国语言，其中有26个为非通用语专业，在26个非通用语专业中，绝大多数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以往的殖民地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并与我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在与亚非拉各国人民的交往中，为了尊重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感情，一定要重视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应抓紧培养掌握这些国家语言的人才。[1]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大学于1961年成立了亚非语系和东欧语系（现更名为欧洲语言系），开设了10多个新专业。非通用语专业创建于我国困难时期，中断于“文革”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40年来，非通用语专业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渐走向成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优秀人才。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原东欧语系匈牙利语专业为例，它创建于1961年。40年来，匈语教研室共为外交、经贸、文化、新闻、科研等单位输送了100多名合格的匈语人才，为架起中匈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在我国驻匈牙利使馆的外交官中，大部分是我校匈牙利语专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业的毕业生；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匈牙利语部工作的所有翻译和播音员全部毕业于我校匈语专业。匈语专业的许多毕业生正在外交、经贸、文化、科研等战线上不倦地工作，匈语专业的老师们也在为培养新一代的匈语人才辛勤耕耘。可以说，匈语专业的发展历史是绝大部分非通用语专业发展史的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通用语专业由创业到发展的全过程。

一、事业的开拓者

1961年9月，匈牙利语专业正式创建。人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这是通常的道理，意思是说，守业难于创业。然而在高等学校开设一个新的专业谈何容易！担负着开设匈语专业重任的贾淑敏老师面临的现实是：图书资料，没有；课本、词典，没有；匈语教学经验，没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除了她在国外留学期间带回的一些书籍外，其他与教学有关的材料一无所有。然而她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既要编写教材，又要上课、辅导、批改作业。在那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贾淑敏老师单枪匹马，白手起家，硬是撑起了匈牙利语教研室的牌子，为匈语专业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贾淑敏老师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医预系。1950年9月，她作为我国第一批（共5人）派往匈牙利的留学生，在布达佩斯罗兰大学文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后在外交部和我国驻匈牙利使馆工作多年。1961年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始匈语专业的筹建工作。她是一位热爱教育事业、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资深老师，是匈语专业的创始人、奠基者，她把自己的学识和精力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匈语的教学工作和匈语人才的培养工作，深得同学们和老师们的爱戴。为表彰她在培养匈语人才、传播中匈文

化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1990年4月12日，匈牙利文化部授予她“匈牙利文化勋章”，并在匈牙利驻华使馆为她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二、国内第一批匈语专业的学生

1961年9月，来自祖国各地的10多名学子，带着青春的笑容，踏着轻盈的脚步，跨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门，成为我国第一批在国内学习匈语专业的大学生，开始了为期5年的大学生活。

这批多数来自农家的大学生，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入学时正赶上3年困难时期，再加上他们家境贫困，所以生活都很俭朴，大部分同学都享受最高的甲等助学金——每月12.5元的生活补助费（后提高到15.5元）。生活条件虽然差，但同学们学习的热情却很高，“为祖国而学习”是同学们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图书馆、阅览室是同学们最熟悉、最留恋的地方，无论是上自习，还是节假日，很多同学都在图书馆苦读，娱乐生活少之又少，令同学们最兴奋的莫过于每星期六晚上在5号楼前操场上花5分钱看一场电影。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年的寒窗苦读，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培养的第一批匈语专业毕业生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这批毕业生，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匈牙利语人才，他们填补了中央有关部门无匈语人才的空白。目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快到退休年龄，但他们仍在辛勤地工作着，不少人担任着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

三、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

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学校

的教学活动陷于停顿。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没有书教。招生工作停止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好在1967年，教研室的老师们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与外交部的匈语干部一起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匈文本。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来不得半点马虎。匈语教研室全体教师早出晚归，认真翻译，逐字推敲，反复修改，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校对，匈文版《毛主席语录》终于出版了，这是外交部的匈语干部和北外的匈语老师经过一年多辛勤劳动的成果，是以自己的劳动和汗水胜利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的结晶。匈文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据从事匈语工作的同行反映，译文质量相当高，全书共424页，连一个印刷错误都没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四、"五七"干校和工农兵学员

1970年，全校师生奔赴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刚去时，住的是油毡棚，睡的是木板床，几人一室。夏日，室内闷热似蒸笼；冬天，西北风穿墙透心凉。白天，大伙儿参加田间劳动；晚上开会学习，忆苦思甜……

1971年，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匈牙利语专业也招收了15名学生。这些学生，或插过队，或当过兵，经受过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生活的磨炼。而就其文化水平而言，参差不齐，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个别同学只有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这给老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老师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满腔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上午教书，下午在田间劳动，晚上改作业，编教材，并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加强辅导，使大多数同学的中、外文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1972年7月，全校师生员工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回

京后，教学条件比起干校有了较大的改善，同学们对业务学习抓得比以前更紧。除正常的学习时间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补习功课，拓宽知识面，力争弥补“先天不足”。1974年，他们顺利结束了4年的大学生活，不少同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今，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骨干作用。

五、编纂《匈汉词典》

早在1970年，当匈语教研室的教师还在“五七”干校时，就已开始着手准备《匈汉词典》的编纂工作了。《匈汉词典》是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与东欧其他语种的词典同时开始编写的，由于教研室人手不够，加之工作量大，所以在初稿编写阶段，借调了外单位3名匈语工作者和4名俄语教师，共同进行编写工作。1974年，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在其后的10年时间内，匈语专业没有招生，因而没有教学任务，教研室所有的老师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词典的编写与校对工作中去。1982年，《匈汉词典》的编写、校对工作胜利完成。为进一步提高词典的质量，经有关部门批准，匈语教研室的两位老师携稿飞赴匈牙利，与匈牙利5位著名的汉学家一起，共同审定词典稿。经过中、匈两国专家一年半的辛勤劳动，审校工作于1984年按期完成。《匈汉词典》书稿从1970年开始准备，到1984年全部完稿，历时14年。本词典共收入5.5万余词条，3万多条词组和习语，它是我国第一部收词量多、内容丰富、释义准确的匈汉中型语文工具书，它的编纂和出版，对匈语翻译工作者和词典的使用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尚未正式出版。我们期待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匈汉词典》能早日问世。

六、国内外双向办学

1984年9月，第三批匈语专业的18名新生入学，这是“文革”后匈语专业第一次招收学生。一年后，有4名学生被一些中央单位选送出国留学，余下的14名学生继续在校学习。当时学校和系领导都在探索如何高质量地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的道路。经过反复讨论研究，认为走出国门，实行双向办学，即先在国内学习两年，再把全班学生送到国外学习两年的办法较为可行。于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下，1986年，匈语班14名学生赴匈牙利佩奇市亚诺斯·潘诺尼乌斯大学（简称佩奇大学）学习，随班有一名教研室老师一同前往。走出国门，开门办学，完全是一件新生事物，无任何经验可借鉴，在匈中友协佩奇分会主席巴尔迪·拉斯洛先生的热情关怀下，在佩奇大学的领导和教师的积极配合和帮助下，课程设置、学习生活、参观访问等安排得井然有序。在特定的环境下学习外国语，感性知识强，比纯粹从书本上学习要快得多，实用得多。经过两年的学习，同学们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口语、听力、表达能力等有了质的飞跃，对匈牙利的国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俗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性认识，这对他们日后参加工作十分有益。1988年，全班同学按时顺利返校，参加毕业分配。

七、匈语人才需求量增大与趋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对外经济交流的日益发展，社会对匈语人才的需求量逐年增加。1988年，匈语专业招收了第四批新生，共15名。1989年，匈牙利社会发生剧变后，一批批中国人前往匈牙利经商，对他们来说，在匈从业的最大障碍之

一是语言问题，匈牙利语既不同于周边国家的语言（俄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等），又不同于人们普遍熟悉的英语、德语或法语，它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语法现象特别复杂，要想在匈牙利立足，不懂匈语，或没有匈语翻译是难有成就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赴匈的经商者便想到了在校学习的匈语专业的学生，开始"挖墙脚"来了，班上有少数同学因此而退学。由于上届毕业生与本届毕业生的毕业时间相隔有10年之久，中间有较大的空挡，中央有关部委也急需补充匈语人才，因而本届毕业生成了"抢手货"。

匈语专业通常每4年招收一班新生，即毕业一班招收一班（"文革"期间除外），但由于社会对匈语人才需求量的不断增加，1992年和1993年，连续两年分别招收了15名和19名新生。1992级的学生中，有13名是中央各部位委托培养的定向生，1993级的学生则全部为收费生，毕业时国家不包分配，实行双向选择，这是毕业生分配制度上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1997年和1999年，根据扩大招生的计划，匈语专业又分别招收了22名和24名学生，使匈语专业的在校生达到46名，创造了匈语专业创建40年来在校生最多的纪录。

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的变化，自2000年起，这种增长势头已趋缓，供需关系似有捉摸不定之嫌。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对招生规模、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等随即作了适当调整，以便培养出高质量的复合型、复语型的外语人才。

八、专业学习与第二外语的关系

随着招生数量的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近两三年来，社会对匈语人才的需求量正在逐步减少，匈语毕业生所学非所用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在计划经济时代，非通用

语种的毕业生完全由国家负责分配，真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只要专业达到毕业水平，总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单位，即使用人单位不十分需要，那也得接受。然而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毕业生的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双向选择，择优录取，自主择业……毕业生被推向了人才市场。单纯需要匈语人才的单位越来越少，而既通晓匈语，又掌握第二外语，且综合素质较高的学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在此情况下，原有的288学时的英语二外课时就显得不够了，必须调整专业外语与第二外语的课时比例，分配好学习时间，做到专业外语的学习与第二外语的学习两不误，这是摆在教师和学生面前的重要课题。一方面，专业外语的水平不能降低；另一方面，又要加大第二外语的教学力度，提高二外的水平，达到双语教学的目的。根据学校新的教学计划，2001年入校的部分非通用语专业的新生，将在四年的学习期间，第二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学习时数将超过900学时。如果考试合格，将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颁发的英语大专文凭，这样，我们的学生掌握了两门外语，再加上其他的知识，就可以极大地增加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但大学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能顾此失彼，保证一定的课时量，适当增加课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在单位时间内取得更大的教学效果。根据目前社会对匈语人才需求量逐渐减少的趋势（每个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毕业生用得上专业），我们认为，非通用语专业+英语的教学模式不失为一种良策。当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为重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九、继承传统，勇于创新

匈语专业成立40年来，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

等方面，都在不断摸索和改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匈语专业，或广义地说大部分非通用语种专业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近亲繁殖”，师生相承。这种现象大多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因为不少专业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难于从外单位引进人才，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某些先天不足。老教师常年从事教学，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教学方法。年轻教师留校后，往往承袭了老教师的许多优良传统，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以少走弯路，迅速成长。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近亲繁殖”的负面影响，继承的多，创新的少，沿袭的多，突破的少，这对专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匈语专业的老师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考虑到不能从外单位引进人才进行“掺沙子”的客观原因，老教师特别注重对年轻教师的培养，鼓励他们千万不要碍于面子，缩手缩脚，照葫芦画瓢，而应敢于突破老教师的传统，勇于创新，根据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根据社会对匈语人才的新的要求，不断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更新课程设置。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学课程在教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讲授文学又是老教师的特长，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而在当今时代，如果还沿用老办法、老传统，过于侧重文学课程的教学，显然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改革，思想比较解放。尤其是近年来，除了语言文学课程外，我们还增设了有关外交、经贸、国情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开发了应用文写作与翻译等课程，加大了报刊选读的力度，这极大地扩大了同学们的知识面，提高了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而这些新知识、新课程是前辈们很少甚至没有涉猎过的。因此，只有敢于突破传统，勇于创新，才会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是没有出路的。

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匈语教研室的教师一般保持在3～4名，他们与通用语专业教师相比较，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从新生入学到毕业的4年时间里，所有的专业课程都由这几名教师担任，换句话说，他们要与这班学生相处4年。在人生的道路上，4年时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个刚从中学升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教师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时不在影响着他们，因此，教师的示范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教书育人本是每个教师的天职，但非通用语种的教师从新生入学开始，一带就是4年，其肩负的职责就非同寻常了。匈语专业的教师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始终把教好书、育好人当作光荣而神圣的职责，业精于勤，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多地传授给学生，除此之外，老师们还关心同学们的成长，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老师们经常与学生谈心，交流思想，给学生们讲授外事纪律和外交礼仪，甚至如何使用刀叉，都是由教师传授。同学们献血了，老师们去看望；某个同学学习成绩下降了，老师们与之谈心，分析原因所在，找出改进的方法；老师哪一天过生日，同学们记得一清二楚……总之，老师们把同学们看作是未来的接班人，同学们把老师看作是亲密的朋友，尊师爱生蔚然成风，这是匈语专业40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

十一、中匈友谊情

在匈语专业创建40年的历史中，先后聘请过8位匈牙利专家前来任教，他们是：海基·安德烈、拜盖·米克洛什、尤若·山多尔、塞格·拉斯洛、加尔·盖尔盖伊、维尔特·尤迪特、莫尔纳

尔·伊伦娜和豪伊纳尔·拉斯洛。匈牙利专家来校任教，在推动匈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材建设、培养青年教师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从国内带来了音像资料、教学用书等，为匈语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匈牙利文教部和匈牙利驻华使馆也极为关注匈语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匈牙利文教部曾多次向匈语教研室赠书，总数达数百册。1994年，匈牙利文教部代表团访华期间，曾专程前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参观访问，并向匈语教研室赠送了一套匈语教学录像片（包括录像带、录音带、文字资料、生词汇编等）。匈牙利驻华使馆的大使、参赞和文化官员也多次来校听课，与学生们座谈，每年还邀请学生们去使馆看电影，参加招待会。每当有匈牙利代表团访华时，他们总要来我校参观访问，与匈语教研室的师生座谈，了解学习情况，学生们也利用这种机会展现自己的匈语水平和其他的表演才能。为了激发同学们学习匈语的热情，匈牙利使馆还举办过"匈牙利专题智力竞赛"，同学们热情参加，气氛热烈，既提高了他们对匈语学习的兴趣，也增长了他们对匈牙利的了解。

199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北外的匈语教研室和罗兰大学的汉语教研室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两个教研室互派教师到对方任教，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与友谊。

十二、再接再厉，不断前进

40年来，匈语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只能单一培养本科生到今天可以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人才培养上，共培养了100多名合格的毕业生，目前仍有23名学生在校就读。在教

材建设上，编写了《匈牙利语教程》、《匈牙利语语法》、《匈汉会话手册》、《匈牙利语翻译教程》等。在科研方面，老师们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过百余篇论文和文章，翻译出版了许多著作，如《匈牙利史》、《东欧社会学》、《约卡伊·莫尔短篇小说选》等。

为了提高学历层次，适应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欧洲语言文学博士点，匈语专业也包括在内。1999年，匈语教研室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它是匈语教研室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阶段，必将对匈语专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2000年，教育部高教司发函，为了巩固和发展外语非通用语专业，确保我国非通用语种专业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不断线，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建立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东欧语系积极申报，建立东欧语种群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2001年，基地申报工作获得成功，这必将对全系各专业（包括匈语专业）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我们深知肩负的担子很重，前进的道路还很长，许多工作还在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永不满足，永远进取，这是匈语教研室每个教师的座右铭。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系）

在友谊的海洋里畅游

——与巴基斯坦乌尔都文学界交流点滴

张世选

一、关于乌尔都语

乌尔都语是我国的友好邻邦巴基斯坦的国语，也是印度的第二语种。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侨民占据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中东国家人口的60%以上，所以乌尔都语在中东地区也很流行。

由于历史的原因，乌尔都语与印地语（印度国语）不仅大部分词汇通用，而且语法与句式也相同，因此，操印地语与乌尔都语的人完全可以对话；只因两种语言书写形式不同，才使讲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人阅读对方的印刷品受限。鉴于此，人们又把这两种姊妹语言合称为印度斯坦尼语。印度斯坦尼语是世界第二或第三大语言。只因为印度与巴基斯坦经济与科技相对落后，国力不强，世界影响不及发达国家，所以印度斯坦尼语以及乌尔都语、印地语未能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也就未能进入通用语的行列。

乌尔都语的雏形最早出现于十三四世纪的诗歌中。乌尔都语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如列赫塔、印德维、印地等。乌尔都语是穆斯林征服者占领印度次大陆以后，他们的语言即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与当地的土著语言相互融合的产物。“乌尔都”一词来自土耳其语，词义是“军

营”。乌尔都语大概是因为最初流行于军营中而得名。乌尔都语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官方语言。

1954年，北京大学东语系开设了中国第一个乌尔都语本科班，至今已有几个本科班和两个专科班毕业，另外还培养了两名博士生和数名硕士生。1963年春，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从该院新闻系60级在校学生中抽调5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选派各一名印地语、英语翻译，共同组成该院乌尔都语专业第一个本科班（即621班）；1965年又开了两个本科班；1964－1965年间，还培养了一个由北大转来的进修班（即622班），他们原是英语、俄语翻译在北大学了些乌尔都语后又参加中印边界之战的翻译服务工作。外文局于1965年开办了一个专科班。外交部、国际台还选送少数高中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出国学习乌尔都语。几十年来，我国通过各种途径共培养了大约一百七十八十名乌尔都语人才，他们在不同部门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交流与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的乌尔都语人才分布在外交部、文化部、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外文局（外文图书出版社、中国画报社、国际书店）、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总参、新疆地区以及一些涉外公司中。

二、以诗会友

笔者于1963年春被北京广播学院领导由新闻系601班抽调到外语系学习乌尔都语，于1966年8月毕业，1967年9月被分配到人民画报（中国画报）社，从事《中国画报》乌尔都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直至1999年该文版停刊。在从事《中国画报》乌尔都文版工作的同时，我于1979年开始用乌尔都语业余写诗。诗歌是乌尔都语文学最主要的体裁，乌尔都文学史基本上是诗歌

史，乌尔都诗歌在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印、巴的国外侨民中非常受欢迎。对乌尔都诗歌的共同喜好，使我与巴基斯坦人民及印、巴海外侨民的交流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与他们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出国访问实现的。

自1980年底至2000年秋，我曾8次出国访问。对象国主要是巴基斯坦，其次是阿联酋和卡塔尔。虽然每次出访的身份与任务不同，但与国外乌尔都文学界的交流都是历次出访活动的共同内容，以诗会友则是最主要的交流形式。

赴巴进修，如鱼得水

1980年底至1982年底，我有幸被教育部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派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家现代语言学院进修乌尔都语语言文学。与巴基斯坦其他城市一样，伊斯兰堡和与之毗邻的拉瓦尔品第也有好几家诗社，每家诗社都有十几个成员。诗社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小型诗会（即诗歌朗诵会)。这两个城市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俱乐部”，当地的作家、诗人经常在俱乐部开座谈会，对新人的新作进行评论。在巴进修期间，我正处在乌尔都诗歌创作初期。当地浓郁的诗歌氛围使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我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了不少小型诗会和文学座谈会，结识了不少文学界知名人士，渐渐地被纳入了乌尔都诗人的行列。1982年8月4日晚，我还被邀请参加了巴基斯坦政府在伊斯兰堡举办的庆祝巴独立35周年全国诗会，并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博得了听众的赞许和朋友的祝贺。

阿联酋之行

1988年3月初，我应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市的巴基斯坦文化社之邀，参加了该社为庆祝乌尔都文坛泰斗艾哈默德·纳迪姆·卡斯米72诞辰而举办的“艾哈默德·纳迪姆·卡斯米国际研讨会

暨诗会"。与会者绝大部分是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诗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在研讨会上，我宣读了题为《纳迪姆·卡斯米与中国》的论文，朗诵了题为《致纳迪姆》的诗。论文中讴歌了纳迪姆·卡斯米先生对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新中国的向往，表达了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对他的尊敬与热爱。诗歌《致纳迪姆》中歌颂了纳迪姆·卡斯米在诗歌与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赞扬了他作为文坛泰斗对乌尔都文学队伍的培育和领导作用，表达了我对他的崇敬。从那时起直至今天，他二十三年如一日给我寄赠由他主编的、当代最权威的乌尔都文学季刊《艺术》。每次寄费合 30 余元人民币，这对一位经济拮据的老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跨国界的忘年之交。

研讨会后，在阿布扎比和迪拜又举行了两场通宵达旦的诗会，我在诗会上朗诵了自己的抒情诗。我的论文和诗都被收入大会编印的专刊中。

研讨会暨诗会结束后，我应在迪拜工作的巴基斯坦朋友加米尔的盛情邀请在他家小住两日。一次，我们俩乘出租车去逛市场，司机是巴基斯坦人。由于我讲乌尔都语，又是专程前去参加乌尔都文坛泰斗纳迪姆·卡斯米国际研讨会暨诗会的，他不但死活不收我们的车费，还对我表示感谢。

会议期间，与会的朋友们赠送给我许多书，足有 40 多公斤。当时我如获至宝，但在沙加机场托运前却成了麻烦。起先我按规定托运了 24 公斤，其余近 20 公斤扛在肩上。一位印度籍机场工作人员看见我扛着一大箱书很吃力，就问我为什么不托运。我说已按规定托运了 24 公斤，再托运就超重了。那位工作人员说："你不是讲印地语吗？拿来，我帮你托运，不收钱。"（显然他把我讲的乌尔都语当成了印地语）。于是我的全部行李都免费托运了。

书展内外

1988年8月上、中旬，我以中国外文局书展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举办的中国外文图书期刊展销会的工作。

展销会期间，书展团与巴基斯坦古典书店合作举办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巴基斯坦著名文学评论家穆罕默德·萨迪基博士发表了盛赞巴中友谊的讲话，我用乌尔都语作了《乌尔都语在中国》的发言。由于座谈会的影响，这次展销会成了中国外文局在巴基斯坦举办的最成功的书展，不仅被各家媒体广泛报道，而且观众空前踊跃，连当时在野的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贝·布托也光临了书展。在卡拉奇逗留期间，除了书展的工作和应付当地媒体的采访外，我还办了3件事：第一，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了巴基斯坦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知识性节目《拍卖行》，并向观众朗诵了自己的一首乌尔都诗歌；第二，应专门录存乌尔都诗人和作家声音的一家公司的要求，朗诵了我的两首乌尔都诗，供其录音储存；第三，参加了女诗人法蒂玛·哈桑在她家举办的招待会与小型诗会。

当一回“人民使者”

1991年5月上、中旬，作为中巴建交活动之一，我应巴基斯坦新闻广播部邀请，访问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白沙瓦、拉合尔和卡拉奇4座城市以及巴控克什米尔。

在伊斯兰堡下榻以后，我访问的第一站就是克什米尔。克什米尔政府秘书长设晚宴为我接风。虽然我在克什米尔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只进行了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克什米尔是一片没有被现代工业污染的净土。整个巴控克什米尔是一条大峡谷，谷底湍急的河水川流不息，公路沿河

岸延伸，路旁是崇山峻岭，形成山河护路之势。山上处处绿树红花，谷中空气清新，沁人心脾。每到深秋，满谷的枫叶艳红如火，不是春天，胜似春天。几片白云和几群山羊在山坡上游动。两条平行的细瀑从山顶泻到山脚，像是两条闪光的银练，又像在天堂与人世之间划出的一个长长的符号。首府穆扎法拉巴德和大部分村落建立在山坡上。每到夜晚，城市与村庄灯火辉煌，从远处一看像是银河降落到山上了。在山上寒风的吹拂下，谷中的云彩不时洒下阵阵细雨，似在为饱受战乱之灾的河山而泣诉。有些青松站在山顶，在蓝天上书写着高洁；有些偏僻的山沟，几百年如一日，甘耐寂寞，默默地为国家培育着栋梁之材——又高又直的松树。从巴控克什米尔与印控克什米尔的分界线，不时传来与这块美丽宁静的土地不和谐的枪声。在从如诗如画的巴控克什米尔返回伊斯兰堡的路上，我吟成了一首题为《克什米尔游》的乌尔都语诗，回国后又写了 9 首赞美克什米尔风光的乌尔都语小诗。

次日，我在巴新闻官员的陪同下拜访了西北边境省省督，然后驱车前往白沙瓦参观了阿富汗难民营。

第三天下午，巴基斯坦文学研究院（其职能相当于中国作家协会）在伊斯兰堡假日饭店为我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由文研院（文学研究院，下同）主席吴拉姆·阿格鲁主持，巴基斯坦文化教育部长赫尔·伊玛目、外交部秘书长阿格拉姆·扎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临时代办陆树林作为特邀贵宾出席了招待会，并发表了赞扬中巴友谊的讲话。伊斯兰堡和拉瓦尔品第的 200 余位作家、诗人出席了报告会。我在会上致辞，感谢巴基斯坦政府的盛情邀请和接待，并朗诵了新诗《克什米尔游》，博得了与会者的喝彩。巴外交部秘书长扎基称我是“人民使者”。年逾古稀的著名诗人扎米尔·贾弗里代表巴文学界发言，对我表示欢迎，并朗诵了一联赞扬我的诗，其中巧妙地拆解了我的名字。这联诗

的大意是：

一联诗就是一团烈火
这样的选择世界无双

招待会上，巴文研究院主席阿格鲁向我赠送了派克金笔，希望我用它多写些讴歌中巴友谊的诗篇；同时把一块红色披单披在我的肩上，以示热烈欢迎。几天后，当我结束了对拉合尔和卡拉奇的访问回到伊斯兰堡以后，阿格鲁先生又以讨论诗歌文学问题为借口，在一位部长和两位著名诗人的陪同下，在一家中国餐馆与我共进晚餐。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历史名城和文化中心。这里文人荟萃，贤达麇集，文化气氛比巴基斯坦其他城市更浓郁。拉合尔人民以性格开朗、热情好客著称。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巴基斯坦其他城市的人民相比，拉合尔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显得更深。当外交部秘书长扎基通知拉合尔的著名作家阿达·卡斯米到机场迎接我时，他说他要用肩膀把我扛到宾馆。

在拉合尔参观访问之后，我出席了当地文学界与新闻界为我举办的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朗诵了新诗《克什米尔游》，一首哲理诗和一首抒情诗，受到与会者的好评。招待会主席、著名老作家阿什法克·艾哈默德说："……一个外国人对乌尔都古典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和对我们民族文明的观察怎能如此之浓……我读过许多外国人的乌尔都语文章，也听过他们的乌尔都语诗歌，但从未发现像世选诗歌中这样深邃的思想与哲理；还有这一席美好的讲话，这驾驭语言的能力……啊，世选，你是个什么样的精灵？我不知道该怎样夸你……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女中学生，我就把一个崭新的签名本递给你，并对你说：'请签名，这个签名本上只会有你一个人的名字'。"

招待会上始终洋溢着中巴友谊的热烈气氛。

会后，著名诗人阿姆佳德·斯拉姆、阿达·卡斯米和哈桑·拉兹维在一家中国餐馆与我共进晚餐。席间，我们听着中国与巴基斯坦乐曲，畅谈中巴友谊与乌尔都诗歌，直至深夜。

卡拉奇是巴基斯坦政府给我安排的参观访问的最后一站。在卡拉奇，我在当地一位新闻官员的陪同下拜谒了巴基斯坦国父真纳陵。高大、宏伟、肃穆的花岗岩陵由巴基斯坦士兵昼夜守护。陵内天花板上悬挂着周恩来总理赠送的玻璃吊灯。诗人尼卡什·卡兹米开着车拉着我去海滨看大海。巴基斯坦乌尔都语发展协会为我举行了招待会，之后又举行了小型诗会，宾主以诗会友共叙友情。

巴基斯坦官方安排的活动结束后，我应诗人作家阿达·卡斯米的邀请，重返拉合尔，与拉合尔的诗人们一起参加了木尔坦、费萨拉巴德、米安佳努等城市和旁遮普大学举行的国际诗会。这4场诗会在10天内举行，每场诗会上都有五六十位诗人朗诵自己的诗作，听众从5000人到2万人不等。这种大型诗会一般都以晚九十点开始，次日凌晨四五点结束。4场大型诗会之间的闲暇中，我与一位印度女诗人和侨居英国的两位巴基斯坦诗人住在阿达·卡斯米家里，每天到一两家赴宴，而每次家宴前一定有小型诗会。

亲切的抱怨

1993年9月上旬，我应邀参加了巴基斯坦卡拉奇精英学院举办的世界乌尔都语大会和第五届国际乌尔都语诗会。卡拉奇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最大的港口和商业中心，也是最大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这里还是巴基斯坦1947年至1959年的首都。

世界乌尔都语大会进行了5天，来自20多个国家的五六十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就乌尔都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交流

了信息，成立了“世界乌尔都语发展组织”。在这次会上，我向与会者介绍了乌尔都语在中国的使用情况。会议期间，主办单位还组织与会者参观了卡拉奇的几所学校和信德省的一处文物古迹。信德省省督赛义德接见并宴请了与会代表。我向他赠送了两期乌尔都文版《中国画报》，他饶有兴趣地翻阅着画报与我合影留念。我白天参加会议，晚上与卡拉奇的一些诗人一道去参加家庭晚宴。与拉合尔一样，晚宴之前必是小型诗会。

国际诗会在一个露天广场举行。与会诗人约50位，主要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听众近两万人。诗会照例于晚10时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5时。诗人们坐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听众坐在台前。中小学生不时把自己的笔记本递到台上，请诗人们签名并写上自己的两联诗。台子的两侧与后面站着许多这样的孩子，诗人们想下台入厕，必须“过五关、斩六将”。

精英学院的国际诗会之后，我又应邀参加了两个文学组织举办的诗会，诗人几乎是原班人马。

离开卡拉奇之后，我在伊斯兰堡逗留了两天。第一天下午我出席了文研院主席伊福蒂哈尔·阿里夫和巴中友协主席扎法尔·布赫塔瓦利联合举办的招待会，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临时代办也应邀出席，宾主都发表了盛赞中巴友谊的讲话，我朗诵了两首诗。第二天晚上，著名诗人何富达布·夏米姆在自己家举办了小型诗会。除当地十几位诗人外，正在伊斯兰堡办事的拉合尔女诗人艾哈默德·敏苏拉也出席了诗会。敏苏拉是纳迪姆·卡斯米的女儿。她看见我就抱怨：“爸爸知道你来巴基斯坦了，去了卡拉奇，又来到了伊斯兰堡，就是没去拉合尔。爸爸对你很有意见。”我觉得她的批评比表扬还亲切，字字句句充满了纳迪姆·卡斯米先生对我的厚爱，于是忙解释说：“这次实在是时间不够了，下次来巴基斯坦后，一定先去拉合尔拜访您和卡斯米先生。”

出席作家与知识分子国际会议

1995年12月初，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作家与知识分子国际会议。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长篇演说。来自世界各国的500名代表和巴基斯坦的2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代表团由12人组成，其中9人讲英语，3人讲乌尔都语，团长是黄宗江老先生。来自新疆的作家朱定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我向大会递交了题为《文学与民主》的论文。大会期间，主办单位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德克西腊博物馆、古代佛教文化遗址、费萨尔清真寺和甘布尔水库。各部部长和各省省督轮番宴请大家。12月4日，会议闭幕的当晚，莱加里总统在总统府设宴招待各国代表。总统与我亲切握手，并对我说："收到了今年第二期《中国画报》，文章与照片都很好，谢谢，欢迎再来巴基斯坦。"1994年12月初莱加里总统访问了中国，并于12月4日晚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受了我的采访。那篇稿件刊登在《中国画报》乌尔都文版1995年第二期上。两个12月4日晚上，一位贤明的巴基斯坦总统与一个中国平民两次晤面握手，真是一种美丽的巧合！

会议期间，因为几乎每天都有媒体采访我，所以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关于我的报道。有一天中国代表团的团长黄宗江老先生对我说："张世选，我看巴基斯坦报纸上除了贝·布托就数你的照片多了。"

会上会下，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其中包括文学季刊《艺术》的主编、德高望重的诗人纳迪姆·卡斯米先生。我把悼念半年前因车祸去世的巴基斯坦著名女诗人帕尔雯·夏吉尔的一首诗交给了他。不久这首诗就在《艺术》上刊登出来了。帕尔雯生前对中国非常友好，曾于1987年访华，并把她当时已问世的3本诗集赠送给我。她的去世不仅使巴基斯坦文学界悲痛不已，也使我长

时间不胜哀痛。于是，我写了上述悼念诗，聊以怀念死者，并抚慰自己、死者遗属和巴基斯坦文坛友人。

“张世选是我们的诗人”

1998年11月下旬，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巴基斯坦。我们下榻的拉瓦尔品第珍珠大陆饭店的左侧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标语，上面用中文写着：“张世选是我们的诗人，巴中友谊万岁！”

这年10月，巴基斯坦文研院出版了我的乌尔都文诗集《痴情集》，其中近四分之一的诗篇与巴基斯坦有关。在中国代表团访巴期间，巴文研院在伊斯兰堡为此书举办了盛大的首发式。时任文研院主席的专栏作家纳齐尔·纳吉主持了仪式，中国代表团和当地作家、诗人和新闻记者出席。宾主共颂中巴友谊，学者们对《痴情集》发表了热情的评论。时任巴文研院秘书长的萨利姆·基雅尼说：“世选是一座架在中巴友谊的丝绸之路上的桥梁。……这本诗集将被证明为巴中友谊长征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著名诗人阿富达布·夏米姆说：“……一个中国人用诗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对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人民无条件的爱是《痴情集》的主流。”著名诗人陶希夫·达巴素姆说：“这本诗集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难得的佳品，……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痴情集》是这一友谊崭新而独特的例证。”

中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文研院秘书长萨利姆·基雅尼陪同下，参观访问了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信德省省会卡拉奇、西北边境省省会白沙瓦和卑路支省省会奎达，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政府与文学界超规格的热情接待。各省省督或首席部长分别设宴款待我们，各地文学界为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代表团热每到一处都与当地文学界座谈，就文学上的一

些问题交换意见。每次座谈会上均有巴方诗人朗诵诗歌，而我也被邀请朗诵自己的诗作，有时还代替英文翻译说几句。代表团成员、陕西作协副主席杨韦昕回国后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用乌尔都语写作的中国诗人》的文章，其中写道：

……在文化界的多次座谈会上，学术性很强的问题常由老张（张世选）翻译，或者由他直接答复。……使座谈会进入高潮的是，老张总被邀请朗诵他的乌尔都语诗作。巴基斯坦听众不时发出哇哇的呼叫……后来听说这是很赞赏、很喜欢的表示。

20天讲了半年的话

2000年9月底至10月初，我应多哈（卡塔尔首都）和迪拜（阿联酋城市）的乌尔都文学促进会的邀请，参加了这两个城市的国际乌尔都文学节。文学节在这两个城市各进行5天，这期间举行了多场诗会。依惯例，每届文学节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一位作家或诗人的名义举行，向印度和巴基斯坦各一位作家或诗人颁发促进乌尔都文学发展世界奖，向一位身居印度与巴基斯坦以外的乌尔都作家或诗人（基本上是印、巴侨民）颁发萨利姆·贾弗里国际文学奖。本届文学节的萨利姆·贾弗里奖授予了笔者。在多哈我还应当地一所巴基斯坦学校的邀请，向师生们作了题为《乌尔都语在中国的报告》。

文学节结束后，在从迪拜回国途中，我应与会巴基斯坦朋友的邀请，又一次访问了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著名记者阿法兹·拉赫曼、伊斯兰堡的著名诗人阿富达布·夏米姆和拉合尔的作家阿达·卡斯米向我提供了住宿方便。在卡拉奇我出席了著名诗人、专栏作家、中国的老朋友贾米鲁丁·阿里的专栏文集《忠诚》的首发式，并发表了题为《阿里先生与中国》的讲话，又出席了巴

基斯坦文研院卡拉奇分院和乌尔都语发展协会分别举办的座谈会。在拉合尔拜会了乌尔都文坛泰斗纳第姆·卡斯米先生，参加了作家阿达·卡斯米举办的招待会和诗人A·G·觉士先生的家宴。在伊斯兰堡参加了诗人阿富达布·夏米姆举办的招待会与小型诗会。在这次诗会上，诗人马吉德·萨迪基朗诵的不是他自己的诗作，而是他从我的诗集中选出的一些“佳联”。

由于说话过多，离开巴基斯坦的时候我的嗓子严重失音。我估计，我在这次出国的20天中说的话，比平时半年说的还要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93年3月，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哈立德·默哈穆德代表巴基斯坦政府把一枚“巴基斯坦勋章”佩戴在我的胸前，以表彰我为促进中巴友谊所尽的绵薄之力。

在与巴基斯坦和中东乌尔都文学界及其他人士的交流中，我常常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也感受到他们对我个人的真情挚爱。我觉得，与他们交流像是在友谊的海洋中畅游。我之所以能在这个海洋中畅游，主要得益于我的乌尔都语。

三、结束语

语言是构通思想与交流感情最有效、最常用的工具。一般地说，不同国家流行不同的语言。因此，不同国家的人民在交往时必须借助于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可能是世界流行的通用语，也可能是被交往的一方掌握了另一方的国语或地区性的语言，即非通用语。通用语是少数发达国家的母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族语言即母语都是非通用语。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以通用语为官方语言，但通用语却不可能完全取代这些国家的民族语言。正因为如此，虽然巴基斯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但诗人与作家们却用乌尔都语及其他地方语言进行创作。

民族语言——其中大多数是非通用语，是各民族历史和文化

的载体。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民族语言，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不可能深刻了解其宗教、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如果我不懂乌尔都语，我就不可能了解巴基斯坦的历史、文化、诗歌、文学、宗教和哲学。

一个国家的民族语言不仅是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的重要象征。人们都称自己的祖国为母亲，称祖国的语言为母语。各国人民对自己的民族语言都有一种特殊感情。使用一个国家的民族语言与该国人民交流，不仅是尊重他们的语言，而且是尊重他们的国家和文化，这样会使他们感到亲切，把你当自己人。巴基斯坦人民和中东的印、巴侨民之所以对我情有独钟，除了中巴友谊以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友谊的背景外，与我讲乌尔都语、写乌尔都语诗歌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世界国家是我国的老朋友。他们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斗争中，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一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要发展经济、扩大外贸，也离不开他们。为了增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扩大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合作，必须重视他们的民族语言的教学和在对外传播及交流中的作用。

（作者单位：人民画报社）

中国的僧伽罗语广播对斯里兰卡的影响

张绪华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僧伽罗语广播，开办于1975年1月1日，它的对象国家是斯里兰卡。播出时间：北京时间每天晚上10点至10点30分，科伦坡时间晚上8点至8点30分。以短波25．21米和19.81米及中波252.53米每天向斯里兰卡全境播出半小时节目，随即重播一次。我台僧语广播开播已经26年了。26年来，它已成为斯里兰卡人民了解中国、增进两国友谊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僧伽罗语广播的对象国概况及奉行的政策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也是印度洋东西航运的必经之地。原属英国殖民地，1948年独立后，为英联邦成员国。总面积6.561万平方公里，人口1 900万。斯里兰卡是个多民族国家，僧伽罗族是主体民族，人口14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4%，其他主要有泰米尔族和摩尔族。居民中信佛教的占67%（主要是僧伽罗族），信印度教的占17%（主要是泰米尔族）。佛教是斯里兰卡的国教；国家法定官方语言为僧伽罗语和英语。僧伽罗族在斯里兰卡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居主导地位，僧伽罗族人讲僧伽罗语。

斯里兰卡奉行独立和不结盟外交政策，反对新老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重视发展同美国、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发展与印度及东南亚邻国的关系。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外资，争取外援，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倡议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以促进亚洲经济的发展。

斯里兰卡与我国关系十分友好，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1月7日)。自古以来，两国人民之间就有着传统的友谊，特别是佛教界的交往甚密，我国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佛教与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同出一源。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斯里兰卡冲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同中国签订了第一个用橡胶交换大米的贸易协定。1957年2月7日中斯正式建交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友谊。在台湾问题上，一贯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在西藏问题上，认为“西藏问题确实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斯里兰卡积极参与了提案国的行列。特别是近些年来，斯里兰卡积极主动同我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与我看法一致。

二、僧伽罗语广播的宗旨和任务、节目设置及特点

僧伽罗语广播的宗旨和任务

根据斯里兰卡的实际情况和我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开办了僧伽罗语广播。全面、正确、生动地向斯里兰卡人民宣传中国，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巩固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台僧伽罗语广播的宗旨和主要任务。26年来，我台僧伽罗语广播在斯里兰卡人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6年来，本台僧语广播不断加强对我国国内情况的宣传，充分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着重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给各个方面带来的变化；宣传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新风尚；介绍我国的历史文化、地理风光、文学艺术、名胜古迹、传统习俗等基本知识；全面宣传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特别是报道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平等；介绍我国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等等，使广大听众及时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兴旺发达的新气象。

在国际问题上，大力宣传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宣传中国是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报道我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系统阐明我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和贫富应一律平等以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发展友好关系的立场；突出宣传我国支持斯里兰卡提出的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建议，支持不结盟运动、南南合作和南亚区域合作的立场和观点；充分报道中斯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

僧伽罗语广播的节目设置及特点

僧伽罗语广播主要由新闻节目、时事报道和专题节目三大部分组成。在一般情况下，时事报道占5分钟左右。新闻节目分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二者占8至10分钟；专题节目内容广泛，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占12分钟左右。

为了把僧语广播办得更具有自己的特色，吸引更多的听众，我们根据对象国家的具体实际和听众的要求，除加强新闻实效，以及国际评论配合重大国际新闻播出外，还开办了一些听众喜爱的专题节目。先后开办的专题节目有：《在人民公社里》（后改为《乡村生活》）、《中国建设》、《中国文化》、《中国民间故事》、《听众信箱》、《音乐节目》、《星期日音乐会》、《体育爱好者》、《妇女

之窗》、《中国烹调》、《中国见闻》、《您知道吗?》、《成长的一代》、《社会与生活》、《中国戏剧故事》、《北京城的传说》、《新人新事》、《中国少数民族》、《中国风光》、《教中国话》和《周末之夜》等24个挂牌专题节目。

多年来，僧伽罗语广播部在改进业务管理、丰富节目内容、加强节目的针对性和提高广播质量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和尝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加强节目的针对性，许多节目完全由我们自己编写。实践证明，凡是比较受听众欢迎的节目，大都是自编的。因为播出的稿子针对听众之所好所求，做到了有的放矢。

《周末之夜》是僧伽罗语部1994年为迎接开播20周年推出的系列板块节目。它是僧伽罗语广播26年来，在听众中引起轰动最大的节目。

《周末之夜》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身，包括《寓言》、《歌曲欣赏》、《开心一刻》(介绍中国笑话)、《八面来风》(介绍中国各地珍闻趣事)、《中国风光》、《智慧园》、《动物世界》、《青年一代》、《讽刺与幽默》、《格言精粹》、《百科知识》和《艺海拾零》等栏目。该节目每次半小时，包括五六个小栏目，中间以间奏乐隔开，形成一个板块，每次都要播出一首听众点播的歌曲。

《周末之夜》采取两人问答式、对话式和讨论式，而不是由一人一播到底。尽管每次节目长达半小时，但让听众听得轻松愉快，一口气听到底，舍不得离开收音机。甚至还有听众边听边认真做记录。它已经成为听众“我要听”的节目。许多听众来信要求延长该节目播出时间，增加播出次数。

我台僧伽罗语广播，除准确及时地报道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活动外，对中斯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及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也都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宣传报道。

根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斯里兰卡广播公司1986年签订的双边协定，自1987年初至1990年5月，僧伽罗语部共向斯里兰

卡广播公司寄送60套半小时广播节目，含专稿、录音报道和专题音乐等近200篇（首）。后来因对象国家广播公司主要领导易人等原因而中断了我广播节目的寄送工作。

三、僧伽罗语广播对斯里兰卡的影响

我台僧伽罗语广播，以自己的特色赢得了听众的信任，特别是1978年以来，由于加强了节目的针对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增强了节目的活力，收听我台广播的听众越来越多。

听众和听众来信大幅度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斯里兰卡听众要求了解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加之斯里兰卡电视和报纸对中国的报道较少，而我台僧伽罗语广播成为斯人民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斯里兰卡是我台听众分布最小的几个国家之一，然而却又是我台听众最多和听众来信最多的几个国家之一。在1975年1月至2000年12月的26年里，僧伽罗语部共收到听众来信616821封，平均每年收到23723封。

目前，僧伽罗语广播部有立档听众10000多人，未立档听众人数更多。据1977年对听众进行的书面调查，听众主要成分为中小学生，约占听众总数的60%左右，其次为社会青年。听众遍布社会各阶层，有政府官员、机关职员、新闻工作者、军警人员、学校教师、家庭主妇及僧侣等。1987年进行的第二次听众调查表明，听众成分已发生变化。20岁以上听众显著增加，约占半数。除僧伽罗人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泰米尔人和穆斯林收听我僧伽罗语广播。

2000年下半年，我们对斯里兰卡听众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

的问卷调查，也是第三次听众调查。本次问卷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听众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听广播次数、收听效果、使用频率、喜欢的栏目、喜欢的播音员以及对我广播节目的意见和建议等。广大听众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参加这次调查，及时寄回了问卷。

此次听众调查的结果表明，斯里兰卡听众收听本台僧语节目是十分认真的，听众主要由大、中、小学生，教师、学者、公司职员、农民、僧侣、政府官员及商人等构成，学生和老师为主体；听众多数为中学文化程度，兼有少数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听众年龄差异较大，绝大多数是正在学校念书，尚未走上社会的大、中学生，以 18 岁以下及 19 至 36 岁者居多，女听众多于男听众。在我们的听众队伍中，既有从 1975 年 1 月 1 日本台僧伽罗语节目开播之日起坚持收听至今的老听众，也有从 2000 年下半年才开始收听的新听众，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年长的近 70 岁。调查结果表明，本台僧语广播的所有专题栏目均在听众喜欢之列，只是喜欢的程度不同而已。《听众信箱》、《社会与生活》、《中国文化》、《中国见闻》、《音乐节目》、《中国经济》、《中国少数民族》、《教中国话》和《周末之夜》等栏目最受听众喜爱，也有不少听众表示喜欢《时事报道》及新闻节目等。总之，绝大部分听众对本台僧语广播节目是比较满意的，对目前节目的总体设置也是认可的。

通过多年的努力，广大斯里兰卡听众对中国的了解正在不断加深。例如 1986 年 4 月本台举办的《我与和平》征文活动，得到了斯里兰卡广大听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到当年 10 月底，共收到应征作品 900 多件，其中包括短篇小说、散文、文章、诗歌、绘画及摄影照片等。听众拜西尔·费尔南多寄来长达 21 页的征文，详尽阐述了战争的危害、和平的宝贵，以及怎样保卫和平和自己应起的作用等等。一位 6 岁儿童也寄来一张自己画的画。

斯里兰卡应征者寄来的画中，有6幅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瞭望》杂志登载。那些应征作品除表达了作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愿望外，还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许多听众称赞中国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做法，认为中国是保卫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1988年1至7月，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北京市旅游局以《我心目中的中国》为题联合举办的征文活动中，共收到六大洲87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投稿13000余篇，其中斯里兰卡僧伽罗语听众投稿1500余篇，占所有来稿国家的第二位。

在本台历年举办的知识竞赛活动中，僧伽罗语部都收到了斯里兰卡听众寄来的大量参赛答卷，其中不乏质量很高的答卷。26年来，听众中的许多人一直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并同我们保持经常性通信联系。26年过去了，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已经从10来岁或10多岁的中、小学生，成长为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他们是我们听众队伍的骨干和中坚。

苏密特·魏拉孔是斯里兰卡中北部古城阿努拉特普拉的一名残疾青年，因患小儿麻痹造成下肢瘫痪，行动十分不便，但他对收听我们的广播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他自己说，收听中国电台广播并不完全是为了排遣孤独和寂寞，而是因为他热爱新中国，希望从中国的广播中获得知识、力量和勇气。正是这种原因，才使他始终如一地收听我僧伽罗语广播节目，除因技术或天气原因收听不到之外，从不间断。尽管他自己丧失劳动能力，要依靠家人养活，但他仍不惜付出很多邮资，经常给我们来信，谈他收听我广播后的感想及对节目的评价、意见和建议。我台举办《我与和平》征文活动时，魏拉孔寄来了一篇文章，14开的稿纸写了近20页，可谓洋洋万言。不仅字迹清晰、工整，而且还配了十几幅与内容相关的插图。他的文章获得了一等奖。

家住斯里兰卡中部古都康堤市郊的阿卢纳·哈普阿拉吉先生，

系本台斯里兰卡听众协会康堤分会主席。从 1975 年起，他一直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并同我们保持经常性的通信联系。特别是每周日的《听众信箱》节目，他一次不落地坚持收听，如果星期日因故不在家，他就让妻子替他把当天的该节目录下来，以便他补听。他们夫妇都是我们的忠实老听众，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地参加我们举办的知识竞赛和征文活动，而且每次都双双获一、二等奖。我台僧伽罗语广播工作人员曾于 1990 年到他们家访问过。在他们家里，从四周的墙上到大大小小的礼品柜里，到处挂着和摆放着我台历年制作的台旗、台标和台徽以及他们历次参加本台知识竞赛而获得的奖品和证书，真像一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小博物馆。他们深情地说：他们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友谊是刻骨铭心的，并表示将通过他们的孩子把这种友谊世世代代传下去。

像魏拉孔和哈普阿拉吉这样热情友好的听众在斯里兰卡还有很多。

各种听众团体应运而生

1986 年，在斯里兰卡北中央省的丹布拉地区正式成立了一家“中国国际电台听众俱乐部”。1987 年 3 月，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协会”在首都科伦坡宣告成立。此后，该听众协会分会相继在全国各地成立，这些听众协会为宣传斯中友好，向斯里兰卡听众介绍改革开放的中国和发展中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在听众中举办了有关中国的知识竞赛、诗歌和作文比赛，不断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本台的知名度，开创了本台斯里兰卡听众工作的新局面。自 1988 年至 1990 年，听众协会积极配合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文化处，先后在首都科伦坡和高尔等几个主要城市举办了 5 次中国手工艺品、艺术品以及中国图书展览，并借机大力宣传中国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92 年，在我台建台 43 周年之际，斯听协用僧伽罗文专门

出版了一本16开32页的纪念册，图文并茂，以丰富的内容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及斯里兰卡有关方面负责人关心和重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情景，该纪念册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邮资一涨再涨。为了减轻听众的邮资负担，自1993年下半年起，斯里兰卡听众协会在科伦坡开设了听众信箱，把大量的听众来信和本台举办的知识竞赛参赛答卷转寄给我们，大大促进了听众与我们的联系。

多年来，斯里兰卡听众协会还不断在斯里兰卡一些主要报刊上刊登广告和文章，介绍我台的僧语广播节目和我台举办的有关知识竞赛活动，对广大听众，特别是对收听效果不太好的偏远山区的一些听众，帮助很大。

斯里兰卡听众协会及其分会的许多负责人还经常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深入到一些新听众家中，手把手地帮助和指导他们在收音机上寻找我台节目播出波段的位置，大大方便了许多新听众的收听活动。另外，部分听协及其分会负责人，还在我台举办知识竞赛活动期间，长途跋涉，并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到一些学校，向学生们分发知识竞赛问卷，然后再收集答卷并直接邮寄给我们。

斯里兰卡听众心目中的中国僧语广播

在1995年1月1日本台僧伽罗语广播开播20周年纪念日前后，广大斯里兰卡听众纷纷寄来热情洋溢的贺信、贺诗，高度评价本节目，并表示热烈祝贺。

黑地阿拉吉在来信中说："你们在自己国家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用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以一种高度献身的精神开办的僧伽罗语广播，也是中国对斯里兰卡国家和人民深情厚谊的象征。"

比利斯在来信中说："20年来，通过收听贵台广播，我获得

了数不清的知识。从前，我是从另外的一种想像来看待中国的，因为那时我对中国知之甚少。而现在，我完全可以像一个亲自到中国去旅游过的人那样谈起中国的情况。可以说，通过你们的广播，我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文化及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可观的了解。”

达·塔玛拉特纳在来信中说：“1975年1月1日诞生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僧伽罗语广播，现在已经成为一位年满20周岁的健壮青年。20年来，僧语广播为与听众建立密切联系而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因此，我已习惯于每天收听你们的广播。如今，它已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

20年来，一直坚持收听僧语节目并与我们保持联系的老听众拜西尔·费尔南多先生在贺信中说：“中国为斯里兰卡的发展事业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我把贵台的僧语广播视为中国给予斯里兰卡的最珍贵礼物，20年我一直在你们广播节目的身旁。在我有生之年，我不会离开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成了我们全家的亲密朋友。夜幕降临以后，我们都非常高兴地欢迎每天都光临的这位亲密朋友。”

达亚南德·贾亚维克拉玛来信说：“贵台僧语广播在近几年里变得更有活力了，她使听众有了新感觉，我现在更喜欢收听你们的节目了。”

拉萨尔·费尔南多先生写诗赞道：

贵台广播浩如海洋，
无线电波把信息传四方，
僧语广播二十年，
赢得听众衷心的赞扬。
我们手捧盛开的鲜花，
祝愿贵台未来更辉煌。

一位听众在来信中说，他从小就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坚持十几年了，他掌握的中国知识中，80%是从广播中得到的，电台已经成了他不愿离开的好朋友。

《周末之夜》自1994年1月8日开播后的两年间，僧语广播部共收到4500多封热情评价该节目的听众来信。

听众苏吉特·德席尔瓦先生1994年1月8日来信说："今天我之所以一听完《周末之夜》节目的开播篇就提笔给你们写信，就是要表达我无限激动和喜悦的心情，该节目实在太适合我们斯里兰卡人的口味了。"

听众阿南德·钱德拉西里在来信中说："每个周末播出的《周末之夜》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该节目中的'艺术殿堂'、'讽刺与幽默'和'格言精粹'等一系列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身的栏目实在太精彩了，它不愧为一个高水平制作的精美节目。为了让听众能够轻松愉快地听懂并充分理解，节目主持人使用最为简练的语言和轻松的风格精心制作，深得听众赞誉。"

听众维马尔·阿里亚赛纳来信说："从《周末之夜》节目开播之日起，我就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收听，它伴随我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周末。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该节目是你们20年来奉献给听众的最好节目。"

布卢杜外勒听众俱乐部主席达亚帕勒·阿迪卡利先生来信称赞说："趣味横生的《周末之夜》给人以知识、快乐和美的享受。它不愧为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一本内容丰富的广播杂志，一个诲人不倦的导师之家和一块百花盛开的艺术园地。"他说他每次都把《周末之夜》节目录下来，然后反复听，并把最重要的内容摘抄在自己精心制作的特别笔记本上。每个周末的黄昏，他总是及早做好一切准备，期待着《周末之夜》的来临。

僧伽罗语寄送节目在斯里兰卡广播界和广大听众中引起很大

反响。斯里兰卡国家广播公司原总经理K·魏拉曼先生1988年11月对赴斯访问的我台听众考察组说："贵台的寄送节目质量很高，听众反响很大，尤其是有关中国青年问题的报道，在我国青少年中有很大影响。因为我们两国的青年一代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你们的广播可以给斯里兰卡青少年以启示并树立榜样。所以，我们除在固定时间播出你们的寄送节目外，还将其中一些节目安排在我台其他有关专题中播出。"许多听众来信表示从寄送节目中了解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情况。

一位佛教徒来信说："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斯里兰卡佛教徒，很喜欢收听你们的节目。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斯里兰卡人民对中国充满了尊敬和爱戴。能听到从你们那里传来的声音，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一位新听众最近在来信中说："我是最近才开始收听你们播出的僧伽罗语广播节目的，通过收听你们的节目，我学到了很多有益的知识。由于世界信息工业的迅猛发展，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尤其是作为亚洲人，生活在斯里兰卡的我们对于了解亚洲强国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的愿望。"

四、僧伽罗语等小语种广播前景堪忧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僧伽罗语广播在斯里兰卡开创了大好局面，赢得了对象国广大听众的认可、信任和爱戴，它已深深扎根于对象国国民的心中。这些都是继续办好广播的有利因素，或者说是我们的机遇。然而，除了机遇，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专业人员大量流失，严重缺编，后继乏人，使僧伽罗语广播部陷入其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

僧伽罗语广播每天向斯里兰卡播出一个小时节目（后半小时为重播），每周设有8个固定的专栏节目，每月还有2 000多封

听众来信需要及时处理。根据工作量起码应该有 12 个在编人员，然而目前仅有 4 人，且其中 3 人都已临近退休。他们一直坚持超负荷工作，生病不能休息，就连法定休息日也无法得到安排。

1968 年以来，有 23 位相关专业人员先后在僧伽罗语部工作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之所以离开，原因很多，工作条件较差，工作任务很重，工资待遇较低可能是其中几个重要原因。

在国际台，英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通用语言广播部门，可以直接采用或稍加修改后采用新华社的外文电讯稿，而小语种广播部门都没有这种便利，对外广播的全部内容都要翻译，因此工作量就大得多。加之小语种工具书相对短缺，一般都没有汉语－对象国语言词典和对象国语言－汉语词典，每查找一个词语，往往需要翻阅两种词典，即汉语－英语词典和英语－对象国语词典。

工资待遇较低可能是小语种专业人才外流的突出原因之一。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初到国际台时的月收入仅有1 000元左右，而如果他们的英语水平不错，应聘到某个外企单位，每月可能会有高出几倍的收入。所以，国际台要留住人才，必须下大决心，多管齐下，其中之一便是加大投人，对小语种专业人员实行倾斜政策。

在国际台，由于专业人员大量外流造成严重缺编乃至正常广播都受到影响的并不止僧伽罗语部一个部门，如菲律宾语部由于人才流失，严重缺编，不得不减少新闻节目的播出量，增加音乐节目播出时间。

一些小语种广播面临严峻挑战，稳定小语种专业人才队伍，迫在眉睫。据了解，前苏联曾经出台过十分优惠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奖励一些人及一些家庭世袭学习小语种。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们热切地希望我国的决策机关采取突破性重大举措以稳定小语种专业人员队伍，加强我国多语种的对外广播。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马来语与中国

李士君

语言是人类社会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一种特有的工具。在人类社会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以便相互之间能够进行正常的思想交流和各种社会活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语言也在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在当代，随着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国际间的经济、文化等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语言已成为人类社会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对外友好交往活动十分频繁，广泛学习和运用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的语言文字，显得十分紧迫。在大力提倡和普遍推广通用语——英语的同时，中国也十分重视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使用，在全国各外语院校开设了数十种非通用语专业，为国家培养了许多非通用语人才，马来语就是其中之一。

马来语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以及泰国和菲律宾南部地区作为媒介语使用的一种语言。在马来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先后独立后，马来语即被定为本国的国语，并写入宪法。据资料显示，目前，在东南亚地区操马来语的人数已达近 2.5 亿人左右。

马来语隶属于“奥斯特洛尼西亚”语系中的“马来群岛”(Nusantara) 语族。马来语的历史比较悠久，但马来语究竟起源于哪个年代，至今尚缺乏历史考证。据马来西亚有关书籍记载，

最早操马来语的人群是来自“奥斯特洛尼西亚”的人类群体，他们可能起源于中国云南地区，然后南下，经过人类社会世代变迁，最后定居在东南亚一带。据称，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

据有关史料显示，公元一世纪时，马来语就在马来半岛及其周围地区、印尼的廖内群岛和苏门答腊一带作为当时的媒介语广泛使用，包括居住在当地的土著人，以及来自欧洲、西亚地区和中国、印度等国的移民者。历史上，马来语曾经受到过印度文化、宗教的影响和渗透，马来语的语言文字曾发生了不少演变，许多梵文（印度古文）词汇也渗入到马来语中，成为马来语词汇。16世纪以后，马来亚（现称马来西亚）曾先后受到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占领和统治，马来语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尤其是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大量的英语词汇被吸收到马来语中，并成为马来语日常用语。据史书记载，“马来语”一词本身的出现还是起源于中国的唐代。大约在公元645年前后，当时统治马来半岛的“诗里维贾亚”（即“室利佛逝”，Seriwijaya）王朝曾派团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中国唐朝接待了该使者团，并称这些来自东南亚一带的人为“马来人”(Orang Mo－lo－yeu)。

一、马来语在中国的使用和传播

与有些非通用语种相比，马来语在中国使用和传播的历史并不算长。20世纪50年代末，根据中央指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时称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工作之后，于1959年3月1日正式开办了马来语广播，每天播音2次，每次半个小时，播出对象主要是马来西亚及其周边地区，如新加坡、文莱、印尼，以及泰国和菲律宾南部等地区。自那时起，中

国就有了鲜为人知的马来语。国际电台马来语开播初期，由于国内尚未培养出自己的马来语人才，只好聘请国外友好人士参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马来语广播的改稿和播音工作。翻译工作则由原在印尼语部工作的归侨同志来协助完成（印尼语与马来语同属于一种语族，比较相近，可以进行相互交流）。

马来语广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对外开设的38种外语广播中，是开办比较早的一种语言，也是目前我国马来语人才最集中、使用马来语机会最多、时间最长的部门。至今，马来语广播已整整度过了44个春秋，经历了无数次疾风暴雨，在对外广播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马来语的开办及其发展，不仅倾注了我国马来语界几代同行们的心血，同时也渗透着曾经长期为中国马来语广播事业而辛勤操劳过的几位国际友人的汗水。

40多年来，国际台马来语广播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工作人员不断增加，业务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马来语广播每天播音2次，每次1小时。每天对外播出量达6 000字左右，播出内容包括新闻、时事、国际评论、国内各类专稿（包括工业、农业、科技、旅游、文化、社会生活、生活百科、听众之窗等内容）、汉语讲座，以及音乐节目等。目前，国际台马来语部的工作人员始终保持在十几位，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来语专业。经过多年来勤奋努力和工作实践，他们不仅在对外广播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宣传经验，同时马来语的翻译和播音水平也得到了迅速提高，其中多位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已达到了教授和副教授级的水平。可以说，目前国际电台马来语的翻译和播音水平，尤其是中翻外水平，在国内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近年来，新加入到这支广播队伍中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刻苦勤奋、踏实工作、更具活力、敢于创新，大胆地施展自己的才干，他们在为马来语广播事业辛勤地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

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周恩来总理

曾指示国内各外语院校开办亚非拉地区的非通用语种。从1961年起，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先后开办了包括马来语、阿拉伯语、缅甸语、僧伽罗语、老挝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地区的近20种非通用语种。这些语种的开办，为我国培养了几代非通用语人才，他们在我国对外交流活动中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其中有的已成为我国该语种的专家、教授或者是国内权威。

马来语是1962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第一次开办的一项新的外语专业，现在在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也开这个专业。第一届马来语专业的学生都是从本校英语系二年级学生中抽调出来改行学习马来语的。由于他们有两年的英文基础，对马来语学习非常有利。自那时起，北京外国语学院马来语专业每隔几年就从高中毕业生中招一个班，每届学生人数都保持在15到20人左右。到目前为止，该校已为我国培养了近200名马来语人才。他们分别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有的在我国外交部门，有的在我国对外广播岗位上，有的活跃在我国教育、外贸、旅游等行业里，他们为中马两国经贸合作、文化教育，以及旅游、体育等领域中的相互交流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几十年来，北京广播学院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通用语和非通用语人才，为国家输送了不少栋梁之材，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对外交流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与此同时，北京广播学院在培养通用语和非通用语工作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从2001年起，北京广播学院又增加开办马来语等多个非通用语专业，这必将为我国对外友好合作交流工作输送更多的有用人才。

二、马来语在中马两国交往中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一度曾比较少。1974 年 5 月 31 日，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不断增加，双方贸易额逐年上升，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互访频繁，两国政府、民间友好往来也与日俱增。

由于马来西亚过去长期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在中马两国的交往活动中，通用语——英语曾一度在官场上占了主导地位，而马来语在民间团体之间使用较多。因此，在中马两国交流中，尤其是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中，英语在不少场合仍然作为主要媒介语，使用马来语的机会相对较少。但是，随着中马两国之间友好交往活动不断增加，马来语作为媒介语已逐渐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并占有了一席之地，起到了通用语——英语有时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马来语是不能被通用语所取代的

1979 年，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应邀访华，在中国领导人为其举行的国宴上，马方要求使用马来语作为媒介语。外交部邀请国际电台派出著名马来语女播音员黄德良女士担任了现场口译工作。在宴会上，中方领导人发表讲话，黄德良女士作现场翻译，她那准确的翻译和优美动听的马来语语调，博得了在场的马来西亚贵宾的赞扬和惊叹。

马来西亚两任文化、青年、旅游部长萨马德·伊德里斯和沙巴鲁丁·吉先生分别于 1980 年和 1988 年应我国文化部的邀请来华访问，在国内各地所有场合均使用马来语作为媒介语。我有幸

作为两位部长的翻译，顺利地完成了全程口译任务。

1995年，马来西亚槟州元首敦·哈莫丹阁下应我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华访问，我再次受邀作为随团翻译。在华期间，他会见了我方有关领导人，并参观访问了许多城市。尽管他本人可以听懂英语，但他仍然坚持要使用马来语作为媒介语。他说，马来语使他能够更容易理解。

此外，马来西亚艺术团、体育代表团也多次来华访问演出，参加各种比赛，马来语均成为双方的媒介语。

中马两国文化、语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

随着马来语在我国使用的领域越来越多，中马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与日俱增。除了各种文艺团体来访外，语言、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也不断增加。

1989年底，马来西亚教育部下属的语文出版局曾率团访华，访华期间曾访问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马来语广播部，双方进行了友好交流。通过磋商，双方达成了进行更多的互访、交流的意向。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同意为国际台马来语工作人员提供培训马来语的机会；我方则同意邀请对方人员来华进行学习和工作访问。在1991年到1996年期间，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先后5次邀请国际台马来语部工作人员前往马来西亚进行学习和研究，同时也进行工作访问。这种学习交流有利于国际台马来语工作人员更深入地了解和掌握马来语发展状况，使我们受益匪浅。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从1994年起，同意派出人员前来国际台工作，作为马来语专家担任改稿工作。到目前为止，马方已派出4位马来语专家前来国际台工作，目前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还于1997年正式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进一步确定双方的合作意向和有关事项。

在中马两国文化教育交流中，我国还多次派出马来语工作人员和在校学生，前往马来西亚和文莱两国的大学进行学习和深造。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学生也多次前往马来西亚和文莱两国的大学进行学习深造。

讲马来语的中国人在国外很受欢迎

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都热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也希望别的国家和民族能了解、学习并使用本国的语言。每当听到别的国家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本国语言，自然会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

我曾几次有机会作为记者被派往马来西亚进行采访工作。在联系工作时，使用了自己所学的马来语。当马来西亚人听到中国人竟然也会讲一口流利的马来语时，感到十分的惊讶和激动，不仅热情地与我攀谈起来，询问在哪里学习的马来语，同时还对我的采访工作提供许多便利，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采访工作。如1992年，作为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马来西亚打前站的时政记者，我提前一周前往马来西亚进行前期采访。经过与马来西亚外交部多次交涉，尽管新华社已经提出了英文稿的采访计划，但马方最后还是同意我和新华社记者（不懂马来语）联合采访马外交部长。在进行录音采访时，马外长高兴地对我说，他要使用马来语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并请我在采访结束后将采访的内容翻译给新华社记者。

1998年，我受命出任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驻新加坡记者。在新加坡工作近2年半期间，新加坡国际电台马来语广播部曾于1999年两次用马来语采访了我，内容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天安门‘六四’事件10周年”。经过请示有关方面后，我按照我国政府的口径详细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批驳了西方反华舆论所散布的诽谤和诡辩。两

次采访录音分别于当天播出后，在新加坡马来族人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当我外出时，碰到了不少马来族朋友。他们高兴地用马来语对我说："李先生，我们很多人都听到了你在我们电台广播的声音了。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都支持中国。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是错误的，是霸权主义行为，根本不是什么'误炸'，我们不相信他们那一套。中国应该多宣传自己，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事实真相。"一位一向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年近70岁的老华人，在听到我的马来语广播录音后也激动地说："我们过去经常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听的是西方电台的声音，看的是西方的报纸，而对中国的信息知道的却很少。因此，很多人受西方舆论的宣传，信以为真，其实根本不了解'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所以，中国应该加强自己的对外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真相。"

实践证明，通用语固然可以发挥它自身的独特作用，但它决不可能包揽和代替一切领域。非通用语言有时也能够发挥通用语所不能发挥的特殊作用，起到特殊的社会效果。

中马两国翻译出版工作十分活跃

随着中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近10年来，中马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出版工作也十分活跃。

近年来，我国马来语界人士陆续把一些较有影响的马来西亚优秀小说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与此同时，还将中国一些短篇小说、古典名著等翻译成马来文，并在马来西亚出版发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名著《聊斋志异》已翻译成马来文，并在马来西亚出版发行，引起了轰动。这部古典名著的翻译者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马来语部第一任领导人、马来语广播开播元老、印尼归侨薛两鸿先生。从年幼时就侨居印尼的薛两鸿先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毅然回到了祖国，并积极投入到祖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从1950年起，薛两鸿先生就开始在国际台工作。他长期工作在我国的对外广播事业岗位上，为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广播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1983年离休后，就决心把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介绍给马来西亚的读者。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工作着。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完成了《聊斋志异》一书前53篇的翻译工作，并于1995年在马来西亚出版发行。薛两鸿先生应邀出席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该书的出版发行仪式。这本书在马来西亚出版发行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马来文版本的《聊斋志异》一书被当场销售一空。

薛两鸿先生回到北京后，决心在他有生之年继续完成该书后半部分的翻译工作。然而，就在他即将完成这部古典名著的全部翻译工作时，年已73岁的薛两鸿先生因患病住院，由于医治无效，不久就离开了人间。后人为他壮志未酬而深感惋惜。然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位曾为马来语在中国的使用和传播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不仅给中国马来语界同行，同时也给马来西亚广大读者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非通用语（马来语）人才的培养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说：“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文化发展和交流的多样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社会语境中，国际文化交流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将会成为国家之间、不同语言文化地区之间相互沟通的重要渠道。因此，在文化霸权主义日趋抬头的今天，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更显示出其紧迫性、必要性。中

国更应该重视和加大对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工作力度。

多年来，我国在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上，不同时期曾采取过不同的培养方法，也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当然，对过去所采取的培养方法也有过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论，这不足为怪。因为对任何一项新事物，操作起来必然会有个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那么规范、完美。同时，对这件新事物，由于每人所处的角度不同，也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院校对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往往比较单调，采取“单打一”的做法，即只学一种非通用语，忽视第二外语包括通用语或其他非通用语的学习分量，致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比较流利地讲一种非通用语言，而对其他通用语或非通用语感到生疏，导致在翻译工作中遇到不少麻烦，甚至有时还处于尴尬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单打一”状况，从70年代起，有的外语院校对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采取了新的措施——“双语制”教学，即在学习非通用语之前或者同时，学习其他通用语或非通用语。比如：在马来西亚，马来语是该国的国语，但由于马来西亚曾长期受到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英语也成为马来西亚比较流行的通用语，尤其是在上层社会中。因此，在学习马来语同时，对学生增加英语学习的分量，使学生在毕业时，不仅能操一口比较流利的马来语，又能具有基础扎实的英语听、说、译的能力。这不仅对人才本身是有益的，同时也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因此，这种教学的思路是正确的，也符合工作实际的要求。

近年来，在一些用人单位连续发生某些非通用语人才流失现象，一部分非通用语人才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不久，便舍弃了自己所学的非通用语，有的甚至不辞而别，另谋高就。这种人才流失的现象被人们称之为“跳槽”。于是，有关方面从上述现象得出结论认为：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不宜采取“双语制”的做

法，应仍然采用过去那种“单打一”的做法。这种做法看起来可以堵住人才“跳槽”渠道，其实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行为。它不仅不能阻止非通用语人才的正常流动，反而会给工作带来损失。因为，在当前国际舆论斗争十分激烈的形势下，按照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非通用语人才，并不是国内国际所要求的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也很难完成我国对外交流工作所承担的繁重任务。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即采取双向选择的做法。这种做法将会更加有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用人单位将会对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有才有德的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将会被用人单位所录用。

因此，我个人认为，为了培养出更多的既能熟练掌握非通用语言，又具有较好的通用语或其他非通用语功底的人才，采取“双语制”的培养方法更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我完全赞同北京广播学院目前所采取的“双语制”教学方法，来培养非通用语人才。从我个人工作实践来看，体会是很深的。前几年在新加坡担任记者期间，尽管新加坡把马来语作为国语，但是新加坡的行政用语仍然使用英语，几乎在所有场合均把英语作为媒介语，尤其是召开国际会议时更是如此。好在我学习马来语之前，曾经学习过两年英语，在后来学习马来语同时，又继续学习英语。由于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才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采访任务。如果只会非通用语，不会通用语（英语），有时就如同聋子、瞎子一般，也就不可能完成繁重的采访任务。当然，防止人才外流，保持工作人员的相对稳定性，有利于工作的正常运转。但如何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一些用人部门非常头痛的事情。其实，真正能“防止”人才外流的“灵丹妙药”，是人才是否有发挥自身才干的环境，以及他能否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待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综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高科技和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的当代，国际文化交流必然日趋频繁，中国对外交往活动也将会不断

增加。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的对外交流活动将会更加活跃。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在继续做好通用语言人才培养的同时，应加大力度培养出更多、具有高质量的非通用语人才，以满足我国日趋增加的对外交流活动的需求。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匈文化交流的历史概貌

李孝风

一、匈牙利简况

地理位置和人口

匈牙利共和国位于欧洲中部的喀尔巴阡山盆地。东与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毗连，南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为邻，西与奥地利接壤，北界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面积 93 031 平方公里，人口 1000 万左右，以匈牙利族为主，自称马札尔人，匈牙利（马札尔）语为国语。

匈牙利的民族起源与发源地

匈牙利人也同其他人种一样，是多种聚居和零散的种群在几千年民族大迁徙中互相融合的结果。因此很难找到一个界定十分准确的发源地。

但根据已有的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种学的研究成果，匈牙利种群的最早发源地，大概可以追踪到公元前 1 万至 4000 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的“乌拉尔老家”，即位于欧亚大陆的乌拉尔山脉一带。当时这里出现了一个包括匈牙利人在内的讲乌拉尔语言的种群。到了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广义的“乌拉尔种群”解体，其中一支讲“芬—乌戈尔”语言的（包括匈牙利、芬兰、爱沙尼

亚等）种群从乌拉尔山脉向西流动，停留在伏尔加和卡马河汇流处的南北一带地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以后由于人口的繁衍，又从伏尔加—卡马河流域西迁至东波罗的海地区和芬兰一带，公元前1500年左右，“芬—乌戈尔”种群开始进入畜牧农耕时代，并同时向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掠夺。在这一过程中，“芬—乌戈尔”种群自身也逐步解体，“乌戈尔”种群从中独立出来。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乌戈尔”种群也开始解体，匈牙利（马札尔）种群又从中分离出来，游牧于伏尔加中游地区，因此，匈牙利（马札尔）种群的发源地应在西西伯利亚地区，直到公元4世纪，据说是受匈奴人的追赶，才西迁到了欧洲。匈牙利人在西迁的过程中与同时迁移至欧洲东部的沃奴戈尔—土尔克和可萨尔人相遇，经过几百年的混居与同化，形成了后来（保持了乌戈尔语言特点的）讲马札尔语的匈牙利部落联盟。公元750年前后，匈牙利人迁至顿河同亚速海之间的地带，公元9世纪，匈牙利人继续西迁，到了第聂伯河和顿涅茨河一带。经过长途征战，于839年到达多瑙河下游，862年到达喀尔巴阡山盆地，895年开始定居建国。匈牙利7个部落联盟占据了已在当地定居，在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上较为先进，但人数较少的斯拉夫（保加利亚、莫尔瓦、斯洛文）、日耳曼（鲍约尔）、弗兰克、奥瓦尔等种群的地盘，把整个喀尔巴阡山盆地置于统治之下。这一过程直到公元900年才告结束。

已定居的匈牙利人连年向周边地区发动军事冒险，势力直达不来梅、西班牙、法国西部地区、意大利半岛南端和拜占廷一带。

定居以后的社会发展和变迁

匈牙利人在喀尔巴阡山盆地定居后，经历了以下的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阶段：

◆ 早期的封建主义时期——阿尔巴德王朝时期（1000－1301）。国家的奠基者格札大公，建国国王（圣）依斯特万一世。王位之争，德国和拜占廷的入侵，异教徒叛乱。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侵略的战争，鞑靼人的入侵。

◆ 成熟的封建主义时期——外国势力控制的混合王朝时期（1301－1526）。封建领主的割据，埃尔代伊1437年的农民起义，胡尼奥迪领导下的抗击土耳其的斗争，马加什国王的雄才大略，1514年多热领导下的农民起义，1526年反土（耳其）战争（莫哈齐战役）的失败。

◆ 国土三分时期，匈牙利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和土耳其帝国的附庸（1526－1686）。土耳其的多次进攻和国内势力的互相吞并，布达城落入土耳其之手，国家分裂为三部分。王室政权名存实亡，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匈牙利处于哈布斯堡王朝和土耳其帝国的夹缝之中。土耳其占领匈牙利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 晚期的封建主义时期（1686－1790）。驱逐土耳其，布达城重新获得解放（1686），1699年考尔罗察和约，土耳其战败，除个别地区外，其军队全部撤出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加强对匈牙利的统治。拉科齐的自由斗争。库鲁茨农民起义政权和农民起义军。自由斗争的失败。哈布斯堡王朝的扩张——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

◆ 封建主义的危机和改革时期（1790－1848）。匈牙利的雅各宾运动，拿破仑战争与匈牙利，经济和贵族统治的危机。塞切尼发动的改良运动和维也纳的反击。科苏特的纲领。1847－1848的最后一届等级国会。

◆ 革命和独立战争时期（1848－1849）。1848年3月15日革命，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和《十二条款》，1848年法令宣布解放农奴，废除劳役制，宣布特权继承法无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革命的二次进攻。独立战争的春季攻势的胜利，科苏特宣

读《独立宣言》，宣布废除哈布斯堡家族王位，驱逐出匈牙利并加以流放。俄—奥联军的进攻导致独立战争的失败。

◆ 哈布斯堡帝国的专制统治时期（1849－1867）。豪依瑙乌的军事统治，巴赫政权及其垮台，1867年春的妥协协议，哈布斯堡帝国改组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

◆ 奥匈帝国的二元政治时期（1867－1918）。妥协协议后二元制政治的最终稳定，反对妥协的科苏特流亡国外。妥协制度的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的崩溃。根据特里亚农和约，匈牙利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但战前领土的三分之二划归周边的国家。

◆ 革命的年代（1918－1919）。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秋菊革命”（1918），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19）。

◆ 反革命统治时期（1919－1944）。反革命上台和白色恐怖，反革命制度的巩固，严重的经济危机，全面的法西斯专政，同纳粹德国结盟，走向新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旧制度的垮台。

◆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时期（1945－1989）。统治权的更迭，过渡年代（1945－1948），1956年十月事件，巩固与调整的阶段（1957－1967），现代化进程（1968－1978），卡达尔时代的结束（1978－1988），制度变迁（1988－1989）。

二、中匈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匈牙利相隔万里之遥。两国在社会发展历史上走过迥异的漫长道路。由于地理环境和种种历史原因，两国长期以来没有什么接触，谈不上什么交流与沟通。直到18世纪，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地处中欧的匈牙利才有机会接触到博大精深的中国

科技和文化艺术成就。对比中匈两国的文化交流，匈牙利对中国的研究要比中国对匈牙利的研究为早。先谈谈匈牙利对中国的研究。

匈牙利对中国的研究

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匈牙利最早对中国感兴趣的也是一些王公贵族和教会方面的人士，他们抱着猎奇的心理，开始时着眼于中国的古玩和古建筑方面。后来，一些传教士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著述风行欧洲，匈牙利学者对中国的了解逐步加深。19世纪初，匈牙利学术界出现一股"寻根热"，一些学者抱着极大的兴趣探讨匈奴与匈牙利民族起源之间的关系，但无法证明亚洲历史上的匈奴就是匈牙利民族的祖先。因为匈牙利民间虽有关于匈奴的古代传说，但要证明这点就需要找到考古学和语言学上的根据。匈奴的语言究竟如何却不得而知。一些学者为了寻根，便先后来到亚洲进行探险或考古发掘，虽然远未达到寻根的目的，却发现了另一个世界——欧洲人眼中的"神秘的东方"。于是一个以研究亚洲语言文化为中心的"东方学"学科也在匈牙利的学术界兴起。

匈牙利东方学的先驱者是葛雷西·乔玛·山多尔（Körösi Csoma Sándor，1784－1842）。他为了寻找匈牙利民族的起源于1823年来到西藏，在西藏寺庙里和喜马拉雅山南麓前后生活了10多年。1834年，他在加尔各答用英文编纂出版了具有开创价值的《藏语语法》和《藏英字典》，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西部边疆文化领域的欧洲东方学家。葛雷西在1842年第二次进藏考察时，不幸在途中病故。1828年，匈牙利科学院建立。19世纪后半叶，为了深入了解亚洲腹地的历史文化，一些匈牙利学者先后组成探险考察组（团）来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进行考察和考古发掘。如地理学旅行家塞切尼·贝拉（Széchenyi Béla，1837－

1918）于1876年至1878年率团到东亚考察，关于此行，他在《塞切尼·贝拉伯爵东亚之行的科研成果》的三卷本著作中有详细叙述。著名地质地理学家罗企·拉约什（Lóczy Lajos，1849－1920）于1877－1882年参加塞切尼率领的考察组，曾到过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他此行留下的最珍贵的著作是1886年出版的《中华帝国的自然环境记述》。19世纪匈牙利著名的版画家和插图画家兹奇·米哈伊（Zichy Mihály，1827－1906）也于1898年来过中国北方参加考古发掘。英籍匈牙利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斯坦因（Stein Aurél，1862－1943）从罗企·拉约什处获知了敦煌石窟的信息。他曾于1888年出任印度拉合尔大学教授，1900年受英国之雇带领一支考察队到亚洲腹地探险，先后在克什米尔、土耳其斯坦、印度、伊朗、中国和蒙古进行考察，在上述地区发现另外一些远古和中世纪早期的城市遗址，其中就包括我国的敦煌石窟和其藏经洞，从中带走了许多珍贵的图书资料，并在英国博物馆作过展出，一些私人图书资料后来赠给了匈牙利科学院（斯坦因曾为匈牙利科学院外籍院士，与匈牙利科学院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关于此次到亚洲的探险活动，曾留下了《埋在沙漠中的城市》、《亚洲心脏地带的城市遗址》、《我的中亚之行》等著作。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匈牙利布达佩斯巴兹马尼·彼得（Pázmány Péter）大学（1949年起更名为埃特沃什·罗兰大学，Eötvös Lorand Tudományegyetem）相继成立了东亚系（1924）和中亚系（1940）。匈牙利语言学家李盖蒂·拉约什（Ligeti Lajos，1902－1987）曾任该两系领导。他早年就读于巴黎索尔邦神学院和法兰西学院，1924－1927年曾在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门下学习东方学。1928－1940年间先后考察了中国的内蒙古、中国东北满族聚居地区以及阿富汗和日本，发表了一些关于汉、蒙、藏、突厥、满—通古斯语族的社会历史和语言方面的论著，如《中国的过去和现在》（1935）、

《陌生的亚洲腹地》(1940)、《一段12世纪的“满洲”—通古斯文字》(1948)等，还翻译了对研究匈牙利原始诗歌有借鉴价值的《蒙古秘史》(1962)。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匈牙利东方学对于中国的全面研究便落到了李盖蒂的学生和其他的后辈学者的肩上。匈牙利1945年的解放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此提供了更多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匈两国由50年代初开始互派留学生，其中一部分人毕业后从事了文化交流工作。

20世纪后半叶匈牙利对中国的文化交流更偏重于汉学（即中国的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和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匈牙利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主要是在1945年匈牙利解放以后。在人员组成上，一部分为匈牙利语言学家李盖蒂的学生，一部分为50年代留学中国的汉学家，其他还有许多人是通过通用的语言文字（如英语、俄语和德语等）来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他们分属于匈牙利科学院东方研究中心、布达佩斯和外省一些大学的东亚语文系、匈牙利东方博物馆和一些出版社。在近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下，无论是在古典文学，还是在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介绍上，都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匈牙利的翻译介绍者首推杜克义(Tökei Ferenc，1930－2000)。杜克义20世纪50年代初在布达佩斯埃特沃什·罗兰大学文史系博物馆学专业毕业后，作为该系的研究生在李盖蒂的指导下研究东方的语言和艺术史。他后来在工作中把重点转向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介绍。他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文学、美学问题作了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涉及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体论和哲学、音乐、绘画等理论问题，如《中国悲歌的起源——屈原及其时代》(1959，1986)、《中国文学史简编》(与米白尔合著，1960)、《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1966)、《汉魏六朝时期的中国文体理论》(1967)、《中国文学概略》(1970)、

《汉学研究》(1974) 等。还翻译了大量的以古典文学为主的中国文学作品。译作内容广泛，纵横兼及，上自《诗经》和《孙子兵法》，下至鲁迅和管桦的短篇小说。包罗了《道德经》、屈原的楚辞、《乐府诗选》、《曹植诗选》、《关汉卿杂剧选》、李行道的《灰阑记》、王实甫《西厢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选》，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著作选译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等。杜克义在50年代学生时期曾来华进修。改革开放后，从1988年至1999年的10余年间，几乎每年都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客人来华进行访问交流，算得上是一位博古通今的汉学家。

20世纪李盖蒂的另一个学生陈国（Csongor Barnabás，1923－）40年代在布达佩斯埃特沃什·罗兰大学研究汉语和其他东方国家的语言和古文字等，发表了《维吾尔文手稿中的汉语散见词条》(1947)、《敦煌出土藏经中的一些汉语词条》(1960)、《唐代方言注释》(1967) 等研究成果。70年代开始转向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发表了多篇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传》的论文，如《中国小说人物的历史性》(1974)、《水浒传的通俗性》(1974)、《水浒传与西游记的分析比较》(1982)、《一部中国小说中的人的世界》(1985) 等。他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开始于50年代，起初是翻译唐诗，如《李太白诗选》(1951)、《白居易诗选》(1952)、《杜甫诗选》(1955) 等。他后来翻译了明代长篇小说，如施耐庵的《水浒传》(1－2卷，1961，第二版增改版，1－3卷，1977)、吴承恩的《西游记》(1－2卷，1967，1980)、董说的《西游补》(1980) 等。现当代作品中，还翻译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1959) 等等。陈国曾于1957、1963、1984、1988年来华进行学术访问。

应当提及的中国文学翻译家还有：

米白尔（Miklós Pál，1927－），50年代初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攻读艺术史，回国后先后在匈牙利东亚艺术博物馆和匈科院

文学研究所研究中国艺术和文化理论。曾著《敦煌千佛洞》(1959)、《中国文学史简编》(与杜克义合著,1960)、《齐白石》(1962)、《龙之眼,中国肖像画技法引论》(《画龙点睛》,1973)等书。译作有中国佛教寓言选《临济语录、无门关、碧岩录》(1987)、郭沫若的剧本《屈原》(1958)及自传体小说《我的童年》(1961)、《大学时代》(1962)、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1957)和剧本《茶馆》(1960)、曹禺的剧本《雷雨》(1959)、《关汉卿杂剧选》(《窦娥冤》、《救风尘》,与杜克义合译,1958)、《中国现代诗歌选》(与高恩德合译,1961)。

高恩德(Galla Endre,1926 -),50年代初在中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回国后在布达佩斯埃特沃什·罗兰大学中国和东亚教研室任教。主要研究19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和现当代中国文学。著有《匈牙利文学在中国》(专著,1968)、茅盾小说《子夜》匈译本序等。译作有: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1961)、鲁迅杂文选《文学、革命、社会》(1981)、老舍的小说《猫城记》(1981)、《中国现代诗歌选》(与米白尔合译,1961)、《大熔炉》(1958年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与多人合译,1959)。中国改革开放后,80年代曾数度来华访问,并参加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的匈语教科书《匈牙利语》的审定工作。

尤山度(Józsa Sándor,1928 -),50年代在中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近代史。回国后在布达佩斯埃特沃什·罗兰大学中国和东亚教研室任教,参加《匈汉字典》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科书《匈牙利语》的审定工作。著有《中国与奥匈帝国》(专著,1966)、《汉语》(教科书,1-4册,与高恩德合著,1986 - 1990)。译作有茅盾的小说《春蚕》(1958)、艾芜的小说《山野》(1958)、《毛泽东诗21首》(1959)和溥义的《我的前半生》(1969)等。20世纪80年代曾几度来

华访问，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客座匈语教授。

鲍洛尼（Polonyi Péter，1935－），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回国后在匈牙利东亚艺术博物馆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著有《北京留学记》（1982）、《中国历史》（1988）、导游手册《中国》（1987）和《中国拍电影记》（1986）等。译作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1966）、刘鹗的《老残游记》（1985）、王蒙的短篇小说选《说客盈门》（1984）、莫应丰的《难与人言的故事》（1980）、古华的《芙蓉镇》（1987）等。20世纪80年代曾数度来华访问。

艾之迪（Ecsedy Ildikó，1938－），1961年毕业于埃特沃什·罗兰大学匈文—中文系，1971年起历任匈科院东方学委员会委员、匈科院远东工作委员会主席、埃特沃什·罗兰大学教授。主要论著有：《中国边境上的游牧人和商人》（1979）、《中国国家的起源》（1987）、《旧中国的日常生活和节日》（1990）、《中国的皇帝及其仆从》（1992）。译作有：《三国演义故事》（1987）。

除上面所述外，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匈文出版的还有很多，如：谷兰（Kalmár Eva）选译的中国古典喜剧选《老生儿》（包括《秋胡戏妻》、《守财奴》、《老生儿》三部，1978），马达易译的《金瓶梅》（1－2卷，1964－1983，共出6版）和《隔帘花影》（1965），瓦尔加译的《好逑传》（1945－1969，共4版），拉扎尔译的《红楼梦》（1－2卷，1959－1976，共出4版），格弥尼译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及其他故事》（1958）和《今古奇观》（1960），哈易译的《孽海花》（1962），易叶什译的中国古典诗选《中国盒子》（1958），罗那达士译的西藏神话故事选《八瓣莲花》（1958）等。还有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峻吉译，1951）、《风波》（马卡义译，1953）、《阿Q正传》（梅维佳、巴宫坭等译，1956），茅盾的《子夜》（格民译，1955，西多加译，1977），巴金的《家》（龙朴译，1957）、《长生塔》（巴洛士译，1959）、《憩

园》(巴洛士译，1962)，老舍的《黑白李》(《月牙儿》，龙朴译，1959)，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梅维佳译，1961)，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峻吉译，1961)，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瓦加士译，1950)、《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选，久尔吉等译，1952)，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朱瑞玉译，1951)，草明的《原动力》(斯洛舍译，1951)，刘白羽的短篇小说选《无敌三勇士》(马卡义译，1951)，邵子南的短篇小说选《地雷阵》(格列特译，1952)，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葛尔迪译，1952)，欧阳山的《高干大》(纳纳西译，1952)，《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巴德纳宜等译，1951)，《新中国短篇小说选》(加纳第等译，1952)，史雁的《柳堡的故事》(葛雷坭译，1951)，梁信的《刘胡兰的故事》(瓦以达译，1954)，田间的《赶车传》(格尔莫士译，1954)，柳青的《创业史》(伊利亚士夫人即薛昆华译，1963)等。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匈牙利的汉学研究队伍逐渐老化，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工作的人员先后退休。罗兰大学东亚系中文专业在20世纪最后20年招收的学生，总共不到100人。尽管开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现代文学等课程，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都选择了商贸方面的工作，真正从事汉学研究的为数极少。如语言学家马东飞(Martonfi Ferenc，1944－1991)，历史学家王俊义(Vámos Péter，1969－)和研究中国宗教史的郝清新(Hamar Imre，1967－)。中文系今后计划每年招10名学生，使在校生总数达到50人。

匈牙利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有：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工作组(出版《历史与文化》丛书)；埃特沃什·罗兰大学文史系中国和东亚教研室；匈牙利科学院阿尔泰学研究组；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委员会、远东工作委员会；葛雷西·乔玛协会，《东方研

究》刊物；东方图书馆，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委员会丛书；密什科尔茨文史学会，文化史系，中国教研室；东亚博物馆附属拉特·久尔吉博物馆（原中国博物馆）；匈中友协专业办公室；中文语言教学；布达佩斯葛雷西·乔玛协会，布达佩斯自然科学普及协会，赛盖德大学东方学教研室和佩奇的一些中学等；赛盖德尤若夫·阿蒂拉大学阿尔泰学教研室，匈科院阿尔泰学委员会等。

中国对匈牙利的研究

中国对匈牙利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研究的对象是匈牙利文学。由于当时与匈牙利的学术界没有直接的交往，对匈牙利的研究既没有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专职的人员，更不是通过匈牙利文的原文。对匈牙利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利用通用语言（英、德、俄和世界语）和其他国家的间接材料来完成的。我国50年代初（从1951年起）开始向匈牙利派遣留学生，先是满足外交、新闻和经贸方面的需要，从1954年开始除语言文学外还增派了音乐、体育、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留学生。其中一部分学匈牙利文学的留学生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先后走上工作岗位，开始用匈牙利本国语言研究匈牙利文学。60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包括匈牙利语言在内的东欧语系，开辟了在国内培养匈语人才的途径。从6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先后在经济所、外国文学所和世界历史所设立了研究匈牙利经济、历史和文学的学科。这才开始了对匈牙利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以下介绍一下中国对匈牙利文学的翻译和评介情况。

中国对匈牙利文学的翻译评介始于20世纪初，最早的翻译介绍者是鲁迅。他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曾对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山多尔（1823－1849）作过很高的评价，1908年又翻译了奥地利匈牙利文学史家籁息·艾密尔撰写的《裴

多菲诗论》。我国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都在20－30年代通过世界语和第三国文字或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或以单行本的形式对匈牙利文学作过翻译和评论。白莽翻译的裴多菲的四句箴言诗《自由与爱情》，是该诗在中国流传的最早译文。白莽在1929年翻译了介绍裴多菲生平的文章《彼得斐·山陀尔形状》。孙用早在30－40年代就在鲁迅关于研究“弱小民族”文学精神鼓舞下从事匈牙利文学（特别是裴多菲的）作品的翻译介绍。他于1931年翻译了裴多菲的《致19世纪的诗人》等诗，以及蒂诺蒂·赛拜什金（1505－1556）的诗《索尔诺克的陷落》，1937年翻译了包劳西·巴林特（1554－1594）的诗歌《疆土颂》，1931年还撰写了《关于匈牙利文学》介绍文章（见《春天的歌》译文集）。茅盾1921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是第一篇评述匈牙利断代文学史的文章。1923年他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百年纪念》一文。茅盾自己除翻译裴多菲的小说《私奔》（1922年《小说世界》创刊号）外，还翻译了莫尔纳尔·费仑茨（1878－1952）的短篇小说《雪人》、《偷煤贼》（见《雪人》短篇小说集，开明书店，1928）和米克沙特·卡尔蔓（1847－1910）的短篇小说《皇帝的衣服》（《译文》，1934年9月）。冯至也发表过介绍裴多菲的文章——《Petöfi Sándor》（1923年《沈钟》第二期）。胡愈之在1928年翻译了海尔陶依·耶诺（1871－1957）的短篇小说《伯爵的裤子》。1932年巴金翻译了匈牙利世界语作家巴基·久拉（1891－1967）的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胡绳翻译了卡里卡什·弗里杰什（1895－1937）描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的短篇小说《约翰·郭尔贝》（《译文》新一卷，第三期）。40年代焦菊隐翻译了鲍拉日·贝拉（1884－1949）的《安魂曲》（重庆文化出版社，1943）。郑伯华翻译了伊列什·贝拉（1895－1974）的长篇小说《喀尔巴阡山狂想曲》（三联书店，

1949)。此外，还有周作人翻译的约卡伊·莫尔（1825－1904）的中篇小说《黄蔷薇》（商务印书馆，1927）和《上帝只有一个》(见《匈奴奇士录》，上海商务，1933)，施蛰存翻译的《匈牙利短篇小说集》(上海商务，19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匈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匈牙利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名著被大量地介绍给中国读者。孙用、戈宝权、万紫、汤真、施蛰存、何家槐、梅绍武、兴万生、冯植生等或通过第三国文字，或直接根据匈牙利原文，都对匈牙利文学作过翻译介绍。孙用在50年代翻译了《裴多菲诗四十首》(上海文化社，1951年)、《裴多菲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等几种不同的裴多菲诗歌选集。他还翻译了《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和阿兰尼·杨诺什（1817－1882）的长诗《多尔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57年又撰写了研究论文《裴多菲和他的诗》(《文艺学习》，总第38期)。50－60年代翻译和介绍裴多菲诗歌的，除了孙用之外，还有戈宝权和兴万生等，如戈宝权翻译的裴多菲诗歌《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译文》，1955年4月号)，兴万生翻译的裴多菲长诗《使徒》（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和所著论文《裴多菲的诗歌创作》(《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裴多菲之前的匈牙利著名诗人维勒什马尔蒂·米哈依（1800－1855）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也有翻译和介绍，如他的叙事长诗《钟哥与金黛》(斐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和《号召》、《荒凉的小旅店》、《老茨冈》（戈宝权译，《译文》，1955年11月号）等其他诗歌。

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对匈牙利古典散文作品的翻译介绍很多，如约卡伊·莫尔的《一个匈牙利富豪》(梅绍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黄蔷薇》（汤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为了自由》(王央乐等译，作家出版社，1956)；米克沙

特·卡尔曼的《奇婚记》（朱微明、肖中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圣彼得的伞》（康嗣群译，平明出版社，1953）；莫里兹·日格蒙德（1879－1942）的小说《火炬》（施蛰存译，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3)、《在上帝背后》（王淑瑛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和《莫里兹短篇小说集》（何家槐等译，作家出版社，1955)，以及莫里兹·维拉格（1909－）的剧本《亲戚》（茅於美译，作家出版社，1955）等等。

20世纪匈牙利散文作品中，除了翻译介绍伊列什·贝拉（1895－1974）的《祖国的光复》（秦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和《蒂萨河在燃烧》（柯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外，还翻译了维莱什·彼得（1897－1970）的短篇小说集《考验》（赵少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希达什·安陶尔（1899－1980）编的《匈牙利民间故事》（苏霖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萨波·巴尔（1893－1970）的剧本《夏日骤雨》（付佩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札尔卡·马特（1896－1937）的《札尔卡小说选》（秦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纳吉·山多尔（1922－）的短篇小说《和解》（陈殿兴译，东北文艺出版社，1953)、乌尔本·艾尔纳（1918－1974）的剧本《战斗的洗礼》（付惟慈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白柯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和《困难的形势》（千易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曼狄·艾娃（1922－）的《平日的英雄》（蔡时济译，作家出版社，1954)、奇兹马列克·马加什（1909－？）等人的童话剧《小花牛》（付惟慈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以及考林蒂·弗里杰什（1887－1938）的《魔椅》（史春芳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和哈依·久拉（1900－1975）的剧本《生活的桥梁》（冯亦代译，作家出版社，1955）等。

20世纪的匈牙利诗歌，除了孙用所译的《尤若夫·阿蒂拉诗选》外，其他诗人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也发表得很多。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匈牙利汉学家高恩德（1926－）及其中国血统的夫人冒寿福在这方面的辛勤耕耘。有趣的是这些诗歌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基本上都集中在50年代，如尤哈斯·费仑茨（1928－）的《朝鲜，你也是我的祖国》（梅维佳、罗大冈合译，《人民文学》，1952年7月号）、沙波·雷林茨（1900－1957）的《称赞》（高恩德译，《译文》，1954年第4期）、尤若夫·阿蒂拉的《资本利润之歌》、《最后》、《穷人就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你说命运给……》（高恩德等译，《译文》，1955年4月号）、班杨敏·拉斯洛（1915－1986）的《匈牙利的春天》（查良铮译，《译文》，1955年4月号）、奥第·安德莱（1877－1919）的《孔雀飞上天》、《无产者儿子的歌》、《我生活在青年们心里》（高恩德、冒寿福、孙用合译，《译文》，1958年第4期）、弗多尔·尤若夫（1898－1973）的《红色的墓碑》（高恩德等译，《译文》，1958年4月号）、劳德诺蒂·米克洛什（1909－1944）的《根》（高恩德等译，《译文》，1958年4月号）、杨科维奇·费仑茨（1907－1971）的《啊，明朗的风》（高恩德等译，《译文》，1958年4月号）、西蒙·依斯特万（1926－1975）的《裴多菲在阿兰尼家里》（高恩德等译，《译文》，1958年4月号）、伊叶什·久拉（1902－1983）的《巴黎前进着》（高恩德等译，《译文》，1958年4月号）和沃勒士·山陀尔（1913－1989）的《1937和1959》（高恩德、冒寿福译，《世界文学》，1959年第9期）等。

文艺理论方面，50年代末翻译介绍了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久尔吉（1885－1971）的多篇文艺理论著述。

1978年以来，我国对匈牙利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开始系统化，而且依据匈牙利原文的译著的比重也日益加大。这一时期从原文和第三国文字翻译出版了裴多菲的《旅行札记》（兴万生译，《世界文学》，1978年第4期）、《裴多菲评传》（兴万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裴多菲诗选》（上、下卷）（兴万生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2）、《裴多菲抒情诗选》（兴万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裴多菲小说散文选》（兴万生、戈宝权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和米克沙特的《短篇小说选》（冯植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小说《圣彼得的伞》（张春风、冯植生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围攻别斯捷尔采城》（张家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以及约卡伊的小说《黑钻石》（汤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金人》（柯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一桌十三人》（汤真译，花城出版社，1982）、《铁石心肠人的儿女》（白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约卡伊短篇小说选》（汤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此外，还有莫里兹的小说《强盗》（冯植生译，漓江出版社，1981）、《小蝴蝶——田园诗》（翁本泽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伊列什的小说《喀尔巴阡山狂想曲》（汤真、万紫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厄尔凯尼·依斯特万（1912－1979）的剧本《多特一家》（杨敏译，《剧本》月刊，1985 年 6 月号）和《一分钟小说选》（柴鹏飞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莫尔多瓦·久尔吉（1934－）的短篇小说选《会说话的猪》（柴鹏飞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加尔·久尔吉·山道尔（1907－1980）的《李斯特传记小说》（朱安康、李孝风、符志良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考林蒂·费仑茨的小说《布达佩斯的春天》（李孝风译，重庆出版社，1993）和桑陶·费仑茨（1927－）的小说《第五个印章》（罗素冬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等。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史方面，80 年代翻译出版了《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2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981），并有若干篇关于约卡伊、米克沙特、尤若夫·阿蒂拉和莫里兹的著述发表问世。80 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已收入了关于匈牙利文学和作家的条目若干条。1990 年出版的《东欧文学史》（重庆出版社）有关匈牙利文学的部分，是我国的

匈牙利文学研究工作者根据原文材料撰写的第一部较详细的匈牙利文学史。1995年出版了冯植生撰写的《匈牙利文学史》单行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兴万生译的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全集《裴多菲文集》（6卷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匈牙利诗人阿兰尼的诗歌译本《阿兰尼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裴多菲文集》是迄今世界上惟一的一部裴多菲诗歌和散文的全译本。

人员交流情况：20世纪50年代初，中匈两国开始互派留学生。6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几乎没有派相关专业人员到匈牙利进行交流。改革开放后，主要是80年代后半期以来，通过双方研究单位的学者交换或对方单位邀请等渠道，社科院经济所、世界历史所、民族所、少数民族语言所、宗教所都先后有科研人员到匈牙利有关单位进行学术交流。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匈牙利文学的专业人员兴万生、冯植生、李孝风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先后到匈牙利进行访问。兴万生、李孝风还分别被匈牙利授予共和国奖状、共和国骑士勋章和卢卡契基金会奖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挝语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张良民

老挝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北部，是东南亚惟一的内陆国，1997年7月加入东盟，是我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虽然老挝属不发达国家，幅员较小，但她历史悠久、美丽富饶。保持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中国政府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不分大小都各有所长，各国应取长补短，特别是中老这样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加强彼此之间的友好合作更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96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了老挝语等多种非通用语种专业。40年来，老挝语专业同其他非通用语专业一样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成为我国培养老挝语专业本科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2000年9月又正式开设了老挝语言文化专业硕士点，开始培养我国首届老挝语专业的研究生。

几十年来，我们一共招收了9届老挝语专业的学生，培养了近百名老挝语专门人才，他们活跃在我国各条战线上，以出色的成绩，为中老传统友谊、友好合作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这同时，我们对老挝的语言、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中老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非通用语种之一的老挝语在我国可谓是专业人才济济，研究成果累累。

一、老挝语专业人才济济

在我国，除了北外、北京广播学院有老挝语专业之外，广西民族学院在20世纪70年代也开办了老挝语专业，先后培养了许多届老挝语学生，而他们的第一批教师是北外培养的首届老挝语毕业生，以及送到北外来学习的第一批进修生；此后，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也开设了老挝语专业，他们也曾派三批教师到北外来深造进修。最近云南民族学院也开设了老挝语专业，而首任教师是北外第8届老挝语毕业生。北外的教师还为北大东南亚文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多次开设有关老挝历史与现状、中老友好关系的讲座。

北外毕业的好几届学生分别活跃在我国外交部、中联部、外经贸部、对外友协等外事部门，直接从事着中老两国的外交、政治、经贸、文化方面的交流工作，其中有的当了国家领导人的秘书，有的当了司、局级的领导。在中国驻老挝使馆，许多工作人员和主要翻译都由北外的老挝语毕业生担任，他们为中老两国高层代表团的互访、会谈、签订协议等重要仪式和场合担任翻译工作，在中老友好交往互利合作的第一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早在1958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开设了老挝语广播，北外几乎每届都有老挝语毕业生到那里工作，在编辑、翻译、播音、采访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中，他们陆续成为骨干力量，有的经常为老挝的党报《人民报》等报刊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新闻报道，受到老挝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赞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有的年轻人多次获得广电部颁发的“彩虹奖”，为中老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独特的直接的贡献。

在新华社工作的老挝语人才，他们曾在老挝首都万象新华社

分社任首席记者，进行新闻报道和摄影工作，编译了老挝文版的《新华电讯稿》，向老挝各大城市、党政军社团机关广泛发行，受到老挝各界人士的好评。他们还普遍采访了老挝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和省市负责人，以及著名人士，报道老挝国内的情况，报道中老两国在各个领域友好交流的动人场面，在为增强中老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活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军事部门工作的老挝语人才，为中老两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做了大量的具体细致的工作。

由于老挝和泰国是一河之隔的近邻，两国在语言、文化、民族、宗教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极为相似，所以，掌握了老挝语，就会很自然掌握泰语，这正是老挝语专业人才的一大优势。因此，老挝语专业人才，同样可以胜任有关泰语的工作。有的当接待泰国代表团的翻译，有的担任泰国游客的导游，也有的当新华社驻泰国的首席记者，还有的在泰国公司、企业中当顾问或代表，也有的在泰国的大学中讲授汉语等，为中泰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老挝语专业各届毕业生，即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用上老挝语，也都有很好的去向，从事其他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体现自身的价值。如有的当了省旅游局局长、省文化厅厅长；不少人当了中学教师；有的自己开了公司，办了企业；有的年轻人继续深造，或考上北大研究生，或出国留学、攻读学位；有的还当了研究人员、学者；有的在校学习期间，发挥其特长和爱好，获得了 2001 年度全球华人商业广告创作的金奖。老挝语专业人才在我国确实是人才济济，一派兴旺。

二、研究老挝的成果累累

北外作为培养非通用语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进行科研的一

个中心。我们在从事老挝语教学的同时，在有关老挝的资料奇缺的困难条件下，经过长期的点滴的积累，对老挝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发表的，不但对推动非通用语种的教学改革，培养高质量的老挝语专业人才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有关方面进一步了解老挝的国情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编写了《老挝语》1－4册，这是我国高等学校首次公开出版的老挝语教科书，第一版早已销售一空，现在正修订出第二版。第一本《老挝语实用语法》也即将出版。我们北外的3名老挝语教师为我国首次正式出版由黄冰同志编著的《老挝语汉语词典》作了审定。

在《人民日报》、《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纵横》、《国际论坛》等全国性核心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老挝国情研究的论文数十篇。

《老挝戏剧》被收入1989年11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老挝的古典名著《桑信赛》简介和老挝现代诗歌代表作《占芭花》被收入1992年6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老挝文学被收人1995年12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文学史》，该书被评为199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外国文学一等奖，并获得1996年度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老挝的民俗被收入1991年10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化精粹词典》，老挝的文化被收入1993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文化词典》，老挝的谚语等被收入1990年8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思想宝库》，老挝的风土人情被收入1991年9月由黄山书社出版的《东方风俗文化词典》。东方民间故事精品评注丛书老挝卷于2001年5月由辽宁省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1998年12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万国博览》（亚洲卷）全面集中地介绍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此外，1992年5月，在老挝著名的文学月刊《文艺》上发表了由我们教师翻译的中国唐宋诗词简介和一首古诗，这是自1975年12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老挝报刊上第一次刊登由中国人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受到老挝读者的欢迎。

对于在办学条件困难的情况下，老挝语专业人才的不断涌现，科研成果的不断推出，作为从事多年老挝语教学的教师感到由衷的欣慰。

三、几点思考

老挝语专业的教学走过了40年的曲折历程，这中间有喜悦和兴奋，也有困惑和沮丧。这固然跟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的大气候有关，但跟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重视关心与否直接相关。

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与西方国家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相比，我国的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的办学条件、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师资培养都需要大力加强和改善，我们的大国地位迫切要求加快非通用语的发展。

老挝作为我国山水相连的周边国家，有着独特的重要的战略地位，有着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中老两国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都实行改革开放，两国对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无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和平年代里，中老两国始终坚持友好合作。2000年11月，江主席在访问老挝期间，发表了《中老两国关于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中老关

系的方向，即发展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全面合作的关系。特别是中老两国在发展互利经济合作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因此，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的老挝语专门人才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主管部门应有战略眼光，从长远全局考虑，对非通用语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大投入力度，在一些政策上给予倾斜，使得从事非通用语种教学的人们安心，使得很不容易创办起来的非通用语种专业后继有人，生存发展下去。

我们要改变非通用语的办学模式，要以人为本，从国家的需要和学生的实际出发，应提倡复语制或双学位，使得非通用语在招生时，对报考的学生有吸引力。在校学习非通用语的同时，牢固掌握英语，拓宽专业领域，开阔学生视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学生毕业后提供广阔的就业机会，使学生在就业时有明显的优势和较强的竞争力。

非通用语专业要继续得到发展，除了依靠以上所说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是依靠从事非通用语工作的人士自身的努力与拼搏，这是内因，是通过不断努力可以做到的，也是最牢靠的。许多非通用语专业的发展道路已经证明了这点，今后也必将继续证明这点。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作为从事非通用语专业的人士应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要有一种执着的敬业精神，要有不断增强抵制各种诱惑的自控能力，要有一种乐在其中、不断进取的自我激励精神。我们既然选择了对国家有用的非通用语专业，就必须立志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中，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并努力开拓，创造新的条件，搞出名堂，有所作为，在为国奉献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正是非通用语的出路所在。路，就在脚下！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东欧文学在我国的早期传入
（1906－1949）

丁　超

东欧或今天的中东欧和东南欧是一个具有特定的政治、地域和文化内涵的范畴。东欧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人们至今仍习惯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具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类似特征。比如地域相邻，交往密切，在文化和习俗方面互相影响；都处于东西文化的交界地带；在历史上大都遭受欧洲列强的侵略、压迫，甚至瓜分；战后走过的发展道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转轨过程都颇为近似，等等。

东欧各国历史悠久，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名家辈出。用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更是各有千秋，异彩纷呈，不断丰富着人类文化宝库。许多东欧文学作品已经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东欧文学在我国的传入始于清末民初。从总体上看，东欧翻译文学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步，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进入繁盛，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这方面的情况，曾有专家学者按部分国别作过粗略的介绍。我们在本文回溯和探讨的是，东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在我国早期传人的基本过程、内容和方式，从对比分析中找出差异，总结共性。

一、东欧文学传入我国的萌芽阶段

中国对东欧民族和国家的认知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比

较复杂，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但至今尚未见到专门的论述。近代著名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1794—1857），最先倡言学习西方。他在1842年编著的《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名著，其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变法图强的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乃至邻国日本的近代化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书中地志部分的主体是欧洲，分叙19个国家，东欧包括了匈牙利和波兰，其内容在当时来说已相当详细。此前典籍中是否有对东欧的记述，我想如果花些力气查考，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初期，译家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英国的小说和法国的诗歌，另外也有少量的德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译著。

20世纪初，东欧文学开始进入中国知识阶层的视野。当时中国正处在极度的黑暗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奇耻大辱和空前的灾难，清朝腐朽崩溃，封建社会日趋解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人民深受压迫，民族面临危难。一批批仁人志士纷纷奋起抗争，寻求自强自救。他们认识到要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全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他们对国际形势也相当敏感，对那些被侵略、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寄予同情，从他们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汲取力量。对东欧国家的简短报道和提及已不时见诸于报端，其中以涉及波兰的文字居多，有些也论及整个巴尔干地区。在历史译著中，到1904年，日本涩江保的《波兰衰亡史》在中国已有3个版本。

1906年，我国近代文学翻译家吴梼从日文转译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小说《灯台卒》（今译《灯塔看守人》），原署星科伊梯撰，日本田山花袋译，吴梼重译，刊载于当年的《绣像小说》第68－69期上。这大约是最早传入我国的东欧文学作品。

1908年，李石曾翻译了波兰作家廖抗夫的爱国主义剧本《夜未央》，同年10月，由广州革新书局出版。这在我国翻译外国剧本方面也是开风气之先的。该剧上演曾轰动一时，后来又陆续有多种译本出现。

应该特别指出，最早对东欧国家及其文学进行总体性的关注并亲自译介的还是鲁迅。

1906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日本士兵在日俄战争中凶残地杀害中国人的幻灯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以文艺来改造国民的精神。他在东京与许寿裳提倡文艺运动，学习德文、俄文，学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博览西方各国的文学著作，搜集德译本的弱小民族的小说，如波兰、匈牙利、芬兰、保加利亚、捷克、南斯拉夫、希腊等国的作品，寻求民主主义思想。

1907年，鲁迅写下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发表于1908年2月和3月的《河南》月刊第2号、第3号，署名令飞。他在文中介绍了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和斯沃瓦茨基，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浪漫主义爱国诗人。他把这些诗人称为"魔罗"（恶魔）诗人，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具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革命精神。其中对波兰诗人是辟以专节（八）论述的，对密茨凯维支的介绍最为突出。鲁迅介绍了他的诗剧《先人祭》、《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和长篇叙事诗《格拉席娜》、《康拉德·华伦洛德》和《塔杜什先生》等作品，对作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密克威支所为诗，有今昔国人之声，寄于是焉。诸凡诗中之声，清澈弘厉，万感悉至，直至波阑一角之天，悉满歌声，虽至今日，而影响于波阑人之心者，力犹无限。"

在《摩罗诗力说》的第九节，鲁迅以浓重的笔墨对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裴多菲作了介绍，列举了他的《民族之歌》、《给国王

们》、《勇敢的约翰》和《绞吏之绳》等诗作，称其"著之诗歌，妙绝人世"。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充满了革命战斗精神，它不仅奠定了"五四"时期鲁迅的文学范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中国作家第一次对以波兰、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文学比较集中的反映。除上述诗人外，鲁迅在文中提及的还有波兰诗人克拉旬斯奇、将军贝姆，匈牙利诗人魏勒斯马尔提、奥洛尼和1848年革命领导人科苏尔。另外，还提到诸如"脱阑希勒伐尼亚"（今译特兰西瓦尼亚，时属匈牙利，今属罗马尼亚）这样的一批地名，对于我们考察东欧地名的汉译过程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08年，鲁迅还为《河南》月刊翻译了奥地利匈牙利文学史家籁息·艾密尔的《裴彖飞诗论》。

后来鲁迅多次谈到他对东欧文学的特别兴趣，他在《〈竖琴〉前记》一文中坦言自己"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在《题未定草三》中，曾谈到对波兰文学的感受："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也记述过当时的想法：

>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特别多。也曾热心地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从这些自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从开始转向文学的时候，就有重点有选择地关注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作品，以激

起国人觉醒和反抗，改良社会。这在鲁迅的思想中，是很突出的一点。他的主张和实践，对东欧文学在我国的传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这方面与鲁迅一同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还有他的二弟周作人。他早期翻译的匈牙利文学作品有：浪漫主义作家约卡依·莫尔的历史小说《匈奴骑士录》，1908 年 8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0 年 12 月，周作人从英文转译了莫尔的另一部中篇小说《黄玫瑰》，但迟至 1920 年方得以面世。

周氏兄弟在 1909 年编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二册，除少量英、美、法等西方大国外，重点已开始转向俄国和东欧、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其中可以看到波兰显克微支的短篇《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和《酋长》，还有波斯尼亚穆拉淑微支的《不辰》和《摩诃末翁》，各篇均署周作人译。

此后周作人还陆续翻译了其他一些东欧民族的文学作品，如匈牙利裴多菲的诗作《故国》和波希米亚民歌《鹧鸪》，发表在 1914 年出版的《中华小说界》第 1 卷第 2 期。

还应提到的是，近代翻译家周瘦鹃在 1917 年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这是继鲁迅、周作人选译的《域外小说集》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短篇小说翻译专集。该书分 3 卷，在所收 50 篇短篇小说中，包括匈牙利约卡依·莫尔的《兄弟》和塞尔维亚蝙古立克的《一吻之代价》。

从 1906 年到 1919 年，可以算作东欧文学在我国传入的萌芽阶段。

二、东欧文学译介的一个高峰时期

我国早期译介东欧文学的第二个阶段大致从 1920 年到 1937 年。

《新青年》作为"五四"前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进步文化思想的重要刊物，对东欧局势，对波兰和匈牙利的文学，都有过积极的介绍。如周作人翻译了波兰作家热罗姆斯基的《诱惑》和《黄昏》，发表在该刊1920年2月发行的第7卷第3号；沈雁冰（茅盾）撰写的《19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连载于1921年第9卷第2号和第3号。

在20年代最初的几年，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在译介东欧文学方面贡献尤为卓著。它创刊于1910年7月，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学期刊，"五四"之前为"鸳鸯蝴蝶派"等封建文人把持。从1921年第12卷第1号起，茅盾出任主编，该刊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提出"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主张广泛介绍欧洲各派文艺思潮以为借鉴，对于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两无偏袒"。从而确定了创作与介绍、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并重的基本方向。

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1－9号，刊登的东欧文学开始明显增多，其中多为小说。累计有以下一些：

波兰：高米里克基的《农夫》，王剑三译；莱蒙特的《审判》，仲持译；格木列支奇的《燕子与蝴蝶》、普鲁斯的《影》和显克微支的《二草原》，周作人译；式曼斯奇（今译席曼斯基）的《犹太人》，周建人译。

匈牙利：亚丹尔摩范男爵夫人的《弃妇》，胡天月译；弥尔柴斯的《旅行到别一世界》，沈雁冰译。

捷克：南罗达（今译聂鲁达）的《愚笨的裘纳》，沈雁冰译。

此外，沈雁冰著有专文《波兰近代文学泰斗显克微支》。在由他撰写的"海外文坛消息"栏中，还有介绍波兰、匈牙利、捷克和罗马尼亚文学的短文。

《小说月报》在1921年10月出版“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这在我国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东欧文艺。这一期的内容广泛，其中东欧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发展概况、小说和诗歌，以及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图文占绝大部分，另外还有介绍芬兰、乌克兰、犹太、希腊和波罗的海、中亚地区国家或民族文学的篇目。东欧部分的具体篇目是：

波兰：诃勒温斯奇的《近代波兰文学概观》和科诺布涅支加（今译科诺普尼茨卡）的小说《我的姑母》，均为周作人译；柯诺普尼斯卡的诗《今王》和阿斯尼克（今译阿斯内克）的诗《无限》，均为沈雁冰译。

捷克（波希米亚）：凯拉绥克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唐俟（鲁迅）译；具克（今译切赫）的《旅程》，冬芬译；散尔复维支的诗《梦》和白鲁支（今译贝兹鲁奇）的诗《坑中做的工人》，均为沈雁冰译。

保加利亚：跋佐夫（今译伐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鲁迅译。

塞尔维亚：Chedo Mijatovich 的《塞尔维亚文学概观》，沈泽民译；拉扎莱维奇的小说《强盗》，沈泽民重译；斯坦芳维支的诗《最大的喜悦》，沈雁冰译。

克罗地亚：森陀卡尔斯基的《茄具客》，沈雁冰译。

茅盾在该刊的《引言》（署名记者）中，专门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他指出：

> 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

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出发所形成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发挥。它区分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审美观念上的对立，同时表明了中国进步作家所持的审美态度。另外，从语言角度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在文中还对斯拉夫语言文字特点作了介绍。他列举俄文、波兰文、捷克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和斯洛文尼亚文的词汇例子，说明其相像之处。这无疑是我国学者对斯拉夫语言进行比较的一个早期例证。

在这一期《小说月报》上刊登的介绍波兰、捷克和塞尔维亚文学的3篇概述，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对这些国家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家都有提及，而不是作者谦称的“小文章”。译文之后大都附有译者撰写的附记，介绍作者的生平或民族背景，对其创作进行简要述评。比如在《近代捷克文学概观》“附记”中，鲁迅称赞“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的人民，也有着最富的文学”。在《战争中的威尔柯》“附记”中，称伐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的破坏者，也是体裁家（Stilist)”。鲁迅这种以“附记”形式导读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多年后，比如他在1935年翻译发表伐佐夫的另一个短篇《村妇》（载《译文》月刊当年9月号）和罗马尼亚作家萨多维亚努的短篇《恋歌》（载同刊当年8月号）时，也都如此。关于后一篇译著，鲁迅评价萨多维亚努是“写散文的好手”，而他的《恋歌》“题目虽然颇像有些罗曼的，但前世纪的罗马尼亚的大森林的景色，地主和农奴的生活情形，却实在写得历历如绘”。鲁迅对东欧文学倾注的热情和具体的译事，后来在作品的源语国文坛也成为佳话。

从广义上讲，“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的范围可以延伸到所有

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小说月报》出版这方面的专号，引起了20年代我国文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广泛关注，意义深远。也正是在这样的影响和氛围下，东欧文学开始比较多地进入我国，吸引了一大批译者和读者。除鲁迅、茅盾、巴金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外，还有许多重要的作家、翻译家、革命者，像沈泽民、胡愈之、王鲁彦、赵景深、施蛰存、冯雪峰、林语堂、楼适夷、孙用、李霁野、钟宪民等，也都从事过东欧多国或一国文学的译介工作。1934年，另外两种文学期刊《矛盾》和《文学》，也分别出版过“弱小民族专号”，介绍东欧文学。

据笔者的初步统计，从1921年到1931年，《小说月报》上发表东欧文学的译文多达115篇，是我国20年代译介东欧文学最多的期刊。

《小说月报》除翻译作品外，还刊发了许多关于东欧文学的评论和报道。茅盾在他编写的“海外文坛消息”栏，发表了不少反映东欧作家、作品和文学大事的短文和简讯。在他和郑振铎主持的“现代世界文学者传略”栏，仅在1924年就专题介绍了匈牙利的莫尔奈、海尔齐格，南斯拉夫的柯苏尔、柯洛维支，波兰的布什比绥夫斯基、莱蒙脱、推忒玛耶尔，捷克的白支洛支、白息那、斯拉梅克、马哈、齐拉散克、沙伐、捷贝克等东欧作家。在该刊1926年发行的第17卷第11和12号上，郑振铎还在“文学大纲”栏以专章分别介绍19世纪的波兰文学和南欧文学。20年代中期后，赵景深在“现代文坛杂话”和“国外文坛消息”栏目上，也对东欧文学作了不少评介。

这一阶段，我国翻译的东欧文学开始陆续以单行本出版。比较重要的译著（初版本）有以下一些：

波兰：显克微支的小说：《你往何处去》，徐炳昶、乔曾劬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炭画》，周作人译，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蒙地加罗》，叶灵凤译，上海，光华书局，

1928年；另有张友松译本《地中海滨》，上海，春潮书局，1928年；《显克微支小说集》，王鲁彦译，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奥热什科瓦的长篇小说《马尔达》，钟宪民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谢罗舍夫斯基的《苦海》，鲁彦译，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普鲁士的长篇小说《哨兵》，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波兰短篇小说集》，席曼斯基等著，施蛰存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波兰文学一脔》（上、下），论文和短篇小说合集，小说月报社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薇娜》，短篇和戏剧合集，廖抗夫著，芾甘、石曾译，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前夜》（即《夜未央》），戏剧，廖抗夫著，巴金译，上海，启智书局，1930年。

匈牙利：育珂摩耳的小说《黄蔷薇》，周作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孙用译，上海，湖风书局，1931年。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巴金译，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施蛰存选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36年。民间文学集《匈牙利故事》，沈志坚、敖弘德编译，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匈牙利童话》，潘家声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捷克：斯惠忒拉的中篇小说《接吻》（波希米亚山中故事），真吾译，上海，朝花社，1929年；另有杜衡译本，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年。开贝克的剧本《长生诀》，余上沅改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以前；另有杨牧夷译本，北平，世界文学研究社，1933年。

保加利亚：伐佐夫的短篇小说集《过岭记》，孙用译，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斯泰马托夫的短篇小说集《灵魂的一隅》，钟宪民译，1936年（再版），初版年月不详。

罗马尼亚：《路曼尼亚民歌一斑》，沃克雷斯库采集，朱湘

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依斯特拉蒂的小说集《舅舅昂格尔》，贺文林译，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基拉·基拉林娜》，文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罗马尼亚短篇小说集》，杨彦劬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南斯拉夫：参卡尔的中篇小说《叶莱的公道》，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波嘉奇次的长篇小说《忏悔》，鲁彦译，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希莫诺维奇的中篇小说《环》，徐方西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从以上这些情况不难看出，在二三十年代我国文学界为译介东欧文学做出了可贵的努力，热情之高涨，成果之显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三、东欧文学早期传入我国的第三阶段

从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可以视为东欧文学在我国早期传入的第三个阶段。由于这一时期战火连绵，民族救亡，阶级搏杀，社会动荡，物质条件艰苦，造成文化事业无法正常发展。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主旋律下，译界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苏联文学。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使东欧文学的译介趋缓。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新的译著，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译著问世，一些出版社还再版或重印了部分前期的译本。

这一时期新译出版的东欧文学作品主要有：

波兰：显克微支的小说《战胜者巴尔代克》，施蛰存译，福建永安，十日谈社，1945年；《爱的幻变》，贺绿波译，上海，亚洲图书社，1946年。192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莱蒙特的长篇小说《农民》（1－4卷），费明君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48年。华西列夫斯卡的长篇小说《被束缚的土地》，穆俊译，香港，海

燕书店，1941年。

匈牙利：《裴多菲诗》，覃子豪译，诗时代社，1940年。莫尔纳的戏剧《李力昂》，芳信译，上海，剧艺出版社，1940年，另有李嘉译本，重庆，中国书店，1942年；《吉祥天女》，尚希文译，长春，"满洲图书株式会社"；《丈夫与情人》，施蛰存译，上海，正言出版社。拔拉希的剧本《莫扎特》，沙蒙译，桂林，集美书店，1942年，另有焦菊隐的译本，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柯曼地的剧作《撒旦的悲哀》，朱梅隽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霍尔发斯的长篇小说《第三帝国的兵士》，黎列文译，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1941年。伊莱什的长篇小说《喀尔巴阡山狂想曲》（第1、2部），郑伯华译，桂林，远方书店，1944年初版。

捷克：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基希著，立波译，汉口，天马书店，1938年初版；1940年和1942年分别在上海、桂林再版。伏契克的《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今译《绞刑下的报告》），刘辽逸译，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海姆的中篇小说《人质》，马耳译，重庆，古今出版社，1943年；另有赵泽丰译本和陶雄译本。《捷克艺文选》，魏荒弩辑译，上海，光华出版社，1949年。

保加利亚：伐佐夫等著《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于道源编译，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保加利亚短篇集》，孙用译，上海，正言出版社，1945年。康斯坦丁诺夫的小说《甘佑先生》，闳凡译，上海，云海出版社，1946年。巴介甫的报告文学《逃出巴尔干》，陈翰伯、朱葆光译，重庆，中外出版社，1944年。

另外，鲁迅等译的中东欧小说集《恋歌》也由启明书局1941年在上海出版。

四、东欧文学早期传入我国的突出特点

从东欧文学在我国早期传入的基本过程来看，它具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也是共同的特征：

（1）它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发展的产物，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以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文学家和翻译家积极倡导译介东欧文学，使这方面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自觉性。它在唤醒民族意识，鼓舞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借鉴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2）扩大了我国文学界的视野，使对世界文学的认识更趋完整，也促进了我国读者对东欧文学的了解。当时译介的范围比较广泛，除阿尔巴尼亚外，对东欧各国的文学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译介的作家在本国多具有代表性，诸如波兰的密茨凯维支、显克微支和莱蒙特，匈牙利的裴多菲，捷克的聂鲁达，保加利亚的伐佐夫，罗马尼亚的萨多维亚努等，都是在世界上享有声望的著名作家。而他们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艺观和创作手法，对我国一些现代作家的创作也不无影响。

（3）它在数量和规模上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并不像以往一些人印象中那样零散和微弱。据笔者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初步统计，在我国1915－1949年间的276种期刊（绝大部分为文学期刊）中，至少有74种刊发过一篇以上的东欧文学译文、介绍文章或简讯，占期刊总量的26.81%。如果不考虑多译的因素，刊发东欧文学翻译作品的总量不少于282篇，其中匈牙利111篇，波兰66篇，保加利亚55篇，捷克33篇，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各18篇。在出版单行本方面，《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上收录的1912－1949年间我国出版的东欧文学译著总计85种（包括多译本和个别合集）。作品的种类和体裁也较

为齐全，其中最多的为小说和诗歌，但也有戏剧、报告文学、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

（4）我国早期译介的东欧文学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但其内部的成分结构也呈明显的不平衡态势。对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文学的译介数量占绝对优势，捷克文学和保加利亚文学居中，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最弱。这也反映出了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学自身的传统，在世界文学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当时在国际上流传的程度，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5）翻译方式上均为转译，主要借助日、德、英、法、俄和世界语等文本，改译的成分也较多。另外，重译情况比较多见，译名和版次情况也相当复杂。当然，这些在早期都是在所难免的。

东欧文学在我国的早期传入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时至今日许多情况已模糊不清，鲜为人知。因此，很需要我们去深入发掘和研究。穷源溯本只是形式和手段，目的还是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先驱拯民救国的播火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保持我国对东欧各国文学研究和译介工作的连续性，促进我国与东欧各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非通用语工作者的使命。

参考文献

①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26－28），上海书局，1990年。

②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马祖毅著：《中国翻译史》（上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④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系）

我所了解的诺贝尔文学奖

李之义

一、瑞典文学院与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成立于1786年4月5日。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证券交易大厅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他阐述了文学院的任务，介绍了他亲自选定的13名院士（后来为了好听定为18名）。国王和在场的院士在文学院的章程上签字。随后院士们就座，每个人都发表了就职演说。

文学院的章程有很大一部分是古斯塔夫三世自己写的，内容与法国学士院很近似。其主要任务是为瑞典语的“纯洁、有力和高雅”而奋斗，即使瑞典语清晰、富有表现力和优美。为此目的，文学院要编一部《瑞典语辞典》和一部语法书。此外，每年要举办演讲和诗歌比赛。国王亲自设立两个金奖，奖励两个最好的，两个银奖，奖励次之的。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建立瑞典文学院还有一个爱国主义的目的，即把瑞典语和瑞典文学提高到文化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此振奋民族精神。

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希望文学院经济上能够独立，他提供了某些经济来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创办《邮政与国内新闻报》的特许权。这一点对文学院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文学院在经济和其他方面都处于独立自主的地位。

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去世以后，瑞典文学院的地位日益恶化。

由于政治原因，1795年甚至一度停止活动。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衰败，各种比赛停止举行，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文学院无事可做，首任常务秘书鲁森斯泰因（1752－1824）一直任职到高龄。1834年，本哈德·冯·比斯科沃担任常务秘书，此时文学院才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在他任职期间，文学院在公众中的形象有了很大改善。在庆祝文学院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文学院院士泰格纳尔（1782－1846）创作的《1836年4月5日之歌》朗诵以后产生很大影响。1868年比斯科沃逝世以后，文学院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常务秘书，直到1884年卡尔·大卫·维尔森（1842－1912）上任。19世纪末叶，瑞典文学已经很繁荣，很多诗人被选入文学院，但是文学院在较年轻一代作家中口碑不好，具有保守主义文学倾向的维尔森影响仍然很大，文学院不能适应新的文学潮流。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文学院犹犹豫豫地担负起并不属于它本职的工作，并且占据了它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1896年12月，文学院接到了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文学院的两位院士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接受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捐赠。其中一位担心，此项任务可能冲淡人们对其本身职能的兴趣，把文学院变成"一种具有世界政治色彩的文学法庭"。另一位除了怀有同样的担心以外，还补充说，国际舆论对文学院神经施加的压力将会完全不同于对其在瑞典作家中分6 000克朗奖金的评选。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瑞典文学院竭力排斥处于领先地位的瑞典作家，并把最杰出的文学家拒之门外，它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项敏感的任务。但是上述理由并不能阻止当时担任常务秘书的C.D.维尔森要求人们接受这项任务。他说：如果不接受，用于文学的捐赠就要全部退回去，从而剥夺了诺贝尔安排的，使那些长期卓有成效地从事文学活动的欧洲大陆上的文学大师们享受极大的荣誉和益处的机会，后世会指责文学院因为

贪图安逸而放弃在世界文坛上占据极有影响的地位。他还批驳了所谓“陌生论”，他说，诚然这项任务范围新而广，但不陌生，对本国文学有能力作出判断的文学院，对外国文学中的精华并非全然无知。当时绝大多数院士接受了维尔森的观点，后世也认为他具有远见卓识，此项任务不仅奖励了“富有理想”倾向的优秀作品，诺贝尔的遗嘱也给文学院的院士们带来了巨大的权力和荣誉。

二、对“富有理想倾向”要求的争论

1895年，诺贝尔决定：把诺贝尔基金的利息每年“授予那些在过去一年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人们推测，诺贝尔本人喜爱文学，也写过一些作品，所以决定将其中的“五分之一授予在文学中创作了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文学院颁发。诺贝尔关于文学奖的遗嘱中有不少模糊的地方，1900年由国王签署的《诺贝尔基金会总纲》中明确了以下几点：“斯德哥尔摩的文学院”就是指瑞典文学院；文学的概念不仅包括美文学，还包括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如蒙森和罗素）以及演说（如丘吉尔），对于“过去一年中的作品”应理解为“最后成果——只有近期才被理解的老作品”；可以同时授予两个有资格的人以及其他具体规定。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规定都没有带来什么问题，只有“富有理想倾向”的要求引来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也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100年颁发的历史就是煞费苦心解释这句话的历史。

20多年前，人们偶然发现了丹麦杰出的文学家乔治·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曾经问过诺贝尔的挚友古斯塔夫·米塔格－列夫列尔关于“富有理想”一词的含义，得到的回答是，诺贝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所说的“富有理想”是对宗

教、王权、婚姻以及整个社会秩序采取批判的立场。此事立即在瑞典文学院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曾于1941－1964年担任文学院常务秘书的安德士·厄斯特林（1884－1981）认为，诺贝尔有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和席勒身上带有宗教色彩的反叛气质”，肯定还是一个激进的仇恨牧师的人。另外一位文学院院士安隆德说：“当他富有理想倾向时，他肯定有比他的解释者所理解的更大的反叛和独立的倾向。”但多数院士认为，此信毕竟不是第一手材料，是经过第三者转述的。但纵观维尔森任常务秘书30年当中的评选结果看，文学院基本遵循了一种保守主义的宗教美学观念，特别是最初10年。

人们经常举出下面几个例子进行说明：

1902年瑞典文学院没有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和《复活》等巨著的散文创作大师列夫·托尔斯泰，而授予创作了浩繁的《罗马史》的蒙森。理由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有着“宿命论的特征”、“夸大机遇而贬低个人主动精神的意义”，“宣扬一种理论无政府主义”，“以一种半理想主义、半神秘的精神肆无忌惮地篡改《新约》”。根据同一原则，文学院也否定了北欧开拓性文学先驱勃兰兑斯，说他把反奥林匹克精神的理想创作与不合常规的生活观和伦理结合起来，批评他的冷嘲热讽的语调失去了人们在文学史和历史作品中渴望看到的真切和纯粹的客观性。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易卜生身上，文学院不同意他在《社会支柱》、《群鬼》和《人民公敌》中对社会所作的批评和在《野鸭》、《卢斯米尔霍尔姆》和《海上夫人》中的神秘主义。第三个典型例子是瑞典具有开拓精神的作家斯特林堡，他被公认是欧洲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他的自然主义长篇小说《红房间》开创了瑞典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有着古典悲剧特征和现代心理分析的戏剧杰作《朱丽小姐》至今仍然吸引着各国的导演、演员和戏剧家，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盛演不衰。但是他被文学院视为亵

渎神明的自由主义者，在本国无立身之地，只得流亡到德国和法国。

但是随着维尔森时代的结束，一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先后进入瑞典文学院，对于“富有理想倾向”的解释更为宽厚，相继提出了“伟大的风格”、“雅俗共赏”、“开拓者”以及“实用主义思考”等获奖标准。对于法朗士、叶芝、肖伯纳、辛·路易斯、皮兰德娄、奥尼尔等获奖皆具口碑；对于哈代、瓦雷里、克洛岱尔、圣·乔治、冯·霍夫曼斯塔尔、乌纳穆诺、高尔基、弗洛伊德和中国的老舍被疏漏表示遗憾。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美学观点和情趣要求也在发生变化，作为“世界文学法庭”的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也在用新的眼光看待各国的文学创作。评论界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奖的作家中出类拔萃者不少，如纪德、艾略特、福克纳、莫里亚克、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萨特和格拉斯等。但疏漏者中仍不乏伟大的名字。

三、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

除了诺贝尔在遗嘱中讲的“富有理想倾向”这句话以外，诺贝尔文学奖有无政治色彩是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文学院的领导及其成员多次强调，文学院不听命于任何政府机构，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交易，文学院是有骨气的，它有强烈的“政治独立性”。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文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尔克说，评选的出发点不是基于政治，但评选出来以后有政治意义。但无论如何诺贝尔文学奖与各种各样的政治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物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诺贝尔奖的颁发不得损害瑞典国家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以后，瑞典文学院制定了所谓的“文学中立政策”：不给交战国的臣民颁发诺贝尔奖，以免给这场国际冲突火上加油，进而把矛盾引进瑞典，损害瑞典的国家利益。由于这项政策，使瑞典和其他中立的北欧国家有了过多的获奖者，从而引起人们的不满。拉什迪因创作《撒旦诗篇》而被伊朗的霍梅尼判处死刑，到处遭追杀。几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从维护人权和作家享有的创作自由的原则出发，要求文学院发表一项声明，谴责这种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文学院的院士们产生了很大分歧，有几位院士甚至拒绝参加会议，但文学院最终没有发表谴责霍梅尼的声明。说穿了还是一个维护瑞典国家利益的问题。因为在瑞典有相当多的来自伊朗的移民，他们当中不乏霍梅尼的支持者，文学院怎么可以引火烧身呢？

但是对这个问题真正引起争议的是在冷战时期。试举几个例子说明：

例1：1953年，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的演说“在自由和人类的价值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发出呼吁的力量。丘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将军，他还是冷战世界中居主要大国地位的英国首相，授予他文学奖不是在戏弄文学院的“政治独立性”吗？

例2：1939年秋天，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在文学上完全微不足道”的芬兰作家西兰帕。人们普遍认为此举是针对当时苏联威胁芬兰的同情和声援。

例3：1958年，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因创作《日瓦戈医生》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院把自己坚持的所谓“政治独立性”政策移植到他身上，说他的作品有“艺术独立性”、“超脱所有的政治党派界限……更确切地说是反政治的和完全为了人道主义的”。文学院虽然没有给列夫·托尔斯泰诺贝尔文学奖，但却称《日瓦戈医生》作为时代的文献，可以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

与和平》相媲美。

例 4：为了进一步鼓励前苏联的离经叛道者，1970 年，文学院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此事在前苏联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整个西方舆论界对瑞典文学院施加种种压力的结果。

四、"欧洲中心主义"

诺贝尔在遗嘱中说，奖金的发放不考虑民族的归属，贤者皆可获奖。他的遗嘱执行人反复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为全世界设立的。不过由于文学院的院士们长期受赫尔德和歌德的文学概念的影响，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欧洲人的事。文学院内还有个别院士认为，"原始文化"不可能发展成世界文化。1913 年，文学院把诺贝尔奖第一次授予欧洲以外的人——印度的泰戈尔，但他主要还是用英语创作。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有 3 个美国人受奖——1930 年，路易斯；1934 年，奥尼尔；1938 年，赛珍珠。1945 年，拉丁美洲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获奖。1968 年，日本人川端康成获奖。1986 年，非洲的索因卡获奖。1988 年，埃及作家纳·马哈福兹获奖。近 20 年欧洲以外的作家获奖的机会相对比较多。应该说，文学院为了使获奖者的地理分布更合理做过不少努力，如使用研究稀有语种文学的专家，组织翻译重点国家的文学代表作等。但是要达到"合理的地理分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8 名院士都懂英文和法文，其他的语种被视为"稀有语种"，用稀有语种创作的作家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他的作品必须是优秀的；第二，必须有跟他具有同等水平的人把它译成瑞典语，以便供院士们阅读。而能担负起这项任务的只能是以瑞典语为母语的瑞典人。翻译作品要保持原汁原味是很难做到的。这就使得用稀有语种创作的作家很难得到诺贝尔文学

奖。

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能否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瑞典文学院关注的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留学期间，很多国内的朋友对我说，你在那边关系熟，给咱中国人争取诺贝尔奖吧。应该说，我当时对于这项奖的情况很不了解。但是我与马悦然教授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我们文学系的系主任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很熟，能够多次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有时候到了直接索要的地步。有一次，马悦然教授拿出一些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推荐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信，被推荐者有沈从文、巴金、钱钟书、丁玲等，但没有一封来自中国。意见非常分散，信的内容也很简单，很难使院士们信服。20世纪80年代中期，瑞典文学院和中国作协都做了一些工作，如在各自国家的一种文学刊物上出一期对方国家的文学特刊。瑞典电视台拍了沈从文先生10分钟的纪录片，瑞典文版的沈从文长、短篇小说集在瑞典出版。但不久沈从文先生离开人世，这一工作也就停止了，因为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不给已经逝世的作家。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以后两国官方的文化交流几乎停止。我因为工作关系也没再做什么。对于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双方意见分歧很大，此处不宜多叙。

五、诺贝尔文学奖不是给文学冠军的

如前面所述，由于对诺贝尔遗嘱中的“富有理想倾向”的要求在他的遗嘱执行人中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对获奖者的评选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勃兰兑斯那封信的发现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针对各方面的批评，文学院强调，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授予“文学冠军”的。道理很简单，来自不同语言、文化、历史、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下的作家的作品质量无法相比较，跟体

育比赛不同，人们无法找出最优秀的，只能是比较优秀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根本不优秀。

20 世纪 70 年代，文学院开始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思考方法来解释诺贝尔遗嘱中的“富有理想倾向”的要求，曾在 1977 1986 年担任文学院常务秘书的 L. 于伦斯坦多次强调，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种荣誉——那样的话容易变得保守和不顺应时代和未来的潮流——而是一种投资或赌注，获奖者可以用它促进自己的创作，促进获奖者坚持文学创作的方向。人们强调，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无法选中最优秀的，只能选中优秀的。所谓优秀是指有生命力、有希望的，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由于是新的，所以一般不被广大公众接受、欣赏，经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授予这些人诺贝尔奖可以引起公众对他的注意，可以使他继续生存下去，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顶住文学作品商业化和公众舆论的压力。文学院的院士们接受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即奖给一个新人，远比拿着钱袋跟在一位已经公正地获得国际地位的作家后边，增加他死后的遗产更有价值。

198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就属于这种情况。斯拉夫语文学专家尼尔斯－沃克·尼尔松发表在《快报》上的文章说：

> 几年来人们看到了文学院所遵循的路线：人们在寻求那些知名度低、很少露面和上广告的人。毫无疑问，人们已经找到了珍珠。

瑞典著名评论家本特·赫尔姆克维斯特在《每日新闻》上评论说：

> 米沃什确实不是什么著名作家。但是正如阿图尔·隆德克维斯特强调的那样——少奖励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借助

这项令人瞩目的奖金广泛介绍那些重要但没人注意的作品，无疑是一种较为理智的使用奖金的办法。

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有了100年的历史。比较严肃的评论家认为，这项奖金的获得者中，有三分之二优秀和比较优秀，有三分之一欠缺或者比较欠缺。但它毕竟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情趣、美学特征、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的产物。由于终身制，18名院士的年龄普遍偏大，精力有限，无法遍读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但是他们还将根据自己的责任、遗嘱人的愿望以及自己的看法和感受，继续年复一年地吃力不讨好地评下去。

（作者单位：人民画报社）

泰语在中国的发展及人才培养思考

傅增有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社会语境中，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和重要，语言是不同语言文化区域之间的人们相互了解和沟通的重要桥梁。

泰语是泰王国的通用语和官方正式语言，是我国教授的外国语言中最早的外语之一，泰语教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北京大学泰语专业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泰语专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泰语专业和泰语教学不断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泰语人才，为中泰人民友好和中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21世纪之初，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泰关系不断发展的今天，研究探讨泰语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人才培养，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一、泰语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泰语教学

中泰友谊历史悠久，两国的友好交往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中官方使团、官方民间贸易及民间友好往来不断。随着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的发展，作为交流工具和桥梁的汉语传入了泰国，泰语也传入了中国。据史书记载，泰语教学始于明朝，明朝四夷馆

是在中国最早教授泰语的学校。

明朝中国对外交往日益发展，语言文字不通，是对外交往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在公元1407年，明朝建立四夷馆，设馆于南京东门外，隶属于翰林院。[①] 设立初期，四夷馆内分设鞑靼馆（蒙古）、女真馆、西番馆（西藏）、西天馆（印度）、回回馆（波斯，还包括满剌加、爪哇）、百夷馆（云南傣族，还有孟养、木邦等）、高昌馆（新疆维吾尔族）和缅甸馆。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八百媳妇，又称八百大甸，在现今泰国北部的清迈府）。弘治十年（1497）、正德十年（1515）、万历六年（1578）暹罗三次遣使臣入朝明朝，送来金叶表文，因无暹罗译字官，只能由回回馆“带译”。由大学士张居正提议于万历六年又增设暹罗馆。此时，四夷馆共分设10馆。[②]

清朝初期，承袭明朝旧制，四夷馆改名为四译馆，仍隶属翰林院。馆内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西天、高昌和暹罗等8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为了培养更多的外语人才，清政府于1862年建立京师同文馆，教授英、法、德、俄、日等外语。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译馆被撤销。1902年同文馆并入了京师大学堂，[③] 即北京大学的前身。

四夷馆作为隶属于政府机构的一所官办学校，译字员生的来源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选太学年幼俊秀监生充之”。后来，则“专选世业子弟，间亦有选监生及民俊秀者”进馆。在四夷馆内，开初学习外语，主要有两种途径：派学生出国留学和聘请外

---

① 余定邦：《明代的四夷馆》，载《东南亚论文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1984年，第20页。

② 吕维祺：《四夷馆增订馆则》，玄览堂丛书本，卷一，第1－2页、第4－6页。

③ 余定邦：《明代的四夷馆》，载《东南亚论文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1984年，第20页。

籍教师来华任教。明代四夷馆，开创聘请外籍教师来华任教的先河。同东南亚国家有关的主要有缅甸、暹罗、八百、回回等馆，缅甸馆是最先聘请外籍教师来华任教的。万历六年增设暹罗馆后，经广东布政司查取，聘请暹罗来使握闷辣等人留馆任教。在馆任教的暹罗人还有握文铁、握文贴和握文源等人。[1] 他们不仅教授泰语，而且还向学生介绍"彼国之土风物产"风俗文化。他们是有记载的最早的在中国任教的泰国人，也开始了中国的泰语教学和泰语在中国的传播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泰语在中国的发展

从泰语专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北京大学泰语专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新中国建立以前，始建于 1946 年 9 月，设在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时称暹罗语科。那时的暹罗语科师资力量较弱，但也培养出了我国第一代暹罗语人才。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合并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暹罗语科改称为泰语专业，是中国泰语专业中成立最早的一个，标志着新中国泰语专业发展的开始。这时北大泰语专业的老师由中国国内自己培养的教师和由从泰国回来的华侨老师组成，他们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批泰语人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泰国专家西堤差·宋卡拉克先生从 1950 年开始到北京大学泰语专业任教，勤勤恳恳地工作了长达 41 年，为中国泰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泰语人才培养及泰语师资队伍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京大学泰语专业自 1946 年建立以来，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泰语外事工作干部、科研工作者和高校教师，先后共招收 19 届本科学生，2 届硕士研究生。为国家培养

① 吕维祺：《四夷馆增订馆则》，玄览堂丛书本，卷二，第6页；卷七，第13页。

泰语人才200余人，许多人成为各部门的骨干和专家，其中有中国驻泰国大使和参赞，也有专家教授。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和中泰友谊作出了贡献。

在1975年以前，虽然中国泰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由于中泰两国是近邻及国际形势的需要，国家需要一定的泰语人才。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60年代后，北京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广西民族学院也先后设立了泰语专业。这些学院的泰语专业许多创业老师是从北京大学泰语专业毕业的，是西堤差·宋卡拉克先生的学生。他们为这些院校泰语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学院的泰语专业的建立直接说明了泰语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和壮大。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泰语专业的发展

1975年中国与泰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中泰两国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密切，各层次来往频繁，对泰语人才的需求也在扩大。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泰语专业的发展。

首先是邻近东南亚和泰国北部的云南省的云南大学开始教授泰语，云南地理位置邻近泰国，从泰国北部清迈市乘飞机到昆明市，仅一个小时。加之石林、大理、丽江及西双版纳等秀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批泰国人到云南旅游观光，投资经商。到90年代，云南民族学院开设了泰语专业，招收和培养泰语专业本科学生。

在这之后，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城市上海，经济飞速发展，浦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了包括泰国企业在内的大批外国企业到上海投资办企业，而在上海包括华东地区懂泰语的人才很少，使人们开始注意到泰语的重要。200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宣布设置泰语专业，2001年9月，首次正式招收学生。与泰国法政大

学合作办学，聘请泰国老师来帮助泰语教学。

这样在中国的北部、南部、西南、东部都有了泰语教育，使开设泰语专业的中国高校达到8所。

多年来北京大学泰语专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多层次的人才，其中包括泰语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和短期班等。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北大泰语专业于199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现在已招收3届硕士研究生，从2003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在这之前，中国高校的泰语专业还无资格和能力招收研究生，中国人要攻读泰语研究生需要到泰国去读。1999年以前，中国的泰语研究生均毕业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北大泰语专业于199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开始了中国高校自己培养泰语研究生的历史。目前，除了北京大学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招收泰语研究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是我国泰语专业和泰语教学发展最快的时期。

二、泰语教学及人才培养的问题与思考

顺应时代要求，抓住时机，力求发展

目前，我国高举科教兴国的旗帜，继续深入进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同时政府加大了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经费投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尤其中泰关系不断扩大和发展，都为我国泰语专业和泰语教学的发展创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1) 中泰关系不断发展促进了中国泰语专业的发展。中泰两国建交以前，中国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中泰两国往来较少，泰语的教学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当时泰语专业的学生很少有机会见到泰国人，学生无法收听泰国电台广播，无法直接阅读原

版泰文报刊。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泰语期间，只见到过一个泰国人——那就是1950年来到中国的泰国专家西堤差·宋卡拉克先生。

中泰建交以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体育方面的关系更加密切。两国高层领导人经常进行互访，中泰双方的教育、新闻、文化、工商、卫生、体育、旅游、军事等各类代表团频繁往来。中泰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来北大参观访问的泰国代表团也是络绎不绝，泰语专业的学生经常有机会参加接待来访的各类泰国代表团。接触泰国人，与泰国人交谈，早已成为平常事、家常便饭了。学生可以直接收听泰国电台，可以随时到图书室阅读原版泰文报刊，学习环境大大改善。

随着中泰文化交流扩大，许多泰国人到中国到北京大学来留学，学习汉语。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汉语的泰国留学生多达300余人，在北大学习的泰国留学生有30多人，为泰语专业学生学习泰语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有的学生还利用假期到泰国旅行和学习泰语。我们还将3名研究生送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泰语系学习一年，承认他们在泰国所修课程学分，促进了泰语教学的发展。

中泰建交以来，中泰文化教育合作交流不断扩大，双方互派教师和留学生，到对方学校学习或任教。从1980年开始，北大泰语专业的教师都先后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留学进修，提高了教师的业务水平，促进了泰语教学质量的提高。泰语专业还与泰国法政大学、诗纳卡琳威洛大学等大学合作交流，聘请泰国大学老师来北大为中国学生上课。

中泰建交28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各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999年，中泰两国还制定了“中泰两国面向21世纪友好合作计划”。这充分体现了两国相互

信任和密切合作的愿望和决心。中泰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为中泰两国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国泰语专业教学的发展创造了大好时机。

(2) 中国改革开放、科教兴国政策为小语种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科教兴国政策，加大了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投入，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政府开始注意包括泰语在内的非通用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采取了具体扶持政策和措施。即2001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西民族学院以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为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北京广播学院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试办基地，并在政策和财政等措施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个决定对于我们开设非通用语专业的学校来讲，是及时雨，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我们记得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当时名称为亚非语教学研究会）1987年成立后连续3届教学研讨会上，代表们都强烈反映非通用语所面临的困境，大声疾呼中央和国家教委重视小语种的问题，并连续3次以研讨会的名义给国务院写信，要求国家支持非通用语发展，给予特殊的支持和保护。有的教授在研讨会上形象地提出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非通用语，使其渡过难关，避免自生自灭。今天我们非通用语终于等到了国家教育部的支持和许诺。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尤其是北大东语系十分重视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派出3个学习小组由院系领导带队分头到有小语种专业的兄弟院校进行学习考察。而后，由东语系主任主持召开全系教师参加的研讨会，就基地建设问题进行专门研讨。

北京大学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批准建立，给北大泰语专业及其他非通用语专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展现了广阔美

好的前景。教育部和北大领导的支持，解决了一些以前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编写和出版教材的工作，可以不必为出版问题而太着急。因为我们可以得到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支持，得到学校、院系的人力支持，不必再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去着急。今天，老师们的担心和压力，更多的是时间不够，到时间完不成任务，拿不出高质量的教材，培养不出来高水平的、符合基地标准要求的毕业生。

中泰关系日益发展，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非通用语专业本科人才基地的建立为泰语和其他非通用语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现在是我们发展的最好时期，出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在前辈老师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开拓，不断进取，为非通用语的发展，作出我们的努力，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培养目标的定位与思考

北京大学泰国语言文化专业教学大纲对泰语专业本科生培养目标作了如下的规定：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能从事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新闻、出版、外语教学和外国问题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要求学生扎实地掌握泰语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能胜任实际工作的听说读写译技能，对所学语言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外交以及政治、经济状况等有较广泛的了解，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大学英语达到四级，具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和表达能力，具有独立学习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①]

北京大学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培养目标规定如下：

---

① 北京大学东语系泰国语言文化专业：《北京大学东语系泰国语言文化专业教学大纲》（2000年12月修订）。

培养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精通一门非通用语言、掌握一种通用语并具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掌握计算机等现代化办公设备技能、品学兼优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对外交流、对外经济合作等方面的需要。

如何实现非通用语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和北大泰语专业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培养目标，我认为有必要对目前实现培养目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以明确方向，实现培养目标。

(1) 中国社会及教育事业环境发生变化。我认为我们的教学及改革必须依照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以及专业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的培养目标去执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20 多年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全面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我国经济建设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这种变化对我国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和冲击，我国高等教育及非通用语教育在改革大潮中也发生一些变化。与过去相比，泰语和非通用语教育有两个变化：

◆ 毕业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需求发生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泰语及其他专业的招生和毕业分配，都是由国家和政府负责。今年招多少学生，明年招多少生，哪些部门需要多少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文化部还是去国际广播电台，均按照国家计划要求进行，大多数是去国家机关。那时流行的口号是：一切服从党安排，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而现在招生和分配是根据人才市场和社会的需求而定。毕业生工作去向既有国家机关和国家事业单位，也有公司企业单位，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现在毕业分配双向选择，去什么单位工作，主要由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决定，学校不再负责分配工作。学生要自谋职业，自己去找工作。

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需求的变化，促使学生更多地考虑自己毕业后的出路、毕业后干什么工作。这也造成一些学生去学第二学位，去学英语，不安心学习或不能全力以赴地学习泰语和非通用语。

◆ 学生培养目标发生变化。学生培养目标发生变化，我这里指的是北京大学对学生培养目标的整体构想有所变化。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大潮中，北京大学正在努力将北大创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时，对学生培养目标及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有自己的考虑和调整，也采取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北大对教学大纲进行多次修订，压缩学生在校学习总学分，调整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比重。以泰语专业为例：

1990 年 5 月修订的北京大学泰语专业教学大纲规定，总学分：175，必修课：133，选修课：42。

1998 年 4 月修订的北京大学泰语专业教学大纲规定，总学分 154，必修课：111，选修课：38。

1999 年 11 月修订的北京大学泰语专业教学大纲规定，总学分：154，必修课：112，选修课：42。

2000 年 12 月修订的北京大学泰语专业教学大纲规定，总学分：149，必修课：111，选修课：38。

从这些年的工作和调整情况来看，说明北京大学在教学和培养方向上，指导思想或倾向上是压缩学生在校学习的总学时总学分，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的比重。让学生在学习上，有更大的自由权、更多的时间去选修他自己喜欢的课程。学习泰语、缅语、越南语专业的学生可以去选修中文系、经济系、法律系或艺术系的课程。发挥综合大学的优势和特点，对学生在校 4 年的学习内容、知识结构进行调整，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

第二，北大允许非通用语专业学生选修第二学位。根据学校

这项规定，非通用语专业学生纷纷选修第二学位，泰语专业学生大多选修法律和经济学方面的第二学位。第二学位对于泰语专业和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出于毕业后就业工作问题的考虑，1998 级和 2002 级泰语专业学生 90％以上的人选修了第二学位。

第二学位有利于学生在北大有限的 4 年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获得北京大学的两个学位，也许会对他今后的成功和一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二学位吸引了学生，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学生把整个学习时间分走了一大部分，去学习没有基础的那些第二学位的课程，减少了泰语学习时间，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泰语学习的效果和成绩。

（2）坚持培养目标，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面对社会及学校中的变化情况，如何去做，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坚持什么方向？我认为非通用语专业应该坚持培养目标，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

纵观北大 50 年来泰语和非通用语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经验和成果，在中国外交工作与国家发展和建设中，在中泰往来及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合作交流中，这些泰语人才发挥了桥梁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实践证明了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合格的，是符合国家需要、能够胜任外事等部门工作需要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与各国交流合作日益扩大、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泰语在发展中泰友好关系中的作用也日益加强和突出。泰语人才不是太多了，而是不足，尤其缺乏高水平的泰语人才。我们应该坚持教学大纲，坚持已定培养目标，下气力培养出既精通泰语，听说读写译五会能力很强，又通晓泰国风俗文化的高水平的复合型的泰语专门人才。这些毕业生应该成为在政府外事部门从事外事翻译和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高水平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这是国家发展建设的需要，是国家外交事业的需要，也是国家建立非通用语本科培养基地的

目的。

我们所说的复合型的泰语专门人才，包括泰语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次的专门人才。由于社会及学校发展情况的变化，我们的教育思想也应有所变化，对培养目标的认识也应符合变化了的社会和人才市场的情况，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生。复合型的泰语专门人才，不应是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泰语专门人才，应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我认为对于泰语人才的培养问题，应根据目前社会和用人市场变化，进行重新认识。我们不应该要求泰语或非通用语专业毕业生毕业后，都从事泰语或非通用语方面的工作。泰语本科毕业生或泰语研究生毕业仅说明他通过大学泰语本科的教育，接受了大学教育，至于今后是否从事泰语工作，从事泰语哪方面的工作，应该由学生本人根据人才市场情况，和他个人理想爱好来决定。毕业生全部从事泰语工作，作为泰语老师当然高兴，有一些毕业生没有从事泰语工作也不应大惊小怪。这在国外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从前，我们却认为没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十分可惜。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革这种传统认识观念，毕业生中有30%是优秀的复合型的泰语专门人才，从事国家有关泰国的外事等政府部门的工作；有30－40%是普通复合型的泰语专门人才，从事一般与泰国有关的工作；有30－40%的泰语毕业生，从事与泰语无关的工作，应该是正常的事情。所以，老师也不必为学生因为学英语考托福或选修第二学位，占用大量时间，影响了泰语或非通用语的学习成绩而着急。学生可以去学习第二学位，学校允许学习，我们应该理解和支持他们。

教师应该在教学上下功夫，在考核上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要达到教学大纲要求的标准。专业考试，你这门课不及格，就是不及格，你就不能毕业，没有什么可通融照顾的。我们要提倡学习好的学生，去攻读第二学位。泰语和非通用语学习成绩不好

的学生，不应该去读第二学位。我们也希望学校严格规定，规定第一学位成绩未达到75分以上的人，不能选修第二学位。

同时，我们努力改革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使大多数学生达到非通用语基地要求的复合型的泰语专门人才的标准，使更多的学生热爱泰语，热爱非通用语，毕业后从事泰语和非通用语方面的工作。

(3) 努力开拓，培养社会需要的多层次人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为我国教育事业提出了新要求，使人才需求形成多层次、多样化，使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也多样化。我们泰语和非通用语的人才培养也应该多层次多样化，以适应社会及人才市场的需求，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 开设公共泰语课。面向全校开设公共泰语课，供全校学生选修。学生作为一门知识来学习，懂一些泰语，以可进行日常会话交流，或能进行初步阅读为培养目标。北大东语系印度尼西亚语和梵巴语专业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效果不错。

◆ 开办泰语短期班。面向社会开办泰语短期班，为社会和经济建设服务，根据政府机关、公司企业等部门要求开设培训班，时间和教材根据需要而定。以前，北大泰语专业曾为国旅总社办过泰语短期班，获得了成功。

三、加强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我们如何实现教学大纲规定的培养社会需要人才的目标呢？除了转变思想，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外，我们还应加强改革，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教学质量，才能促进泰语和非通用语不断发展，培养出社会和市场需要的人才。

加强语言教育，拓宽文化知识面，改革课程

北大泰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专业规格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泰语语言基础知识和较好的听说读写译技能，对泰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有较广泛的了解。培养目标是我们设课和一切教学工作的基本依据及工作的中心。

（1）重视语音，加强口语。每种语言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抓住其特点，才能学好，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泰语要特别重视语音阶段的教学，重视基础阶段学生的语音学习。泰国语属于拼音文字，有辅音字母 44 个，元音字母 37 个。泰语有单元音 18 个，双元音 6 个，元音分长短，可以区别词义；有单辅音 21 个，辅音有清浊音之分，辅音尾音 6 种。有 5 个声调。泰语发音复杂，语音是中国学生学习泰语的难点。泰语语法相对要容易一些。有人说泰语学习是“门槛高，过道短”，学好语音，过好语音关，再学就容易了。不然以后几年的泰语学习就会十分难过。语音阶段要用 3 个月，而且在以后几年学习期间都要始终注意语音。

在重视基础阶段语音教学的同时，还要重视口语，要提高学生开口说话的能力，要加强口语会话课、视听说课、口译课，包括课外活动等形式，以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口语口译能力。发音和口语能力要从一年级开始抓，要贯穿大学 4 年，自始至终要狠抓，抓住不放，注意不断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避免哑巴外语的产生，才能培养出好的翻译，好的外语人才。

（2）增加文化方面的课程，扩大知识面。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大多数从事外交及有关泰国的工作，如仅懂泰语语言，而不了解泰国的文化、风俗、习惯，就可能闹出笑话来。这样是做不好外事工作的，而且还会出现本可避免的错误。不少翻译，因对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和习俗知之甚少，而闹出笑话的例子不少。例如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95%以上泰国人信奉佛教，在一定的

意义上讲，不了解泰国佛教就不了解泰国，不了解泰国人。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毕业生对我说：在北大学习的课程中，泰国文化课，是一门非常有用的课程，对现在的工作很有用，帮助很大。

因此，在不减少语言实践课、加强听说读写译五会能力训练的同时，增加有关泰国文化、政治、中泰关系和泰国历史与概况等文化方面的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是十分必要的，是形势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它可使学生既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熟练的听说读写译的语言能力，又有广泛的文化知识，才能逐渐地把学生培养成复合型专门人才。

（3）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革教学法。多媒体、音像及电化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将会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学生可以听到悦耳的声音，看到鲜艳的图像，在形象的情景中学习外语。改变从前学生跟着教师发音，机械地模仿老师的学习方法，将极大地提高教学效果。在这方面北大作了一些努力，但仅是刚刚开始，与兄弟院校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卫星泰语节目，我们还没有。听力课及视听说课的内容材料比较陈旧，如果北大安上卫星接收设备，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获批准后，北大加快了这方面的工作步伐。我们希望学校的工作进度能更快一些。

加快教材建设，编写出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教材

泰语专业和其他非通用语专业一样存在着教材陈旧、教材短缺的问题，比如北大东语系各专业大部分课程没有正式出版教材，长期使用油印打印教材；有些基础课教材，出版十几年了，内容上需要更新。

现在，这个问题得到初步的解决。北大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被教育部批准后，东语系很重视教材建设工作，系里成立了教材建设领导小组，落实了各个专业语种教材的编写计划，并

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教材编写是一项细致而繁重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它不仅需要承担编写教材任务的教师抓紧时间按时按质完成编写计划，在经费上，仍需要国家和学校继续给予更大的支持，才能完成所需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

教材如同剧本，有了好的剧本，加上好的演员，才能排练出有声有色的戏剧。编写出与培养目标和时代相适应的教材，将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创造更好的语言教学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为中泰文化教育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和条件，创造更好的语言环境。

应该继续扩大现有中泰大学之间的合作交流，如互派教师。北大泰语专业聘请泰国大学教师为泰语三、四年级的学生上课，有利于学生对泰语深入理解和正确运用，有利于提高泰语教学质量水平。

除了继续坚持安排学生参加接待来访泰国代表团等课外语言活动，使用泰语，增加语言实践，提高泰语听说能力外，还应积极争取与泰国大学进行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活动，如组织学生到泰国进行短期游学。

应积极支持教师到泰国短期进修或参加学术研讨会，加强学术合作交流。如本人应泰国大学部邀请，参加 2001 年 9 月 20 日 －21 日在曼谷举行的“亚太地区泰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与泰国和来自亚太地区各国大学的泰语老师和学者交流泰语教学经验体会，收获很大。这将有利于我们泰语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四、结束语

回顾我国特别是北京大学泰语专业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国的泰语专业不断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目前，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我国泰语及其他非通用语发展处在最好的时期。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泰语和非通用语的发展。同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也给非通用语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应认清形势，转变思想，顺应时代，把握培养标准，努力开拓，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为国家及经济发展培养复合型泰语专门人才。

改革开放，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为我们非通用语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但泰语及非通用语专业长期积存的问题，在教材、教学设备、师资队伍等方面的困难，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不可能在半年一年里一下就解决了，需要全体教师共同努力，同心协力去奋斗。同时，也需要国家及学校等各级领导部门不断给予支持。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是在国家和教育部大力支持下建立的，体现了中央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体现了国家对非通用语小语种发展的重视。但重视一下，给予一次支持，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教育部及学校等各级领导部门能继续对非通用语给予更大的关心和支持，促使泰语等非通用语专业不断发展和提高。

让我们在科教兴国的方针指导下，乘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东风，抓住时机，努力开拓，不断改革，建设和发展泰语和非通用语，努力培养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复合型泰语和非通用语人才。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语学院）

后　　记

北京广播学院在2001年9月召开了一次“非通用语与国际文化交流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在刘继南院长的亲自策划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召开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邓炘炘主任和研究生蔡继辉等同学，以及院办的许多同志都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联络和组稿工作，对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是从提交大会的论文中筛选出来的。尽管兼顾到语种的多样性，但是还有个别论文由于语言排版等困难只好割爱。

北京广播学院是开始非通用语教学与研究较早的院校，目前已经成为国内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本书的出版不仅为本次研讨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通过专家、学者对非通用语历史的回顾、现状的审视与前瞻，也会为非通用语教学与学科建设以及宣传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感谢斯瓦希里语专家陈元猛先生拨冗为本书作了校阅，并与有关作者进行了文字核实；感谢责任编辑余木先生以及蔡开松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闵惠泉
写于定福庄
2003.6